



背负十架



中国家庭教会史

1807年—2018年



王怡牧师简介

王怡牧师，成都秋雨圣约教会主任牧师。亦是作家、诗人、宪政学者。牧会之外，长期从事写作，并在多间基督教教育机构和神学院担任理事和教师。信主前是著名的作家和宪政学者，被南方人物周刊列入“影响中国



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信主后作为基督徒知识分子和推动家庭教会公开化的牧师，被英国金融时报列入“25位值得关注的中国人”。著有《宪政主义》《不服从的江湖》《天堂沉默了半小时》《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翅膀像鸽子》《福音的政变》《大教堂》《大声的默想》等书十余种。

王怡牧师自牧会以来，一直竭力推动中国家庭教会公开化，因反对中国政府在属灵的事上控制基督教会并呼吁执政掌权者应向上帝悔改，停止迫害中国教会，被中国政府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12月9日逮捕，其妻蒋蓉师母亦同时同罪被指定监视居住（相当于秘密羁押），蒋蓉被释放后仍然没有自由，一直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

2019年12月26日当局秘密审判了王怡牧师，12月30日王怡牧师被成都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个人财产5万元。

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简介

成都秋雨圣约教会，是一间持守改革宗长老会传统和“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三化异象的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建立于2005年，由王怡牧师担任主任牧师。

因坚持公开聚会并联名全国家庭教会共同抵制中国政府为控制宗教信仰而颁行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教会于2018年12月9日被中国政府强制取缔，同日中国政府开始陆续抓捕教会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会友，刑拘、行政拘留和非法羁押一百余人。

教会位于成都市太升北路56号的教会会堂、图书室、学堂被中国政府强行关闭并没收，会堂内的设备、书籍全部被没收和扣押。

教会负责堂务事工的覃德富长老因负责印刷教会敬拜所用的圣诗歌本和传福音使用的福音手册而被指控“非法经营罪”，2019年11月覃德富长老被控制“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图：秋雨圣约教会位于江信大厦6楼的会堂

编者言

王怡牧师声明：我的一切文字均放弃版权，因为文字所传递的实质原本不属于我。任何个人、教会、机构都可以自由地转载、摘录、朗诵、复制、印刷、表演及以各种方式传播、使用。但唯有一点，就是文责自负，转载应当署名。这其实不算一项权利，而是写作者和发布者的基本义务。因为这些文字不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的。正确的部分，归荣耀给神。错误的部分，必须归咎于我。所以，请大家怜恤我，因为唯一不能放弃的，是我被宝血赦免的机会。

编者言：编者是一位受王怡牧师牧养多年的基督徒，因阅读他的文章受益颇多，且不断有朋友告诉编者希望系统的阅读他的书，由于他的文章在国内被封杀，他的书目前只能在国外出版，国内无法购买，遂起意将王怡牧师在网络上的文章及他所在的教会内部印刷的刊物摘录整理成册。王怡牧师是一位勤奋的牧师，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文章数量太多，本套书籍所收录的文章并不完全，望广大读者谅解。

因王怡牧师声明放弃一切文字作品的著作权，编者在此也放弃本书的设计排版权，欢迎所有的朋友无论是基于营利还是非营利的、无论是转发电子书还是纸张印刷、总之鼓励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传播。

由于编者并非专业人士，因此在设计排版中有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谅解！

愿上帝使用王怡牧师的文字祝福各位读者！

荣耀归主！

主后2019年12月30日

王怡牧师被宣判之日

《中国家庭教会史》说明

本书是编辑对王怡牧师2018年秋雨圣约教会成人主日学课堂录音整理而成，前五章经过王怡牧师本人审阅，后五章王怡牧师还没来得及完成审阅即被逮捕，后五章的审阅为编者本人在录音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针对后五章的整理，编者未作内容上的更改，仅对部分口头用语改换成书面用语，删除部分重复的内容，以方便读者阅读，更方便读者传播。

感谢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的同工以及负责校对的同工，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愿上帝祝福各位读者！

目录

第一章

新教入华两世纪 / 8

第二章

中华归主五十年 / 27

第三章

护教士与叛教者 / 52

第四章

十年生死两茫茫 / 70

第五章

基要派的大复兴 / 90

第六章

民主败北，福音进城 / 109

第七章

山上之城，初露微光 / 124

第八章

在复兴中逼迫，在逼迫中复兴 / 140

第九章

改革宗在中国 / 154

第十章

家庭教会的传统、承继与未来 / 171

第一章

新教入华

两世纪



图：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向西、向西、再向西

基督教来华，从有明确记载和定论来说，是从贞观九年、景教来华开始。635年，景教宣教士阿罗本进入长安，随后建立教会，迄今约1400年。

还有一些传说和考古，譬如江西和泉州的铁十字架，似乎显明三国时代，基督教已经来华。更有东汉的一些汉砖汉画和铜镜，似乎在描述圣经故事和福音信息。而教会史上也一直有多马来华的野史。也就是说，主后一世纪内，使徒们的脚踪可能就已到达中国。

不过这些传说和推测都还不能确定。关键的是，没有证据显明教会并未在贞观年间之前被建立起来。这样，我们从景教算起，基督教已四度来华。

人文学院有位老师，跟大家上基督教与中国历史课。他回家问妻子，“为什么景教来华，却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呢”？他妻子说：“很简单，因为他们依附权贵。”他发现妻子很有见识。又问她说，“那为什么到了元朝的也里可温教，基督教第二次来华，还是没有扎下根来呢？”他的妻子说：“很简单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权贵。”

这两句话，是教会前三次来华的一个概要。我用另一句话形容，前三次来华，是“向北，向北，再向北”。直到新教来华，则是“向西、向西、再向西”。

为什么向北？因为京城在北边。前三度来华都冲着京城去，冲着皇帝去，冲着士大夫去。所谓擒贼先擒王，传福音不如先把皇帝搞定了，天下就可以传檄而定。这也有基督教在欧洲的经验。罗马的改教，以后罗马灭亡后的蛮族时代改教，通常都是一个国王信主，然后带来全国归主。所以传教士们想重复欧洲的经验，一直向北、向北、再向北，要进入京城，进入权力中心，去接近中国最有权势的那个人。但这一条路，反复了三次，超过一千年，上帝却没有许可这条路的成功，上帝没有给中国带来类似于欧洲的经验。

而且这三次来华，可以讲，其实每一次都差不多要成功了。因为每一次都成功地接触到了皇帝。今天你还不太容易接触到习

主席。08年大地震，全国各地的基督徒、机构来四川，有一位灵恩派的姐妹很厉害，她天天为温家宝信主祷告。终于在北川，温家宝在那里，她成功进入温总理身边10米之内，然后就伸手为他祷告，赶除邪恶的灵。伸了一会儿手，旁边人就帮她拉走了。回成都后还是不放弃，就在四川省委对面的商业街租了套房子，24小时、轮流伸手向着那对面祷告。

但第一次景教来华，唐玄宗很欢迎，主动派了房玄龄，就是当时的温家宝，人家就出到长安城外去迎接阿罗本。最后还封阿罗本是“护国大法师”。

甚至到了元朝，忽必烈的妈妈信主了，宫里好多人信主，只是皇帝没有信。很多人说他也许信了，因为马可波罗的叔叔见他时，他说希望你带信回去，请罗马教宗给我多派一些人来，派教士过来，再派些专家来，还要替我带耶路撒冷耶稣墓前的一点灯油回来。那忽必烈至少算个慕道友了。只是等马可波罗回来的时候，他的兴趣好像不在这里了，和大汗在信仰上没什么交流。

最后到明朝要灭亡时，南明政权，也是太子信主了，皇后、皇太后也信主了。重臣、太监、宫女信主的很多。耶稣会的宣教士写了一封信回欧洲，希望基督教国家出兵帮助，我们两边夹击，打败清朝，可以扶持中国出现一个基督教王国。但还是功亏一篑，人家根本不想派兵过来，太远了，缺乏利益驱动。而且等到教宗的回信送回来，南明政权早就覆灭了。

到民国就更不用讲了，孙中山，蒋介石都是基督徒。但上帝的心意，至少在1400年内，都是这样显明的：凡是信了耶稣或可能信耶稣的皇帝，最后都要失去天下，偏安一隅。上帝不应许祂的福音，在中国是以影响权贵的这条路来传扬。清朝的康熙也一样，顺治也一样，他们都接触信仰和宣教士很深，但最终都拒绝了福音。

直到马礼逊来华之前，整个中国彻底拒绝了福音，上帝与上帝为敌，全面禁教，奉教者杀。于是福音在中国，从1807年开始，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可以称为“向西、向西、再向西”。西边有什么？西边有农民，有山沟沟，西边有少数民族，西边是草根，西边是内地。向西、向西、再向西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

皇权专制主义

我们以1807年为坐标，再往前回顾一点点。1760到70年代的时候，那时天主教早就来了，大家都知道一些人物：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好多很熟悉的宣教士。在1517年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后，大概经过20多年，天主教内部就产生了一个“反宗教改革运动”。意思不只是反对新教，同时也是它内部的复兴运动。就是承认我们有很多问题，确实比较腐败，信仰需要被重新激励。当然天主教会当时并没有回归圣经，没有回归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以它始终不是一次宗教改革，而只是一个“反宗教改革”的道德和灵性上的复兴运动。

但在很大程度上，天主教内部还是焕然一新，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叫耶稣会。耶稣会是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锋，里面的人也经历了灵性的复兴，就是重新向主火热。那个时代，新教国家像日内瓦和德意志，都在欧洲中北部，周围一圈的海洋强国，从意大利，到葡萄牙、西班牙，都是天主教国家。所以受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的刺激，天主教国家和耶稣会成了第一波向全世界宣教的主力。

为什么新教宣教士落后于天主教呢？很简单，因为那时你还在挨打。自己还没有站稳脚跟，英国还要一百年才会崛起。制海权在人家手上。这样耶稣会成为了向中国宣教的主力。他们比马礼逊早来200年，在明代已扎下脚跟。

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正是这个问题，使中国没有走上像欧洲那样从君王信教到全国归信的道路。基督教到中国后，才使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和体制中最根本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皇权专制主义。在这个皇权专制主义中，你不能说它没有宗教，儒家到底算宗教还是不算，很多学者在争论，佛教跟道教是比较民间的。但在中国，最重要的信仰和崇拜体系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皇权本身。皇帝类似于法老，是宗教性的领袖。在皇权专制中，政治本身就是宗教，皇帝本身就是大祭司。中国文化的内核，就是对皇权专制的敬拜。此外，在文化上儒家是主流，也是这个皇权专制主义的秘书、助手和祭童。

所以在传统中国，有两件事很重要，它们构成这个国家崇拜体系的两部分，一是你要跪皇帝，一是你要拜孔子。读书一定会

拜孔子，每次考试前都要拜，不拜孔子连科举都参加不了，你怎么混个一官半职呢？而等你有了一官半职，你就要跪皇帝，侍奉皇帝，生杀予夺，拜他所赐。拜孔子与跪皇帝，是皇权专制主义这枚硬币的两面。

当初利玛窦来中国后，他先要找自己的同行，教会的竞争对手是谁？他首先看到佛教的和尚。他就穿得跟和尚差不多，变成了“西方来的和尚”。因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嘛，这样就可以给中国人念圣经。可他很快就发现不对，和尚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不高，他发现地位高的是儒生。所以他就不穿和尚衣服了。他的同行是儒生，他就改穿儒家的衣服，这样他就变成了“西方来的儒生”，是知识分子，是学者，他们本身也真的很有学问。

因此，耶稣会的宣教士在中国的文化身份，是通过信仰身份的淡化而获得的。他们没有把独一无二上帝的信仰，如此尖锐地带入一个跪皇帝、拜孔子的皇权专制主义文化中，为此走上流血的十字架道路。不，他们作为西方来的儒生和学者，一直回避了福音与中国传统的尖锐冲突。

对中国人来说，耶稣会士的第一身份是学者，然后才是相信上帝的学者。中国人会说，我们的学者敬天，他们的学者信神。这就是差别。好，现在我知道这个区别了，我也尊重这个区别。但这个区别并不重要，这个区别是无所谓的。对顺治、康熙来说，主要是看你带来的学问是什么。是建筑、园林，是绘画和钟表，是世界地图，是航海和历法等等。真神与偶像，福音与宗教的区别，天主教宣教士没有带进来。从根本上说，他们没有向中国传一个“唯独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福音。所以自然也没有过于重大的冲突。看上去还不错，他们都接触皇帝了，都进入宫廷了，都当大官了。最多，他们尝到的不过是伴君如伴虎的滋味，而不是一座摆放在基督与凯撒之间的斗兽场。

但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欧洲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海外宣教一开始都由耶稣会垄断。只有耶稣会在中国宣教。但到了崇祯年间，明亡前夕，这个垄断被打破了，于是另一些差会，像道明会也取得了来中国和其他地方宣教的权力。

结果，道明会的人来中国一看，他们听说耶稣会在这里做得很好，已经影响皇帝了。但他们发现，不对，耶稣会做错了。他

们妥协了信仰。因为他们所传的福音，居然和拜皇帝、跪孔子，以及祭拜祖先的宗教，都并行不悖，同处一室。

当然有些人说：这不过是两个宗派的竞争，互相挖墙脚。但道明会的宣教士是对的，耶稣会的确在中国妥协了信仰。他们说信主后仍然可以跪拜皇帝，仍然可以拜孔子，仍然可以祭祖，这叫什么信主呢？他们从未向中国，清清楚楚地宣告第一条诫命和第二条诫命。所以道明会的一纸讼状就告到梵蒂冈去了。

我举一个例子，帕斯卡尔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神学是倾向加尔文主义的。在《致外省人信札》里，帕斯卡尔这样讽刺说：耶稣会的人在亚洲，在中国，这样教导信徒说，要他们把对耶稣基督的敬拜，掩盖在他们对孔夫子的敬拜之下。当他们参加对孔子和祖先的祭拜仪式时，他们教导中国基督徒在衣服里面悄悄藏一个十字架，这样就能将内心的敬拜转移到对耶稣基督的敬拜上去。这个叫孔子穿肠过，基督心中留。

到了崇祯年间，梵蒂冈也认为耶稣会错了。后来到了康熙后期，教宗明确下令，禁止将上帝译为“天”，以免将基督教对独一上帝的敬拜，与中国的“敬天”相混合。1706年，他们派了一个使节到中国来，告诉康熙说：“信了耶稣，就是承认祂是独一的上帝，上帝只有一位。你是皇帝，我们尊重你，但是信了上帝就不能够再拜你。也不能再拜祖先，因为祖先不是神，可以尊敬，但不能拜。也不能拜孔夫子，因为孔夫子也不是神，我们也很尊敬他，但不能拜他。”这一旨过来，康熙就大怒。虽然你听过康熙写过十架歌，康熙信主了？！不是的，是以前耶稣会把他糊弄了。或者说以前他把耶稣会糊弄了。所以当梵蒂冈来人，告诉康熙什么叫一神论，什么叫除他之外、什么都不能拜，连您都不能拜。康熙就说，“那你们卷铺盖回家吧”。于是康熙下令禁教，所有天主教宣教士全都赶走了。

但中国太大了，不像日本。你们前两年看过电影《沉默》。日本很小，基督徒躲到哪里都能抓到，所以很严酷，抓到之后杀头啊。中国那时禁教也是这么做的，比如扔个十字架，或扔个耶稣的像在地上，你要吐唾沫，脚踩上去，走出门，这样就没事。如果你继续奉教，奉教是死罪。只是执行起来，中国没有日本厉害，因为中国太大，地方上情形各一，特别是中国没有封建制度，地方上比较宽松，缝隙和空间都很大。

所以在镇压过程中，明末清初，有持续一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所以很多受逼迫的天主教徒就跑到四川来了。只要有逼迫，一定就是向西、向西、再向西。西边离皇帝权力比较远。于是四川迅速成为天主教大省，天主教徒数量占全国第三或第四位，绝大部分是逃难过来的。

从1706到1720，康熙和教宗之间拉锯了几个回合。最后正式下令禁教，但执行不严。到1723年雍正上台后，就执行严格禁教了。有点像文革时代，譬如把天主教堂改为关帝庙。这样一直到1860年，超过一百年，历史上称为“百年禁教”。这一百多年，中国是完全禁教，闭关自守的。

马礼逊建立了家庭教会

所以，你注意到一件事，1807年马礼逊来华是“非法”的，是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内政的干预。马礼逊来华，是冒生命危险的。他建立的就是家庭教会。他来华即为非法，登陆即为非法，传教非法，连学中文也非法。因为中文是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以教给老外的。所以他出十倍大价钱，终于找到个不要命的，教他中文。这人没有信主，就是因为钱多。所以有时你发现，有人为钱不要命，比基督徒为主更不要命。当然，马礼逊也是个不要命的，所以他才找个不要命的。那人虽然不要命，但每次给马礼逊教中文，都拖着个行李箱，把洗漱用品，换洗衣服都装在里面，因为每次都有可能跑路。而且身上还藏了毒药，你看他为赚钱可以到这个地步，万一真被抓住，熬不住了，就自杀，他都愿意。

所以新教来华，从1807年到1842年的南京条约，再到1860年的北京条约，这中间约半个世纪是禁教时期，传教是非法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五口通商，沿海有五个城市，老外可以进来，居住，做生意，建教堂，传福音。但这些宣教士不满足，他们就坐船，在珠三角地区，沿河道进入内陆，企图往更深的内陆走。有些传记里写道，他们沿珠江往上走，后面炮艇发现了，就在后面追击，发炮。一直要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到1860年就完全开放内地了。禁教时期正式结束。

有个地方，是很多人诟病的。当时的翻译是宣教士。那时宣教士都参与到和约中来。为什么？因为只有他们会中文。当时学中文是不要命学会的。两国相交要谈判，签约，只能找到宣教士做翻译。在1858年，担任翻译的是丁韪良和卫三畏。他们提出了“宗教宽容条款”，要求取消对中国基督徒的迫害。到了1860年北京条约，有个法国宣教士为主大发热心，和约有中文版和法文版，他就在中文版里多加了一句，外国人可以去内地，然后“开设教堂，建造自便”。但法文版并没有这个话。很久以后才发现这个外交事故。所以外语不好害死人啊。毕竟中国打了败仗，也就认了。这样从1860年后，宣教士就可以去内地建立教会。到1865年，戴德生在宁波成立了内地会。这个不断地向西、向西、再向西，向下、向下、再向下的过程就开始了。

1860年前，基督教在华是非法的，跟大清有国家层面的冲突。1860年意味着“禁教时代”结束，国家层面的冲突缓解了。甚至地方官员怕惹麻烦，因为宣教士有“不平等条约”保护。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以“天朝”为中心，看别人都是“四夷”。从不承认国家之间的平等地位，也不知道国际条约是怎么回事。打了败仗，才被迫以平等的国家关系签署和约。所以，南京条约实际上是中国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内容不平等，是因为你打了败仗。但战胜国愿意与战败国以平等国家的地位和关系，来签署国际和约，这是天朝历史上的头一遭。也是“天朝”观念崩溃的开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可以随便关、随便杀，但根据这份条约，外国人却不能随便关、随便杀。人权标准不同了，这就导致了“不平等”。南京条约竟然说，不但要释放之前被抓的英国人，还要释放之前被抓的中国人。你们老外获得保护就算了，还干涉我们内政，要求中国人也获得保护，我们觉得这太不平等，太欺负人了。所以，再后来有句流传很广的慈禧名言，“宁赠外邦，不与家奴”。其实这话是荣禄说的，是陈天华把它算在慈禧头上了。

于是，从1860年到1900年，基督教在华的主要冲突，我们称为“民教冲突”。国家层面的冲突消退，民间和文化层面的冲突爆发。这半个世纪也可以称为“教案时代”。层出不穷的教案，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但冲突一方不再是官员和朝廷，朝廷表面上是保护宣教士的。反教的主力变成了“士绅”。跟明朝还不一样，那时很多大臣起来反教。但1860年后，大臣们和朝廷的立

场是一致的，就算心里反教，暗地支持，但都不是公开的反教者。

因为在传统中国，地方上都是“乡绅自治”。国家的组织力量不够，地方上的秩序依靠宗法社会和儒家社会，所谓“皇权不下县”。一个村子里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张家祠堂或李家宗祠。村有村庙，族有族祠，这是乡村的中心，文化中心，社群中心，裁判权中心，和宗教中心。村子里的领袖人物是谁呢，是大家族的族长和乡绅。乡绅就是读过一点书，甚至当过举人，做过一官半职的，家境也殷实，有田有地的。通常叫耕读之家。既有人做生意，也有人做官，这种家族叫做乡绅，基本上构成了民间社会的领袖群。

但1860年后，教会进来了，在一些地区带来了中国乡村结构的冲突。比如张家村本来有个祠堂，现在祠堂旁边有教堂。这时另一套文化和宗教的权威结构就出现了。教会有自己的领袖群，就是宣教士。他们因为向西、向西，和向下、向下，结果变成了一种“洋乡绅”。现在，在福音传播较深的地区就出现了两套乡土社会的结构，包括道德和宗教的权威，和两种不同的领袖人物了。

我们可以稍微对比下，1949年后的另一种变化，能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冲突。共产党建政后，在乡村彻底消灭了乡绅，而以流氓和党棍取代之。换言之，在一百年间，中国乡村社会的领袖人物变了三次，一是“乡绅地主”，二是“牧师传道”，三是“党支部书记”。当然，也有一些地方的“党支部书记”是开明乡绅的转型。如果这样，则是当地的庆幸。这也能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在1950年后的三自运动中，最残酷加以消灭的，就是敬奠赢在山东的“耶稣家庭”。因为教会在当地，已形成了一种教会领袖与传统乡绅相结合的乡村秩序。不消灭就不能以“党支部书记”取代之。

宗教混合主义

同时，传统中国除了皇权专制主义外，还有一个宗教的混合主义。叫做儒释道，即儒家、佛教和道教的“三教合一”。越是在地方上，越是在日常生活中，你根本区分不出来那些是道教，

那些是佛教，那些是儒教，全都混在一起。老百姓都这样，今天拜关二爷，明天拜孔子，后天又拜妈祖，另外听说猪八戒也不错，就加拜个猪八戒。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合流了。在宗教混合主义里，民间社会都混在一起的。学者们把这个特征称为“弥散性宗教”，对比于作为“制度性宗教”的基督教。

同样，比如春节啊，清明啊，端午啊，还有中元，就是所谓的鬼节，一年中这些日子，都是宗教混合主义的节期。民间社会有很多仪式。鲁迅写的一篇文章叫社戏，还有北方的庙会，还有迎神赛会，人们要敲锣打鼓，要赶鬼啊，祭拜啊，游行和唱戏等。这时都是乡绅来张罗，家家户户都要摊分给钱的。现在基督徒却说我们不参加，也不给钱，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不参与偶像崇拜。

对传统中国社会来说，你信耶稣就信耶稣呗，我平常又没管你，但现在迎神赛会，管你信耶稣还是信佛，大家都要出钱对不对？信耶稣就不出钱了，这就冲击了宗教混合主义的大次序。在原来的观念中，三教都是合一的，加上基督教，就应该四教合一。这是中国人所理解的宗教自由。就是皇权专制主义和宗教混合主义之下的宗教自由。所以，一百年前，康熙觉得很委屈，我对基督教已够意思了，但教会实在太过分，他们不但信耶稣，还要同时不信皇帝，不信孔子，甚至不信祖先。打个比方说，基督教不是一个APP，可以安装在中国文化的操作平台上。基督教是一个绝对的一神崇拜，除了基督就没有神。因此，基督教来华，是与整个操作系统的冲突，而不是APP之间的冲突。

康熙一旦搞清楚这一点，就开始禁教了。现在，乡绅阶层也开始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的村子里有了一个基督徒的话，这个村子的次序真的会大乱。有些读了书的赵四老爷，张五太爷，就会天天气得不得了，皱眉摇头，喟叹世道不古啊，祖宗之法不可废啊！因此在乡绅的鼓动下，加上还有一个群体就是流氓，即无业无产之人。义和团就是乡绅加流氓兴起来的。民教冲突愈演愈烈，愈演愈烈，到1900年达到最高峰。

政教冲突与民教冲突的汇合

1900年，是国家层面的冲突跟文化层面的冲突之间的汇合。

这之间还夹了一个太平天国之乱。洪秀全受过洗，读了梁发写的小册子。所以太平天国打着基督教的招牌。他们的信仰算是异端，实际上是另一种宗教混合主义的产物。但满清把它打不下来，所以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臣就起来，办团练。这场反太平天国的运动，焦点不是救清朝，而是救中国文化，捍卫名教正统。所以曾国藩是作为儒家正统的卫道士，动员了整个儒家中国的民间力量，才把太平天国打下去了。

平乱之后，清朝就发生了蛮大的变化，本来汉人在这个政权中地位不高，可是经过太平天国之乱，汉臣实际上成了整个政权的支柱。于是他们就兴起了洋务运动，学习西方也不再是那么大逆不道的事了。但这轮运动到1895年的甲午海战和马关条约，又出现一个逆转。

甲午战争跟鸦片战争不一样了。几十年前，人家船坚炮利，我们拿着长矛宝剑，当然打不赢啊。可经过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一个是民生方面的，如江南招商局，上海织布局等。另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强军，最了不起的成就是北洋水师。北洋水师的舰船，都是从德国进口的，他们的质量，总吨位等指标，在当时排全世界海军的第三位。日本海军的总吨位和其他指标是不如北洋的。所以甲午战争是西方的两个学生的毕业赛，当时西方都觉得日本肯定输。中国经过几十年洋务运动，他的海军说不定可以和英国再打一场了，就像我们经常幻想中国足球队说不定还能打进世界杯决赛。

但实际上，大清被日本打败了，败得如此彻底，窝囊。带来朝野上下整个幻灭感。那些海军的管带，邓世昌这些人是很西化的，很多人都去过国外读书，这是当时中国最时髦的一群人。邓世昌平常都喝咖啡的，北洋舰队的军官休息室里，都是打台球的。他们过着最西式的生活，是举国之力养起来的精英。这帮人还是全军覆没了。所以带给整个帝国幻灭感。

洋务运动的失败激起戊戌变法，变法又失败，清朝就转过来了，汉臣的天下不再，清廷重新变成了八旗里最顽固的那帮人的朝廷。这帮人执政后，脑袋一热，说一定真可以和八个西方国家干一仗，所以慈禧派了两个人到天津张大师兄那里，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两个人跑回来，不敢跟太后说不可以，就说看上去面容发光，武功高强。也不知道慈禧到底信不信，可能半信

半疑，反正不管怎样，她强调说，‘‘民气可用‘‘。这样，国家层面的排外与反教，就跟民间的流氓及几十年的民教冲突汇合起来，爆发了1900年的庚子拳乱。

我们听过很多殉道者的故事，许多宣教士被杀，他们被称为大毛子，许多中国基督徒被杀，他们被称为二毛子。像那些圣诞节来过教会一次的慕道友，基督教爱好者，就是三毛子和四毛子。当时中国基督徒本就不多，可以说经过庚子事变，本土教会的精英丧失大半，特别是本土牧师损失惨重。那时要找到比较有知识，又信了主的教会同工本来就很难，这一下大多殉道了。

所以1900年，成为了中国教会史上的转折点和分水岭。

19世纪的基督教和20世纪的基督教

以1900年为界，我们可以把基督教来华，分为19世纪的基督教和20世纪的基督教。

除了中国教会及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神学路线的变迁，也可以1900年为一个象征性的界限。这样我们需要稍微回顾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西方教会的状况。

19世纪，可以称为“宗派的世纪”，因为这是一个宗派大爆炸的世纪。19世纪前的新教，宗派还没有那么多。新教改革一开始是三大派。一个路德宗，基本上集中在北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个改革宗，随着英美的兴起，基本上变成全球性的；还有一个重洗派。

在英国的改革宗里，又出现了几个宗派，比如圣公会，是一种“国家教会”，它的39条信纲基本上是加尔文主义的。在第一次大复兴里，又出现约翰卫斯理与怀特菲尔德的分歧，卫斯理不太认同预定论的教导，他受到荷兰阿米念主义的影响，所以就与怀特菲尔德分道扬镳了。但他们其实都是圣公会的人，卫斯理一开始并不想脱离圣公会。但他的系统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后来就从圣公会脱离出来，变成卫理公会，或叫循道宗。

到清教徒时代，又出现从教会观来讲最激进的一派，叫公理会。他们相信任何一间堂会，哪怕只有20个人，只要它是一间

堂会，就是绝对独立于其他任何教会的。每间教会都直属耶稣基督，所有教会都是中央教会。其他任何教会都不能对它有任何属灵权柄。近两千年的教会史，到了公理会出现的时候，可以说进入最糟糕的状况。在教会观上，教会开始变成了原子式的教会。公理会意味着现代教会的诞生。它等于许可了一个教会无限分裂的合法性。任何一间教会，都可以独立地相信我所相信的，独立地按我的理解来理解圣经，我也不承认其他任何人对我有看得见的权柄。

公理会的这种绝对独立的堂会主义，是导致19世纪宗派大爆炸的支持力量。公理会因为太绝对地坚持独立堂会主义，所以在英国它被逼迫也是最厉害的，圣公会反对它，长老会也不同意它。因为它的教会观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太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对教会的原子式分裂影响太厉害了。

另外就是长老会，长老会是诺克斯回到苏格兰建立的，在英格兰因为有圣公会作为国家教会，长老会体制一直没有被建立起来。

公理会逃到荷兰去，1620年的五月花号，第一个去到美洲的就是他们。公理会的人在荷兰，遇到了从德意志地区过来的重洗派，重洗派大部分是在中北欧，他们在那边受逼迫。两个受逼迫的宗派遇见了，他们就融合了，互相影响，惺惺相惜，这样产生了一个新的宗派，是对现代教会影响最大的宗派，即浸信会。

重洗派的洗礼观，说我们反对婴孩洗礼，相信人长大后信而受洗，而且我们反对点水或洒水，相信受洗必须全身浸水；而公理会说教会只能是绝对的堂会主义，任何两间教会之间，不能有 权柄，这样就不必担心宗教迫害了。这两个观念合在一起，就是浸信会。

到这时，新教的主要宗派，用十个指头还是可以数完的。

接着，一旦进入19世纪，宗派大爆炸就开始了。宗教迫害的消失，带来了教会的无限分裂。包括异端的大爆炸。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四大异端，安息日会，摩门教，耶和華见证人，还有基督教科学派，都是19世纪早期出现的。然后到了19世纪末期，又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派神学的兴起。自由派神学最早从德国开始，从士来马赫开始，然后影响到英美。

到19世纪末，几乎所有宗派已是自由派的天下。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教会的无限细分，和神学的不断自由化，是一个整体。第二，教会的无限细分，和神学的自由化，都是教会无力回应启蒙运动的结果。理性主义与科学昌明，成为19世纪末的主流文明。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叫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是整个世界的潮流，整个世界的偶像。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社会层面上的民主理想和科学层面上的理性主义，他们就是新世界的精神。

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说我们相信耶稣是可以的，但说我相信圣经每一句话都是上帝不变的启示，说我相信童贞女怀孕生子，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挺傻的，最重要的是别人觉得我挺傻的，特别是社会上懂科学懂哲学的人，给教会带来很大的一种文化压力，在智力上碾压你。所以整个自由派神学兴起来后，就试图寻找一种信仰与科学不冲突的方式，来重新阐释基督教。主流的方式，就是将信仰理解为个人的，而不是公共的。或将信仰理解为精神的，而不是社会的。或将信仰理解为伦理的，而不是理性的。这种思路，其实是宗教混合主义的思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几乎笼罩了所有欧美教会。

到1895年，美国长老会的一些保守派就率先起来。也包括一些其他宗派，他们在1910年开始出版一套小册子，叫做基本要道丛书。后来他们就被称为‘‘基要派‘‘，他们提出基要真理的五点，说相信这五个基本真理的，才是圣经和传统意义上的基督徒。

第一，相信圣经的权威性，相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神的话。第二，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童贞女怀孕生子是真实的。第三，相信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真的死了，祂的死是为了替我们赎罪。第四，相信耶稣第三天真的复活了，承认死而复活的真实性。第五，相信耶稣基督要再来，有末日的审判，世界进入最后的新天新地。

你说，连这五点都不相信还能叫基督徒吗？其实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上帝对中国教会这一百年来的特殊保守。今天全球可能有70%以上自称基督徒的，但并不相信这五点。或者他们说，我们对此有另外的理解方式。

所以进入20世纪后，基督教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宗派仍然林立，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宗派与宗派之间也有重大的神学差异。但是20世纪的基督教，最重要的区别已不再是宗派之别。而是传统的基督教与现代的基督教之别。

在19世纪，你问弟兄是哪个教会的，“我是长老会的”，“我是浸信会的”。我大概知道你的信仰是什么。宗派，就像品牌一样，有识别的作用。但在20世纪，这么问就不管用了。你是长老会的吗，那你是哪一个长老会呢，是同意女性按牧和同性恋合法的长老会吗。

基要派在1900年前后站稳脚跟。于是，20世纪的基督教，出现了一个跨宗派的基要派与自由派之分。基要派也可以叫保守派，后来大部分转型为福音派。自由派也可以叫现代派。基要派和自由派之分，进入到了所有宗派里面。你不能说长老会是保守的，浸信会是自由的。不是。任何宗派中，现在都有非常保守的一小部分，同时也有自由化的一大部分。

比如在中国家庭教会，如果你说自己是长老会，意味着你是保守派，而且保守得可能让人讨厌，有点让人反感。但在美国，你说自己是长老会，也许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自由派。美国长老会大概有300多万人。其中约有250万是自由派长老会，最大一个叫PCUSA，它有超过200万会友。比较保守的长老会大概有七八个，其中最大的叫PCA（北美长老会）。他们有30万会众。是人家的十分之一。其他保守派长老会就更小一点了，最少的一个只有1000人。所以加起来是个零头。

这些全球教会的变迁，跟20世纪的中国教会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第一，19世纪来华的宣教士向中国传了一个什么样的福音？第二，20世纪来华的宣教士向中国传了一个什么样的福音？

1900年前后的扭转

事实上，1900年前后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第一，1900年殉道的宣教士都是19世纪来华的宣教士，或许有些刚来几年就碰到庚子事变，但大部分殉道士已在中国住了几十年。

他们向中国所传的是一个古旧的福音，是清教徒所传的福音。他们绝大部分都来自于英美，无论是哪个宗派，都是基要派信仰，都受教于清教徒的古旧福音。

马礼逊本人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传统。他来华之后学了中文，翻了圣经，编了辞典，他也编写了‘‘耶稣教教理问答’’。这个问答不是完全翻译小要理问答，因为他加了一些中国传统的东西，比如他问，一个人可不可以有妾呢？但他的耶稣教教理问答，基本上是按照小要理问答的神学和结构写的。同时，直到20世纪初期，教会出版事工最主要的机构和书籍，都是长老会办的。譬如美华书局，每年印刷超过一亿页的门训材料。商务印书馆的前身，也是长老会的机构。

所以19世纪的中国教会所领受的，是一个纯正的宗教改革的信仰，它强调上帝的恩典，强调人的罪和人的悔改，强调唯独因着信心得救。在很大程度上，19世纪的中国基督教，信奉加尔文主义的福音，因为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在19世纪来华宣教士中占的比例很高。

第二，这班人来中国几十年了。好多人都没有回去过，有的回去很短时间又回来了，所以他们不太了解、或不太受影响于母国最近几十年的神学变化，母国自由派出版的大量书籍，他们也读的比较少。这是上帝很特别的保守。

有次国外一个牧师问我，“中国家庭教会为什么到现在，几乎都是保守派呢，都相信圣经绝对无误啊？在美国这样的基督徒很少”。我说，“这要感谢主啊，主要因为我们书读得少。我们读现代人写的书比较少，我们读的一般都是已归回天家很久的圣徒的书。你们读了太多还活着的人的书。所以我们的信仰比较坚固一点”。

可这班宣教士在1900年，大多殉道了。之后十年，出现了在华宣教士的大换血。差不多到1930年，在华宣教士的最高峰达到六千人。但这也是一次神学立场的大换血，一个重大的变化出现了，这六千宣教士里面，差不多有接近五千宣教士，都不再从事与福音工作直接相关的传福音、布道、植堂与牧养的事工。那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做医疗、教育、慈善和各种文化事业。这批新宣教士深受自由派神学影响，不太在乎基督代赎的“福音焦点”

，而过于在乎信仰对社会的影响。他们基本上都是饶申布什这些现代派的信徒，持守很强烈的“社会福音”，就是把一切社会与文化工作，都视教会为上帝工作的使命，并强烈地追求社会与文化的成就。

他们来到中国有两个落差，如果你是当时的宣教士，你想自己来到中国会有什么感受？第一个感受是“啊呀，这里的人不认识耶稣，他们拜偶像”。马礼逊来华，在日记里向主祷告说：这个民族多么可怜啊，因为这个民族没有安息日。他们不知道在七日中有一日上帝所赐的安息。这是第一个感受。

但第二个感受也同等强烈，甚至可能更强烈，就是这里太穷了，太脏了，太野蛮了，太愚昧了，太专制了。在社会各层面跟母国之间的落差太大。所以很多宣教士就讲，耶稣在福音书中，第一是传福音给这些人，第二是怜悯这些人，大麻风得医治，瘸腿的行走。耶稣同时做怜悯的工作，和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当它们来到中国的时候，看到这个民族太苦，太专制，太黑暗，太穷。于是就“动了慈心”，我们拿一块钱出来，就可以在这里买头牛，差距太大了。所以宣教士希望通过教育和医疗来做怜悯的工作。所以在传教早期，教育、医疗和布道，被宣教士称为“三位一体”的事工。

这么做错了吗？一开始并没有错。教会传福音给中国，也对中国社会充满怜悯。福音关乎基督代赎的焦点，福音也产生对社会的关切和参与。可是在世纪之交，随着自由派神学兴起，教会开始头重脚轻了，宣教的焦点失衡，宣教士们越来越把两个目标过多地捆绑在一起。社会参与和文化改变没有错，但将“福音焦点”从中剥离出去，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等于将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剥皮抽筋”。如果基督的代赎和人性的全然败坏，不再是一切社会行动的前提与焦点，那么，一切世俗的文化与思想潮流，就会轻易地裹挟教会思想。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派（又称现代派）在20世纪前半叶，基本上都变成了左派人士（剧透一下：这正是理解1949年后三自爱国运动的一个关键）。

但在福音书中，疾病得医治从来不是福音的必然结果，也不是今生的普遍诉求，而是神的国大有能力地临到这个世界的兆头。但对越来越多的宣教士来说，他们的一个目标是想让中国人

信主，让中国成为信耶稣的族群；第二个目标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文明的、民主的和自由的国家。换言之，他们同时传了两个福音，一个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个是关于西方文明的福音（再次剧透：这正是理解五四之后的反宗教运动的一个关键）。

于是他们大量翻译西方著作，大量从事各种社会工作。这些方面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影响也非常大。《万国公报》是宣教士办的，对戊戌变法影响也很大，梁启超做过李提摩太的秘书。他们都是通过宣教士的介绍，才知道西方社会原来这么好，至于耶稣就另说了，但其他方面都这么好。他们通过宣教士了解这一切。甚至也是在宣教士的文章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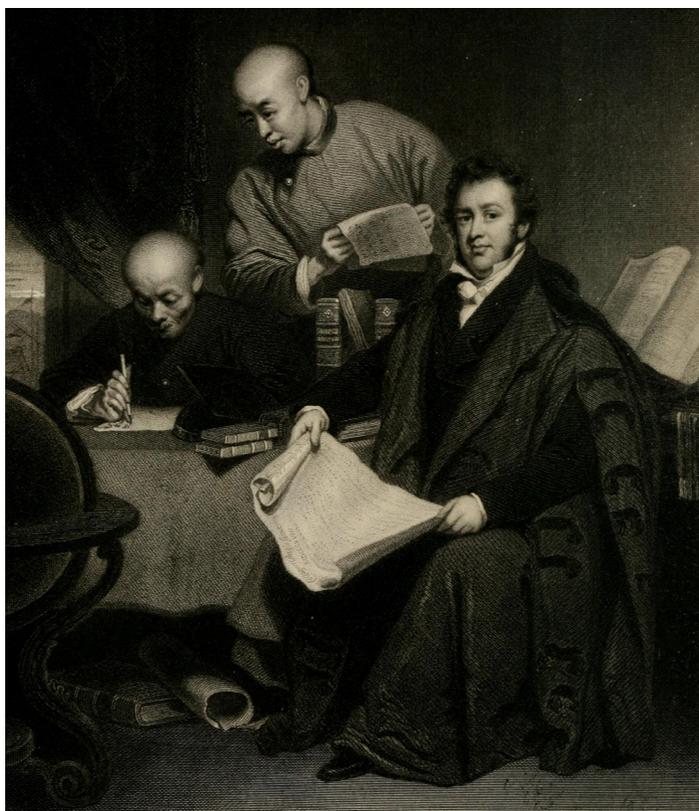
所以到20世纪之后，有一些保守的宣教士，还活着的19世纪的宣教士，他们就不断地给国内的母会、差会写信，大声地疾呼：“不要把受到现代派神学影响的人差到中国来！保护中国成为一个不受欧美潮流影响的、保守的基督教信仰的基地吧”。

但是，第一，没有办法，因为当时大家都受自由派影响，于是还是越来越多受自由派影响的宣教士来到中国。第二，然而一百年后回头看，原来上帝真的听了他们的祷告和呼求，上帝的确保护了中国教会，使我们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基本上不受欧美自由派潮流影响的、保守的基督教信仰的基地。只不过，上帝有祂自己神恩独作的方式，有祂难以意料的雷霆手段。谁能料想上帝的作为呢。谁做过祂的谋士呢。就像保罗祈祷说，我要去罗马。但谁能想到上帝带他去罗马的方式，是捆绑和坐牢呢？

在中国，整个20世纪的基督教与19世纪的基督教有极大的差别。我们下次会继续讲，20世纪的前50年，如何在中国教会中清晰地形成了“两个基督教”，就是一个基要派的基督教，和一个自由派的基督教。这两条路线在1949年前就已经成形。这是我们理解1949年之后的中国教会，理解这60年来的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两条道路的关键背景。并不是单单因为共产党来了，出于政治压力才形成了家庭与三自之分。实际之前就已有清楚的脉络，甚至这脉络也不单单出于中国教会，而是整个全球教会都已出现了这样的区分。

结束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中国教会历史中掌权，你也在中国世俗历史中掌权，因为万事互相效力，都是为神所用的。主啊，就像我们个人生命中的很多事情，在当时不能察觉到你的慈爱，不能看到你奇妙的带领。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总能看见你在当中的眷顾，看见你的忍耐，甚至当你儿女悖逆时所受到来自你的击打跟管教，都从来是预备着下一次复兴和你伟大的拯救计划。所以我们为这一切感谢主，也求主带领我们这一门课程，带领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中的祷告，阅读，和思考。感谢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第二章

中华归主五十年



图：1931年华北神学院毕业同学与教员纪念

前情提要

第一章讲到基督教前三次来华，跟新教来华的区别是什么呢？稍微回顾一下，一个是向北、向北、再向北；一个是向西、向西、再向西。19世纪来华的基督教，跟20世纪在华的基督教的差别又是什么呢？19世纪是宗派林立的世纪，到20世纪，自由派与基要派之分，变成教会内部最主要的区分。以1900年为枢纽，20世纪来华的宣教士，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局，就是接受自由派神学的来华宣教士，如过江之鲫，越来越多。

两个基督教在中国

稍微看看，1949年之前，20世纪前50年，是怎么一步步在中国教会中形成了自由派跟基要派两条路线，两个不同的教会系统，在某个意义上甚至说是两个不同的基督教。

一个是基要派的基督教，可以叫“中华归主”基督教。一个是自由派的基督教，可以叫“主归中华”基督教。这就是家庭教会和三自爱国会的最初源头。其实中华归主的英文，来自杨格非的一句名言，他说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这样，也不是为那样，唯一的目的是“为基督征服中国”。但到了20世纪，这个说法已经被宣教士们不耻了。19世纪“为基督”，20世纪“为中国”。19世纪的宣教士对中国文化毫不妥协，20世纪的宣教士对中国文化十分热爱。

我描绘的是一个趋势。1900是象征性的转折。但其实，1890年的第二次在华宣教士大会上，这两个基督教的冲突就已经白热化了，围绕“祖先崇拜”问题，丁韪良与戴德生之间，已是针锋相对，不能调和。丁韪良说祖先崇拜不是拜偶像，教会需要尊重中国文化，要宽容。戴德生尖锐反对，直接指控这是异端邪说。但在19世纪末，并没有形成“戴德生的基督教”和“丁韪良的基督教”之分。因为戴德生在当时的大会上，请所有认同他的人起立。结果台下全体起立，没有一个人认同丁韪良。

这就是我说的，19世纪末期的在华宣教士，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最保守的基要派，基本不受母国的自由派神学影响。基要派与自由派，是99.9:0.1。这个优势，直到1900年的大屠杀之后，才被改变了。

有位官方学者这样表述，说19世纪的宣教士总想当中国人的“老师”，20世纪的宣教士终于愿意成为中国文化的“学生”。所谓孺子可教也。如果我问，19世纪的宣教士你们很熟悉的，对中国教会有很大贡献和影响的，能不能举出一些来？马礼逊，戴德生，伯格理，杨格非（对，杨格非是到你们武汉的）——盼望每个人都知道来自自己家乡的是哪一位。还有谁？狄考文，富能仁，苏慧廉（你是温州的吗，苏慧廉是到温州的）。你们都听过他们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

但到了20世纪，来华宣教士对中国教会有很大影响和贡献的，基本上就没有了。你们能说出任何一位对教会大有影响的牧师吗？没有。有名的宣教士多半是对中国社会文化有影响的人物。你们知道谁？司徒雷登，赛珍珠。对，赛珍珠是著名作家，父亲是美北长老会的宣教士，她自己也是宣教士。但她强烈反对基要派，反对“那些喋喋不休的布道”。在她和创办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梅钦之间，曾经爆发了一场将20世纪的基要派与自由派、也将当时的中国教会与美国教会连接起来的争论。赛珍珠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大概是在华宣教士中社会名望最高的人，她回国发表了对保守派宣教的目的和方式的批判。梅钦严厉指控她背离了基要信仰，要求宣教委员会将她驱逐。结果梅钦被批判为不宽容，赛珍珠倒很有风度，承认梅钦的判断是对的，我就是个自由派怎么样，人家华丽转身，主动退出了长老会。

民族主义的教会梦

而对中国教会来说，1900年的结果导致民族主义的高涨，这个思想也逐渐进入教会中。落后挨打的民族危机，使教会也产生了强烈渴望摆脱西方宣教士的，一种“青春期”诉求。

1910年的爱丁堡宣教大会，是中国牧师第一次出席全球教会的聚会。年轻的陈静怡（他成为1949年前的自由派基督教的主要领袖），在大会上宣称，教会一直都是church in China（在中国

的教会)。但现在我们需要church of China (属中国的教会)。中国人要有中国人自己的教会。其实这是三自爱国运动最初的版本，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教会梦”。但这个梦不是把教会的梦做大了，而是把教会的梦做小了。从这时开始，本土的自由派领袖开始登上舞台，教会梦开始成为中国梦的一个支部。

其实这个民族主义诉求与自由派神学的结合，也有一部分合理因素。因为保罗去任何一个地方宣教，他的策略都是去当地的头一个城，以弗所，腓立比，在那里传扬福音。因福音就生出神的子民，建立教会。于是他就在信徒中间一年或三年之久，坚固他们。这个建立教会的过程，最后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在他们当中选立长老，他对提摩太也说，你要在各城设立长老。设立众长老之后呢？他就说这个地方我已把福音传遍了，要去另一个地方了。这个地方的教会就要“交托给神恩惠的福音”，这样就完成了宣教。保罗从来不会直接保持对当地教会的控制，更不会长期如此。

但在这方面，宣教士来华一百多年了，到1907年第三次宣教大会，刚好是马礼逊来华100年。这时大家才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到1907年为止，教会来华100年了，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把他们“交托给神恩惠的福音”的当地教会。差会和宣教士们几乎掌握着所有中国教会的治理和教导权柄。

这导致了中国传道人对抗教士的普遍不满和矛盾。青少年翅膀硬了，父母却管得很严。我们大概都有类似经历。但这并非都是宣教士们的问题。1900年是空前的教难，在中国北方，大部分的华人牧师和传道人都殉道了，数十年的本土精英，付之一炬。差会可以源源不断地重新补血，但本土精英不是一夜之间能形成的。

所以在20世纪的中国教会史上，出现了两次“羊没有牧人”的局面。就是家庭教会一直喜欢说的这句话，叫“羊多牧人少”。一次是1900年之后的20年。一次是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20年。

文革一开始，地上已经没有一个牧师了。因为牧师要么已经卖主了，要么就在牢里，要么被劳动改造。政府认为牧师是吃闲饭，好逸恶劳的人，你们不上班让信徒供养你们，所以之前剩

下的现在都下到干校劳动改造去了。地上的教会基本上没有传道人。

所以中国家庭教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平信徒福音运动。它是从平信徒兴起来的一个教会运动。在最艰难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1949年前按立的牧师还在带领教会。没有，一个都没有，有也是叛徒。所以神是在旷野中，就是圣灵在平信徒中兴起一批游方布道的牧人。有些平信徒被兴起来时，圣经都没读完一遍，因为手抄的，很少见。但圣灵感动他们，催逼他们，就出来游方布道了。这几乎就是20世纪下半叶的河南教会和安徽教会的历史。所以家庭教会是一个平信徒游方布道的奋兴运动，是我稍后要讲到的1927-1937年的奋兴运动的继续。

1900年的世纪婴儿

直到1920年代初，华人牧师的数目，才开始恢复到1899年庚子教难之前的水平。花了整整20年。因为20年一代人才能生长起来。但是上帝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就是在1900年前后，为中国教会预备了一批“世纪婴儿”。这批世纪婴儿，到20年代后陆续登上教会舞台，然后上帝使用给他们，赐下了1927-1937的大复兴，形成了中国本土的基要派教会传统。这批人也成为影响中国教会直到今天的一代属灵伟人。

这批世纪婴儿，包括王明道（1900），家庭教会最重要的属灵领袖。计志文（1901），30年代奋兴布道运动的杰出领袖。宋尚节（1902），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之一。倪柝声（1903），开创了中国的基要派教会中一个最大的教派聚会所。还有王载（1898），稍大一点，和倪柝声、宋尚节一样，都是来自福建的布道家，被称为“中国的慕迪”。还有赵君影（1906），稍小一点，是40年代大学校园福音运动最重要的领袖。

你们还能说出哪些？丁立美，贾玉铭，他们年长，是王明道的前辈。林献羔，袁相忱，他们年幼，是王明道的晚辈。

这批教会的世纪婴儿都在庚子年前后相继出世。唐崇荣牧师曾说，“这表明神是历史的主宰。你杀掉一批，我就生一批更伟大的出来”。

到了1920年代，当他们一登上中国教会的舞台，教会的属灵领导权和属灵权威，以及19世纪宣教士向我们所传的那个基要派的福音，就整体上从宣教士群体，转移到本土传道人团体了。一个基要派的基督教和一个基要派的中国教会，就在中国形成了。这要稍微晚于另一个自由派的基督教的形成，因为自由派这时已有一大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了。这是上帝很特别的运筹帷幄。

其中王明道的经历最特别。他父亲是长老会信徒，庚子事变带着全家一起逃难，大概是逃不出去了，总之那时非常艰难，他父亲经历到信仰上的软弱和危机，就悬梁自尽了。他当时还在妈妈肚子里，母亲身怀六甲，躲进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王明道是在美国驻华使馆出生的，按中国人的观念，他叫遗腹子。这是上帝赐给中国教会的一个遗腹子，也是19世纪的在华宣教士留给20世纪的中国教会的一个遗腹子。

这群世纪婴儿都有自己的成长路线，我们就不详细谈了。王明道出生于1900年，记他比较简单，1925年他25岁，加入了当时一个重要的基要派领袖联盟，叫“笃信圣经会”。他年龄最小，担任秘书。其他人有贾玉铭、余慈度、李渊如、王峙等。1927年他27岁，创办了《灵食季刊》，“中国大复兴”就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1955年他55岁被捕，家庭教会运动开始了。

基要派的阵营

我稍微列举下基要派教会的阵营。其中几大块，先看宣教士和他们建立的宗派。到1920年代，大部分宣教士和他们所领导的宗派都自由化了。

因为辛亥革命，再次带来民族主义的高涨。中国要独立，要废除前清的条约，不要受外国人欺负。这时教会就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替罪羊。如果你排外，如果你反对帝国主义，你不可能不连着基督教一起反。

1911到1922，是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这个文化上的反教情绪一直在酝酿。到了1922，中国迎来了1900庚子事变后，规模最大的新一轮反教运动，称为“非基督教运动”。意思就是以基督教为非。你为非，他作歹。非基督教运动又很快变成“非宗教运

动”，就是以一切宗教为非。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既然19世纪的基督教与20世纪的基督教不一样了。那么19世纪的中国反基督教的原因，也跟20世纪的中国反基督教的原因不一样了，甚至是截然相反了。

19世纪的中国反对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是洋玩意，是“西方的”，跟我们老祖宗的东西不相配。但到了1922年，反教的理由变了。因为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了新世界的偶像。而这两位“先生”都是从西方来的。因此反教的理由，现在不是因为基督教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基督教“不够西方”，不够现代，不够文明。原来基督教已经被西方抛弃了，西方现在最好的东西不是基督教，而是民主和科学。

总之，以前嫌你太洋，现在嫌你太土。这是新文化运动起来反基督教的原因。这也是自由派神学笼罩整个西方教会的原因之一。因为你不与时俱进，就要被视为中世纪的愚昧产物了。

这时，和庚子事变一样，也出现了文化层面的冲突跟国家层面的冲突的再次结合。首先，非基督徒运动是从北大的学生和教授们开始的。陈独秀，蔡元培，胡适，你们喜欢的所谓民国大师，几乎都是反基督教的。只有几个人，钱玄同和周作人他们站出来，主张宗教自由。那时教会没有什么人能站出来护教。自由派也有一批教授，但他们很尴尬，说话也没有分量。而基要派教会才刚刚满20岁，根本没有文化上的代表人物。周作人他们就仗义执言，说你们这样欺负基督教是错的。他们就发表了一个《宗教自由宣言》。这几个人虽也有名望，但在反教风潮里人微言轻。这是文化层面上的反教，以北大为代表。

但同时，国共两党的左派都积极掺和推动，是“非基运动”中的政治力量。跳得最起劲，幕前幕后做了大量工作的，就是共青团。恽代英是早期共青团的领袖，特别负责宣传部。他讲过一句名言，你可能听过，叫“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所以任凭基督教传扬下去，就要亡国亡种了。国民党的左派代表是汪精卫，他是坚决把教会赶出学校的主要力量。

非基运动从1922到1927，完成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所谓“收回教育权”，消灭了教会学校。学校都还在，但被教育部接管了。不再承认教会有办学校的权利。出钱可以，出人也可

以，但不能管理学校，不能将基督教放到必修课程中去，更不能要求师生参加崇拜。尤其是在小学和初中（1-9年级），是彻底把基督教从教育中赶出去。在高中和大学，宗教教育可以作为选修课和课外活动而存在。

关于基督教教育，我们常反思一件事，就是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一个反教主力，就是教会学校的学生群体。带头上街示威游行，带头反对宣教士，带头要求“请把我们收回为中国学校吧”的，竟然就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们。特别是五卅运动爆发，导致国内民族主义的一个浪潮，当时几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大学、中学都上街游行，集体签字要求政府收回学校，赶走西方宣教士。

这正是自由派神学，这“另一个基督教”在中国形成所导致的局面。当宣教士们离开了灵魂得救的福音焦点，把教育从“为基督”变成了“为中国”，从“为教会”变成了“为社会”。教会学校所培养的绝大多数人，就都是随从世界潮流的人。而当时的潮流就是左派思想。包括当时的英美在内，世界进入了“粉红色年代”。苏联是大红色，因为有大红龙嘛，血流成河。而整个欧美都是粉红色，就是今天所谓“白左”的祖先。既然全世界的潮流都是左派，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也是左派，所以教会学校逐渐成为中国左派思想的大本营。王光美，江泽民，江竹筠（就是红岩中的江姐），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邓小平的母亲也是教会学校毕业的。连方志敏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而他的部下却绑票杀死了宣教士。

那些受自由派神学影响的宣教士们，太想通过传扬基督教来改变中国现实。怜悯和文化事工的目标，开始步步压倒福音的焦点。而他们对福音和圣经的理解又受到自由派神学影响。19世纪后半期的高等批判，形式批判，已开始否认圣经的权威性。此消彼长，短短20年后，中国教会就自食其恶果了。

1927年：大复兴

但1927年却是一个想不到的转折点。圣灵浇灌中国，做了一件看似偶然而奇妙的事，使这一轮反教运动忽然消停了下来。在这一年，上帝让那个以武力统一全国的人信了耶稣。一开始是

冯玉祥，他占领北京，统一北方，最有可能统治全国。他不但信了主，而且为主火热，在北方发起了一场灭佛运动，在军队设立随军牧师，曾经一次布道，就有5000士兵受洗。《时代周刊》的封面刊登了他的照片，称他是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一支私人军队的“基督将军”。不过，没想到的是，最终统一全国的却并不是他，而是他的对手蒋介石。但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蒋介石竟然娶了宋耀如牧师的女儿宋美龄，因此信主受洗。而宋牧师的另一个女婿就是孙中山。所以我鼓励那些家里有几个女儿的母亲啊，你们在家中的敬虔服侍，很有可能改变整个国家。

这样，一场持续十年的大复兴，也从1927年拉开了帷幕。这一年，王明道创办《零食季刊》，计志文成立了“伯特利布道团”，倪柝声在哈同路文德里开始了聚会处，广州举行了第一届培灵研经大会（香港也在第二年举办培灵研经大会，成为后来一直持续的港九培灵会）。“培灵”二字由赵柳塘牧师提出，从此成为中国教会特有的大复兴术语。而宣教士中最保守的一个基要派组织“基础联盟”也在1927年成立。战火稍停，圣灵浇灌，整个基要派基督教的大复兴即将开始。另外，自由派的基督教，也在这一年进入一个高峰，就是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

之所以说是奇妙转折，因为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在1927年攻下南京时，还发生了整个20年代反教运动中最恶劣的“南京事件”。士兵烧毁教堂，杀死六位宣教士，其中包括南京金陵大学的副校长文怀恩。这个事件轰动海内外，大家本来对蒋介石的军队还挺有好感，期望他统一中国。结果很多宗派在那时开始撤离中国。

但接下来，神却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不是从天上降下火来击杀蒋介石，而是给蒋介石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宋美龄的妈就跟他说，你必须信耶稣，他说那我得把圣经好好读两遍。结果他行军途中就开始带着圣经读，后来在上海跟宋美龄结婚，然后受洗。他是先结婚，后受洗的，你们千万不要学他。蒋介石信主受洗后，整个国民党内的反基督教浪潮就消退了，直到抗战爆发之前，上帝给了中国十年和平，也给了教会十年大复兴。

神是怜悯的，神也是公义的。若以旧约的语言来描绘，上帝饶恕了蒋介石，对他说，介石，介石，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你若悔改，我就将你高举，把我的女儿嫁给你，把这块土地交给

你统治。你的罪我必要追究，但你统治这个国家还可以到1949年。之后你要每天清晨起来读经，祷告，这样你还可以保留一个岛，直到八十岁。我必在金门为你设一个边界，我要兴起风浪，使你的仇敌在那里被杀，必不能过来。

注意，这场大复兴在整体上，并不是宣教士点的火，而是一群本土的奋兴布道家的兴起。当然这些布道家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们等会再看基要派的第二个板块，就是宣教士中的基要派。下面我们来看大复兴之前的本色化运动。

“三自”和本色化运动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回头说1911年后就出现了“三自”的观念和本色化运动，或者称为中国自立教会运动。

三自就是自治，自传，自养。好不好？好得很。因为这基本上就是长老会植堂的原则和精神。而“三自”最早也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倪维思提出的。

我们植堂时，就是看这三个目标。第一是财务上的自养，你们哪一年能做到财务独立，不再需要母堂的财务支持，两年？三年？还是要九年？这是自养的目标。但自养的目的，不是问什么时候能把钱还给母堂，而是说，你何时能自己成为母会，再把钱给出去，帮助建立新的教会。也就是问，你什么时候成家，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并且生养众多？

我们现在用“种子基金”的方式帮助植堂。比如迦南堂，我随口举例，假如母堂每个月支持他们七千元，三千五帮助供养传道，三千五帮助教会事工。半年后，我们就要求迦南堂每月开始返还10%，就是700元。第二年之后每月返还15%，第三年30%，第四年40%，第五年60%，直到将母堂支持他们的钱，全部返回种子基金。注意，返回的意思，是使“种子基金”可以继续滚动，支持下一个植堂。每个堂也都以这种方式，参与了大使命。所以植堂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实现自养。

第二个目标是自治。自治的标记是建立了自己的长老会，“在各城设立长老”。举例，德阳的秋雨青草地教会早就自养了。

母堂不给他们一分钱，我们去年开始恩约堂时，他们奉献了几万元；我们重建归正学堂时，他们也奉献了几万。他们在财务上已成为一个可以给出去、也愿意给出去的布道所。但他们仍然不是一间堂会，因为只有一位长老，就像一根筷子无法吃饭。所以他们还是以母会的长老会为他们的长老会，直到有了第二位长老，建立自己的长老会，这样它就自治了。

第三个目标就是自传。比如我们有七个布道所，平时都是实习传道讲道，但掰饼和施洗的时候，就需要母堂派牧师和长老去。因为大使命的一个外在标记，就是“为万人施洗”。但圣职的呼召没有被建立和确定，就不能自传。教会目前压力特别大的一件事，就是布道所太多，但长老太少。所以大家要切切祷告，使传道们能早日按立，成为牧师、长老，使布道所早日实现“三自”。

这是一件最幽默的事，其实中国的家庭教会是最“三自”的教会，而中国的三自爱国会却是彻头彻尾“不三不四”的教会。第一，三自系统很多传道人的薪水仍然有政府补贴，没有自养。第二，也没有自治，因为在教会的长老会之上还有一个长老会，由一群不信的人组成。这个冒牌长老会叫统战部，又叫宗教局。第三，他们也没有自传，因为传道需要政府批准，不准跨地区传道，不准给18岁以下的人施洗。所以他们是彻彻底底“反三自”的教会。

所以，此“三自”非彼“三自”。1911年前后，中国教会的最大诉求，是在西方宣教士及差会、母会之下实现自立，就是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是一个正当的、教会论上的目标。你养儿是这个目的，宣教也是这个目的。不是让人家一直成为你的“子教会”，而是让它成为独立堂会。但宣教士们有点迟缓，加上1900年的大换血，所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后，中国教会等不急了，就站出来反对宣教士，努力想从他们中间独立。这个过程也产生一些彼此伤害，也让很多宣教士伤心。但反过来，一部分中国教会觉得宣教士们太霸道，老是不给我们权柄，老是觉得我们不够考牧条件，不够按立条件，不可以当长老，不可以当执事，总把我们当未成年人看。这里边有很多主内的恩怨情仇。这些恩怨情仇不化解，到1949年后政治运动一来，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变成了很可怕的控诉传道人、控诉宣教士的运动。所

以，教会内部若有问题没有处理，只要政府的逼迫一来，弟兄之间什么控诉都出来了。

但还有一部分教会，他们之所以脱离差会，不是因这些恩怨情仇，而是看见自由派神学逐渐控制了宣教士群体。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分争。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好意。这一等人脱离西方差会，是出于忠心。他们脱离后，就成了中国的基要派教会。那一等人脱离西方差会，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他们脱离后，就成了中国的自由派教会。

山东大复兴

大复兴运动有两个重要地区。一是山东，一是福建。主要的奋兴布道家 and 基要派力量，几乎都来自这两个地区。来自挪威的女宣教士玛丽孟森，中文名字很好听，叫孟慕真。她写了《中国大复兴》一书。有人称玛丽孟森是“中国家庭教会之母”。不过，这显然夸大了宣教士在这场大复兴中的位置。大复兴的核心力量，是从整体上脱离西方差会和宣教士的本土奋兴布道家群体。大复兴是整个中国教会“被托付给神恩惠的福音”的一次属灵权柄的彻底转移。这也是上帝为抗战爆发及1949年的大变局所做的预备。

福建是另一个大复兴的源头。因为庚子教难是在北方，对南方影响很小。南方没有那么多人殉道，就几个白莲教的人晃了一下就跑了，没有太大的势力。而福建是整个教会进入中国最根深蒂固的基地，它基本上没有受到1900年的冲击，也没有本土精英的丧失。于是，中国一半的奋兴布道家都是从福建冒出来的，而且大都出于“三代基督徒家庭”。19世纪的基督教在福建生儿养女，直到生出了倪柝声，宋尚杰，王载，还有唐崇荣。唐牧师幼年丧父，是妈妈带着他下南洋的。

回到山东。另一位宣教士柯理培写了《山东大复兴》一书。1860年后，山东逐渐成为长老会的基地。长老会从闽南开始，沿着海岸线，不断北上。最后，他们选择了山东，视为“中国的新英格兰”。狄考文这一批长老会的精英都在山东，在登州建立文会馆，这是中国第一间教会学校，后来成为中国第一所大学，齐鲁大学的前身，也被比附为“中国的普林斯顿”。还有葡

葡萄酒，也是最早带去山东的。所以长老会传统是用葡萄酒分杯。只有山东长老会才有葡萄酒。但到了1920年代，自由派神学西风东渐，齐鲁大学的神学院也很快就自由化了。

1900年，上帝还做了一件奇妙的事，山东是教难的重灾区，当年登州文会馆只毕业了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就是未来的基要派基督教的一代属灵巨人贾玉铭。

另外，还有一位在庚子教难中逃亡出来的长老会宣教士，叫古约翰。他的主要服侍地区是东北和山东，他所到之处总是能看见复兴的火。古约翰是1927年开始的山东大复兴的种子，上帝透过他，带来了1900年后的第一波复兴运动。

如果说，王明道是上帝在1900年赐给中国基要派教会的遗腹子，贾玉铭就是上帝在1900年赐给中国基要派教会的毕业生，而古约翰就是上帝在1900年赐给中国基要派教会的幸存者。一个遗腹子，一个毕业生，一个幸存者。在1900年的属灵版图中，没有其他任何事，任何人，比他们更重要。

基要派宣教士

这样，我们就转到中国基要派里边的第二个阵营，就是宣教士中的基要派。他们在20世纪的宣教士中是少数派，通常被视为不受欢迎的“麻烦制造者”。但对20世纪的中国教会、尤其是对家庭教会而言，没有其他宣教士比他们有更重大的贡献。除了古约翰以外，还有两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位叫白秀生，听上去像秀才，来自美北长老会，被称为“中国基要派的先锋”。他成立了圣经联盟，把宣教士中的基要派联合在一起。宣教士一般夏天去哪里避暑？最著名的两个地方，就是庐山和鼓浪屿。20世纪的中国史，凡是有人上庐山开会，都是不得了的大事。那年夏天，这帮基要派宣教士上了牯岭，开了一次庐山会议，影响了中国教会一百年。因为他们成立了一个圣经联盟，发表了一个基要派宣言，并且猛烈抨击来华的自由派，猛烈抨击向中国输出自由派宣教士的美国母会。有点像今天的改革宗，当时中国大多数教会和差会都不喜欢他们。白秀生就是其中最重要、最不被喜欢的一位。

第二位叫赫士，也来自美北长老会，他被称为“中国基要派的基石”。注意，几乎一半以上的基要派宣教士都来自美北长老会。20世纪的西方在华宗派里，只剩下了“美北长老会”一家，是极大影响了中国基要派教会和未来的家庭教会的宗派。不是说其他宗派连一个基要派都没有，而是说在其他宗派中，都是自由派掌权，基要派人士是偶然和零散的。而“美北长老会”里又有不同区会，大部分也都自由化了。只有两个区会，是西方在华宗派中的“保守派大本营”。一个叫“山东区会”，一个叫“江北区会”。其实那一片联在一起。感谢主，一百年后，我们现在也有“徐州区会”跟“山东区会”，希望他们将来再次成为中国的保守派大本营。

赫士和华北神学院

山东区会和江北区会，联合做了一件事，对中国基要派教会有重大影响。山东区会是齐鲁大学董事会的几个主要差会之一。但因为齐鲁大学神学院逐渐受到自由派影响，院长就是赫士。他就带着几个教授，还有当时18个学生，集体出走。在山东滕县建立了“华北神学院”。

接下来，山东区会和江北区会说，好，我们一起来办这个神学院。这件事很像1929年美国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建立。梅钦和几个教授，从已经自由化的普林斯顿神学院，集体出走，建立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成为美国保守派教会的根基。同样的事在中国，提前了10年发生。

有诗为证：秀生作先锋，赫士成基石。耶稣是基督，教会进家庭。

赫士在20年代，写了一篇文章，批判自由派神学对教会的腐蚀，尤其是对教育的毒害。他说，今天中国的教会学校，“将被证明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真是先知的预言。共产党才刚成立几年，他怎么知道这事呢？因为神给他有这样的智慧让他看见

通过华北神学院，基要派的宣教士，就跟本土的基要派传道结合了。贾玉铭接任赫士，做了华北神学院的第二任院长。杨绍唐是华北神学院的毕业生。创办“西北灵工团”的张谷泉牧师，

也是华北神学院的学生。王明道虽不是华神的学生，又不是华神的老师，也经常被邀请到华神去聚会。

基要派阵营的第三个板块，就是内地会。他们是跨宗派差会中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的、直到20世纪上半叶仍然保持了基要派信仰的。感谢主，因为他们不但规模最大，历史最久，也对中国教会影响最深。换言之，从福音事工和基要派立场而论，称戴德生为“中国家庭教会之父”，也毫不为过。

归纳一下，基要派的基督教在1949年前形成，有三个主力，一是美北长老会（两个区会和一间神学院），一是内地会，一是山东大复兴。前两个是宣教士阵营，后一个是本土布道家阵营。

自由派的阵营

自立运动开始后，大部分中国教会，很快就脱离西方宗派，成为自立教会。自立就是跟你没有组织上的关系。自立的动机很复杂，除了民族主义的高涨和要命的自尊心，利益与权力之争，也是自立运动成为一场“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如自立运动的重要领袖，上海的俞国楨牧师。他是长老会，因为会堂的教学争执，干脆脱离，宣布成立自立长老会，后来又成立自立长老会的总会。

自由派的阵营，也有三个最大的板块。第一个叫基督教协进会。1922年成立，大部分自立教会都加入了。几年后，基本上代表了大概30%-50%的中国基督徒，是当时最大的教会。当时内地会有点犹豫和挣扎，也想竭力跟教会合一。既然大家一起成立“属于中国的教会”，戴德生的名言说，我有一千条命都不会不给中国。你不加入，显得你们内地会要自己搞地盘似的。于是咬一咬牙，加入了协进会。但到1925年，内地会就忍无可忍，宣布退出，因为他们看穿了协进会是一个自由派组织。这样，直到1949年被赶出中国，内地会都坚持了一个原则：保持独立，不在中国加入任何教会合一运动。不过后来，他们还是成为了一个基要派联盟的非正式成员。

第二个组织，是在基督教协进会的基础上，在1928年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教会。协进会和中华

基督教会，可以称为1949年前的三自“两会”。他们的主要领袖是陈静怡，可以称为1949年前的吴耀宗。当然，道一变至于齐，再一变至于鲁。1949年前的“三自”，依然保持了在国家面前的独立。到1949年后的“三自”，每况愈下，终于高声喊出了“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

加入“中华基督教会”的，有几大板块。一块是仍在西方差会和宗派之下的教会，比如大部分浸信会，大部分长老会，和全部圣公会。长老会、公理会和大部分差会都完全并入了“中华基督教会”，没有加入的是圣公会和部分浸信会。这些西方在华宗派基本都是自由派教会，不是说里面每个人都是自由派，但总体上是自由派掌权的教会。

第二块是那些从西方宗派和差会脱离出来的自立教会或本色化教会。他们同时被自由派神学和民族主义所笼罩——这也是后来的三自运动的两个特征。两块加起来，占了蛋糕的70%。

奋兴与抵抗

1928年“中华基督教会”成立。1929年，基要派宣教士群体与基要派的本土布道家们，一起成立了“中华基督教联合会”，抵抗这个轰轰烈烈的自由派的合一运动。这个联合会宣称，要把教会建立在“一个真正的、福音派的信经基础之上”。

顺便说一句，在那个时代，“基要派”和“福音派”是互换的。我们会在1979年后再来看他们的区别。

基要派中的三大块，美北长老会，内地会，以及本土奋兴布道家，贾玉铭，丁立美，伯特利布道团，杨绍唐等都参加了。还有一些较保守的宗派如美南浸信会和门诺会等也在其中。“基要派的先锋”、宣教士白秀生担任主席，杨绍唐任副主席，贾玉铭、丁立美任执行委办。几年后，贾玉铭就连任主席，直到抗战爆发。

1927-1937年的大复兴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亲自兴起这些少数人，然而在属灵的话语权柄和生命传承上，他们是中国教会的根。中国教会的教导权柄，随着这场大复兴，从宣教士群体那

里，转移到了这批本土的奋兴布道家那里。因为在古约翰之后，因为受到母国自由派神学的控制，在华宣教士中就再也没有出过一个像宋尚杰这种疯子了。

“宋疯子”，是圣灵亲自在中国预备的主的仆人。他是福建莆田人，爸爸是牧师。他十几岁时，爸爸出去聚会，他就替父亲上讲台，人就称他“小牧师”。他后来想做传道人，去美国读书，弟兄姐妹就奉献，供他去。结果他说先把大学读完、再读神学院，他就勤俭节约，三年把大学学分修完了。因为读的时间越短越省钱嘛。当地报纸登了新闻，说有个穷小子三年读完大学。然后他写信回来，说想把硕士读了比较好。大家又支持他读硕士，然后回来当牧师。结果他又给家里写信，说还想把博士读下来。教会又支持他拿到博士学位。这下他不好意思了，其实他根本不想当传道人，因为他混得挺好，在主流世界吃香，是个活动家，经常在学校搞活动，请一些著名学者像杜威去学生会演讲，前途一片光明。

但有一次，上帝带领他听到一篇布道，很有意思，是一位16岁的小姑娘，身穿白衣，站在凳子上讲道。他受到极大冲击。想起我来美国是要做传道人的，结果我把博士都读完了。他就决定去纽约协和神学院读书。但这个神学院当时是自由派的大本营，进去几个月，他就发现院长是不信主的，同学们多半也不相信圣经。而他是来自福建的三代基督徒。协和神学院和他从小的信仰太不一样了。于是他就呼召老师悔改，呼召同学悔改，说你们要重生。结果院长就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了。他在里边关了半年多，到处写信求援。终于有个以前的老师，到精神病院把他弄出去。他在里边用不同的方法把圣经读了很多遍，也经历到圣灵特别的带领。于是宋尚节启程回国，在船上就把博士文凭扔海里了。回来后，就成了一个奋兴布道家，在中国跑了很多地方，而且还跑去南洋。

其实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改革宗教会和归正神学运动中，有两个最重要的牧师家庭，一个是赵忠辉和赵天恩父子，一个是唐崇荣和唐家兄弟。唐家和赵家都是上帝大大使用的牧人之家。教会也有赵家人，还有唐家人。而唐崇荣和赵中辉，这两位是直接受益于这场奋兴布道运动的。改革宗人士不要有太苛刻的批判眼光，看这个不归正，看那个不改革宗。只要你属于中国家

庭教会，让我告诉你，你属灵的妈妈，属灵的叔叔，属灵的奶奶，统统都不是改革宗。你明白吗，成为法利赛人的快速方法就是恨法利赛人。很危险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人以为，成为改革宗人士的最好方法就是讨厌非改革宗的人。但赵中辉牧师是在王明道的布道会上悔改信主的。而唐崇荣在幼年，就宋尚杰的讲道，整个在印尼的，南洋的教会的运动是宋尚杰播下的种子，是海外布道团播下的种子。所以你都是从他们当中生长出来的，你如果比他们更明白一点福音，或自认为更加明白一点福音，你怎么能反过去藐视上帝的工作呢？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仍然是王明道、宋尚杰他们属灵的后代。

到宋尚杰很厉害，王明道的有些教导在今天看是有些道德主义的地方，但是他特别强调重生，他其实是长老会传统长大的，但是他不是长老会的，这个让我们长老会的人谦卑。因为他是受到浸信会的影响，在一个大冬天12月的时候，他叫几个同学，一起在冰窟窿里边砸了一个洞，就跳下去自己施洗，从此就脱离长老会，他就去做独立堂会，就是浸信会的独立堂会。神就是这样用，你有什么好不满呢？你只有感谢神的恩典何等浩大。

所宋尚杰特别强调悔改。所以他们一个强调重生，一个强调悔改。宋尚杰对悔改的呼召非常严厉的，他很多时候说“你们这些死人。”他不但说你们这些死人，而且他把棺材抬到讲台上，他抬到讲台上说，你们这些死人。后来棺材抬上去太麻烦，然后他就找人做了一个小号的棺材，大概就这么大，他每次讲道就拖着一个棺材上去，讲道一定的时候说你们这些死人，要悔改。好厉害，这种疯子，为主竭力奔跑，43岁就归回天家。感谢主在二三十年代兴起了这一批的本土的基要派人士。

中国的基要派人士，在他们中间又可以分成两种，这个跟后边三自运动也有关系。一种就是独立教会的基要派，倪柝声，宋尚杰，王明道。还有一群留在宗派中的基要派，留在西方宗派当中的基要派。留在西方宗派当中的这群基要派在49年前都是非常坚定的基要派，但是到了49年后都加入了三自，这是一件很叫人忧伤的事情。

其中三个很重要的人，一个是贾玉铭，他被一本书叫《中国教会三巨人》，列出来的中国教会三巨人：王明道、杨绍唐和贾玉铭。但那个时候可能把杨绍唐看的太高了一点。过了几十年，

大家通常会说，要么从奋兴布道的角度来讲，会说宋尚杰、倪柝声、王明道三位。如果不完全从奋兴布道的角度来讲，会说贾玉铭、王明道和宋尚杰。中国教会当中有谚语，王明道讲道德，倪柝声讲道路，贾玉铭讲道理。

贾玉铭是神学家，贾玉铭是49年前中国最好的神学家，最优秀的神学家，也是一位改革宗的神学家，是做过华北神学院院长的神学家，是整个长老会在中国结出来的神学的果子，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基要派，他对倪柝声也有很多影响，他早年扶持过倪柝声，但是到49年以后，他也加入三自。

还有一位杨绍唐，杨绍唐也是当时很著名的基要派，他是华北神学院的毕业生，他在南京政府里对国民党有很大的影响。我曾经有次讲道有提到他，在48年时候，杨绍唐在南京凯歌堂讲道，他借用旧约的先知呼召南京政府要悔改，呼召国民党要悔改，指出他们很多的罪，而当天蒋介石就坐在下边听道。那是非常勇敢的人，有几个牧师敢这样讲道？蒋介石就坐在下边，你敢呼召他悔改，你敢说国民党败坏，国民党腐败，你们要悔改，不然上帝要审判你们。有几个传道人敢这样讲？蒋介石上去握住他的手，说，杨牧师，你的道讲的好，我们真的需要悔改。但是来不及了，上帝不给他悔改的机会，让他去台湾抄圣经去。但是能够在君王面前的这样的一位，到了49年后加入了三自，在共产党面前再也不敢讲这个道了。

还有一位叫陈崇桂，也是典型的神学家，也是做过神学院院长的，很重要的基要派的人士。到了49年不但加入三自，而且陈崇桂是三自头面人物中第一个站出来批判西方宣教士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批判帝国主义的走狗马礼逊》，然后列举了马礼逊七十条罪状。从他这篇文章开始，然后全国就开始写文章批判宣教士了。

很有意思，在宗派当中的这批基要派在49年后仍然不是家庭教会的根基，家庭教会的根基是神学上你可以说是受到了山东区会、江北区会，华北神学院的影响，但是从教会和生命的榜样来说，他就是本土复兴出来的这批独立教派当中的奋兴布道家，是神给中国教会留下的1900年前后的这批世纪婴儿，这批人是中国教会的种子，是49年后家庭教会的传承。

另外一边还有一个机构不可不提，因为它彻底地影响后来的三自运动。在49年前我们说自由派他从组织上有一个协进会，然后中华基督教会，另外还有一个叫基督教青年会。在春熙路的地方就叫青年会，现在还有青年会的房子，你可以到春熙路看到。青年会是一个完全被自由化占领的，社会福音派占领的机构。到现在我在前些年去台湾，我们见到台湾的女青年会的会长，你知道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女青年会的会长是佛教徒，她根本不信主。在台湾的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是基本上跟基督教没有关系的组织，他们是文化组织，主要是暑期教英语、体育、当然也看顾社区中孤寡老人，完全成为文化和公益的组织。他们里面的原则是信仰自由，他们当中会讲基督教，但是你想信就信，不信也没有关系。他们说现在组织给老年人有服务项目，来参加的志愿者其中大部分不是基督徒，而且佛教徒比基督教更多。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那么严重，但还是一样的。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共产党在1949年前在青年会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青年会倾向左派的思想，共产党在当时的教会学校，和当时的青年会当中大量发展了许许多多地下党员。基本上可以说基督教青年会是被控制在地下党的手中，这个也为1949年之后的三自运动提供了干部队伍。因为49年后共产党建立的三自系统，基本上主要的领袖都是从青年会出来的，因为其他的牧师都被打倒了，都是从青年会出来的。青年会在很早的时候，就不但在青年会里打下人，而且开始送到国外读神学院。

其中有著名的几个，一个叫李储文，前几天我看到消息，复活节前3月22日他去世，大概98岁，差不多快100岁。他在1949年前是上海国际礼拜堂的牧师，而且是从美国读神学回来的，据说讲道很有恩赐，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听他讲道。49年后三自运动一起来，他就成为三自运动的领导，成为全国三自的秘书长。秘书长实际上是三自最主要的领导，实权派的领导人物。在1966年文革开始，1967年红卫兵开始批斗他，那个时候谁都要被批斗，他被批斗游街示威，打他，他受不了，他就向党组织报告求援。然后暴露他的身份，他是从30年代开始被党安排进教会的地下党员。所以上海市就立刻把他调到上海市外事办主任，就调离了基督教界，1978年他就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你知道香港没有回归之前，所谓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就是中央政府驻香港政府，他是担任香港的第二把手，一直到退休。他从来没有对基督

教界工作说一个字，严密守党的纪律。

像这样的人还有。还有一位是三自的副主席是赵复三，他是党安排在教会中，也是安排到美国读神学回来，然后回国后成为三自主要的领袖。到了80年代的时候他成为全国三自副主席。但是很有意思，89年六四时候，他正好带领基督教宗教代表团在欧洲访问。访问的时候发生了六四事件，他就公开声明认为政府开枪是不对的，之后他就宣布叛逃，就再也不回国了，他就脱离共产党，揭示出他是党一直安插在教会的地下党员。

最近这几年还有一个事情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们对三自的研究，三自里面叛出来的人很少，弃暗投明的人很少，天主教里边弃暗投明人很多，三自里面不多。其实对里边的掌握了解，赵天恩牧师在他的《中国当代基督教史1949—1998年》，在这本书里边，对三自运动有很多资料，他掌握的资料非常的全。在他之后是香港的邢福增教授，他对整个的三自运动，五六十年代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了解和研究是比较深的。

但是在最近几年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吴耀宗，他是三自的领袖。吴耀宗的儿子站出来了，他儿子今年86岁。从两年前他84岁的时候，他站出来揭露三自。他现在在美国，他说人已经老了，快要死了必须要说真话。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写他父亲的文章，叫做《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我的父亲叫落花，我的父亲一直认为他所相信的基督教跟共产主义是没有冲突的，他一直是很真诚的。虽然他认为父亲是悲剧，但是他的父亲是以基督教的名义一生从事社会主义运动，而且真心的认为跟共产党是一致的，结果被共产党利用和出卖，到现在我父亲留给我的四十本的日记不还给我。吴耀宗每天写日记，当天吴耀宗去世之后，四十多本日记，统战部就借走了，借去看看，就一直不还他。他这些年一直打官司问统战部要，最后宗教局告诉他，这个是国家财产，然后他就跟宗教局说能不能说拷贝一份给我，后来宗教局回答说因为涉及国家机密，所以他现在豁出去了。他现在到洛杉矶中国的领事馆门口示威游行，一个人，然后有一个基督徒律师帮他，在旁边打了一个灯笼，说“暗无天日”，他要他爸的40多本日记。他从小在三自大院中长大，这些人全都认识，他一个一个数出来，哪些人是共产党的人。然后他说，直到现在，从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直到现在，各级三自当中的秘书长一定是由共产党员

担任。直到现在，你是主席，他不一样，因为真正掌权的是秘书长，他说秘书长一定是共产党员担任，而且在各级三自当中一定有三自当中的党支部，所以呢？他现在现身说法，这几年写了大量的文章，到处写文章批判三自。所以，这个感谢主。让我们认识很多的情况。

所以我们差不多这样理出两条线来，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协会，和青年会，这一条线就是49年之后三自运动的基础，甚至共产党在其中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三自运动的基础。可是上帝在这边为中国预备了，共产党虽然在做工作，然后西方宗派也已经自由化，可是上帝却为中国教会存留了一批20-30年大复兴的种子，成立了一批独立教派的教会，这一批独立教派的奋兴布道家，这一帮人和他们带领的教会那么在49年之后成为了家庭教会的骨干，和家庭教会的传统。所以这两个不是在49年之后才出现的，是在49年之前就预备好的。

稍微再讲两句吴耀宗，吴耀宗在成都也呆过。因为抗战1942年王明道到成都来讲道，讲道的时候在成都讲道，看见吴耀宗在成都创办的刊物“天风”，“天风”到现在都是三自的官方刊物，吴耀宗在1942在成都创办。当时王明道读了吴耀宗在天风上的1-2篇文章，王明道就说吴耀宗是不信派。这个是不信的，是自由派。那么吴耀宗自己是很真诚的相信，我们说是他很真诚受到自由派神学的影响。他在1949年之前，三自里面有两种人，青年会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共产党直接安插的地下共产党员，还有一种是不是党员，但是倾向于共产党的左派年轻人，左派学生，像吴耀宗这种的，共产党就统战他，统战他。你听过很多周恩来的故事，周恩来经常说，你留在党外比留在党内贡献比较大，反正这是周恩来的名言。

所以，周恩来在40年代就已经跟吴耀宗有三次的面。第一次见面在武汉，跟他讲党的宗教政策。第二次，第三次43，44年在重庆，到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吴耀宗很傻，吴耀宗真诚的跟他说，我认为基督教和社会主义是大同小异，99%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相信有神，你们相信没有神。他说99%都是相同的，唯一的不同是你们不信神。什么意思？你们是想建立天国，想建立美好的社会。我们的信仰也是建立美好的社会，你们所提出来的那些美好的社会在我们这里叫天国，这是社会福音的认识。所以

他才会说：你看在内容上，在目标上，在我们的追求上，我们99%是一样的，只有1%不一样。说完了之后，周恩来说，我觉得不是这样，周恩来不同意他，周恩来说每一种价值观都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但是我们尊重基督教。周恩来坚决不同意他的说法。

然后到了48年的时候，他在国外访问，共产党专门安排的人，将他和其他的人直接接回国，接到共产党占领的地区，然后48年参加，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整个宗教界的代表，全国只有5个宗教界的代表，所有的宗教加起来只有5个，基督教青年会里面加起来占了3个，吴耀宗，另外一个女青年会的女会长，另外一个刘良模。刘良模也是49年之后的三自秘书长，他是安插在青年会中的地下党员。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教会的耻辱。

49年之后，为什么天主教会当中的三自运动迟迟搞不起来，因为共产党在里面没有安插人，因为共产党在里面没有预备他的干部，因为人家铁板一块弄不进去。安排几个红色主教在里面，没门。但是搞几个红色牧师的话，挺容易的。所以你看，虽然五大宗教，但是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开国之前的政治协商会议，5个代表，3个是基督教的干部，是青年会的。两个是，一个是安插的共产党员，二个是统战的自由派，左派的领袖。所以，这个是基督教需要反思的一点。

天主教就找不到，天主教一直到57年都找不到一个主教愿意加入三自，天主教就有这么牛呀！一直到55年，实在是基督教搞的轰轰烈烈，你们那边怎么没有动静呢？所以就找了一群信徒，组成了天主教爱国教友团，教友团不就等于粉丝团吗？因为你知道人家是主教制的，没有一个主教参加，教友团算什么教会，根本是兴趣爱好小组。他就是成立了一个兴趣爱好小组，他连主教团都成立不了。

然后一直到1957年，找到了四川的一个主教。找的是我们四川人呐，找的是四川的一个主教愿意加入三自，然后慢慢的到很后面的时候，才勉强建立了一个“天主教爱国主教团”。但实际上天主教内的整个主教系统，就是跟随梵蒂冈的主教系统，从来没有变过，从来没有消失过，一直是接续在这里，一直是不认这边的系统的。这些伪主教是不认的，而且共产党这边，就算是共产党封的主教，也有不断地反出来的。

最近前几年，上海的一个姓马的主教，上海教区的主教是共产党这边的封圣的，祝谢，祝圣当天。他们叫祝圣我们叫按牧，祝圣当天马主教发表声明，宗教局刚刚跟人家祝了圣，然后他就站上去说“我宣布退出三自，坚决不接受不忠于梵蒂冈”，说完之后就被武警带走了。直到现在被软禁不知下落。

这样的人在三自的整个运动中，在基督教里面很少，非常的少。你们可以去思考，我们以后讲到原因，49年之后，为什么我们比较没有骨气点。直到现在拆十字架的运动，现在终于出了一个，就是浙江的顾约瑟。半个世纪以来，只有这一位是担任三自主席的，浙江的三自主席。能够在拆十字架的时候，公开以三自协会主席的名义公开发表声明，我们反对拆十字架。然后被抓，抓了之后1-2年，前段时间放出来了。因为找不到他任何犯罪的证据。放出来之后他绝决的离开三自，这是这么多年来，在省一级的三自主席，能这样公开反对走出来。新教就只有这一个，但是在天主教中是一大堆，主教和普通的神父，一大堆绝决的离开三自天主教。这方面我们求主怜悯和帮助我们。

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来思想你的恩典，你总是为自己存留敬虔的后代，就像你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所做的一样，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你也是如此的做。人们不知道1900年的发生，但是你知道；人们不知道1919年的54运动，但是你知道；人们不知道整个社会的革命浪潮，人们不知道1949年之后的政权，但是你知道。你知道，所以每一次你都有在你的教会当中有预备，都有在兴起，存留那个古旧福音的种子。

我们为着你在中国教会的，这样的几十年的保守，就是让基要派，福音派的，保守的基督教会，一直保守，直到今天，使今天的中国教会，成为一个全世界，甚至最大的一个保守派的教会。主啊，我们要赞美你，主啊，这是人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主啊，你将我们和西方自由化的潮流隔绝，你将我们放在共产党的制度压迫之下，最终你给我们的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几千万人的保守派的教会，一个相信圣经权威的教会。主啊，这是你从石头中为你自己所兴起的教会，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见证的并

不是我们的勇敢，并不是我们的坚固，主啊，而是你的教会的软弱。是你的教会的背叛，中国的教会的背叛，比其他的国家的民族的教会背叛，只会更多，没有更少。但是主啊，你怜悯我们，是你的心意在我们当中不失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求你使我们在你的面前长存感恩和信靠你的心，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图：王明道的最后的自白。

第三章

护教士与叛教者



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弥迦书7:7-9：

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直等他为我辨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前情提要

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教会在整体上自立，并形成了基要派教会和自由派教会的两个阵营。虽然界限还有些模糊，中间状态的教会也不少，但脉络清晰，人物鲜明。

基要派的首发阵容：本土的奋兴运动有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等代表人物；西方宗派中的代表，是美北长老会的山东区会、江北区会及他们所办的华北神学院，代表人物是白秀生和赫士；差会中的代表是内地会。

自由派的首发阵容：基督教青年会（包括女青年会），代表人物吴耀宗、刘良模等，基督教协进会和中华基督教会，代表人物陈静怡、吴贻芳、陈文渊等（后两位都成为三自会的头目）。另外，西方宗派中相当赤化的是圣公会。

基督教应急会议

当时整个教会中，西方宗派比中国本土教会更能看清当时的局面。宣教士有国际视野，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苏联干了什么，也有圣而公之教会的主体认同。但中国教会普遍陷入在民族主义情绪中，自立运动和大复兴，虽然立场迥异，但都不同程度增添了中国教会的国族认同、而不是与西方教会认同的独立意识。信徒和领袖们首先看教会是“中国的”教会，而不是“圣而公”的教会。这样可想而知，他们看共产党也首先是“中国的”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国际”的中国分部。

因此，宣教士和西方差会普遍认为共产党进城后，教会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甚至难以坚持下去。所以，1948-1949年，差会主导的基督教界举行了好几次应急会议，在四川、安徽黄山等地。独立教会普遍比较乐观，包括基要派阵营，并不认为局势会严重到教会难以生存。对宣教士们来说，中国正在遭遇的，是一场宇宙性的上帝与撒旦的属灵大战，他们的担忧是“教会正在失去中国”。但对已经自立的中国教会来说，中国正在经历的不过是一场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内战”，无论谁赢，都是中国人赢。所谓“教会正在失去中国”，不过是西方宣教士的夸大其词和西方本位的惊呼而已。

有意思的是，在新教入华史上的重大变迁时刻，通常是长老会的宣教士，他们的洞见和视野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马礼逊是长老会的，第一个提出“三自”原则的倪维思是长老会的，第一个创办大学、并担任和合本圣经翻译委员会主任的狄考文是长老会的，第一个脱离自由派神学院、创办华北神学院并预言教会学校将沦为“共产主义宣传桥梁”的赫士，也是长老会的。

同样，在1949年前夕，第一个提出建立“家庭教会”作为应急方案的，也是长老会的牧师，即当时上海国际礼拜堂的毕范宇（中共特务李储文在他手下，即将通过控诉他而篡夺主导地位）。

当时的教会重心在城市，而非乡村。虽然很多宣教士去西南边疆的偏远乡村，但教会的主体仍然集中在大城市。大部分信徒、机构和力量都分散在东南沿海一圈。因此，毕范宇牧师提出共产党进城后的两个应急策略。第一，教会必须将重心从城市转向乡村，建立农村教会；第二，教会必须预备采用“家庭聚会”的方式，在未来的严酷局势下，像初代教会一样星罗棋布地分散存在。两个关键词，一是乡村，二是家庭。这是一位卓有远见，像赫士一样的先知型牧师。当时没有任何本土布道家，包括王明道和倪柝声等人有类似的眼光和筹划。不识共党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后整整半个世纪，中国教会的历史轨迹，恰如毕范宇牧师所预言的一样。

本土教会，当然也知道共产党是唯物主义，是无神论。但共产党在1945-1948年的所谓“新民主主义”宣传，还是蛮成功的。大家都觉得，国民党腐败又专制，而共产党要搞民主，共产党反

对国民党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一党独裁。多年前有位四川作家笑蜀，他参加过秋雨之福团契的第一次聚会，笑蜀编了一本《历史的先声》，搜集了新华日报1946-1948年的社论和文章，讽刺的是，假如今天你在网上发表这些文章，而不注明是当年共产党自己写的，那你很可能因此被喝茶和被拘留。因为这些文章，都是主张自由、民主和反对一党专制的，而且热情洋溢地赞扬美国，顺带也表扬了基督教，其中好几篇都由毛泽东本人执笔。所以，当时的中国教会错误地认为，“中国”是一个比“教会”更为首要的特质，他们对共产党的来到，虽有惧怕，有担忧，但却没有那么惧怕。不惧怕不是因为全然仰望了基督，而是或多或少受到进步主义影响，对掌权者不死心，对无神论的邪恶估计不足。

1950年初，王明道去天津一个教会讲道，他在公园门口看见一个横幅，写着标语说“坚决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他想，共产党至少还是说话算数的，还是要保护基本的宗教自由。虽然我们不知道传福音可能会变得比较难，因为他们是无神论，但教会的存在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当时的基要派几乎都是这样想的。

还有一点，1949年前的基要派，包括整个教会自立运动，背后都有一个很强的社会思潮，就是和进步主义连在一起的民族主义情怀。中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这些诉求席卷了整个中国。所以，本土教会的心里，早已不自认其为洋教。他们天真地认为，自立已使他们成为了“中国的”教会，教会已经跟差会和西方宗派没有关系了。所以他们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可能会被同胞当成里通外国的敌人。他们更不会当自己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早就起来跟帝国主义作战了。大复兴带来的属灵权柄转移，也在另一个角度催生了民族主义立场，使教会错误地以为，他们比整个中国社会更早地摘掉了“西方”的帽子。

所以，三自运动一爆发，王明道就在他创办的《灵食季刊》上，立刻发出反对的声音。他的反对有两个立场，主要是信仰立场，即反对三自运动意图带来的“基要派”与“不信派”的大联合。而这个联合是政治力量撮合的，也是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就是限制和消灭基督教。1950年，周恩来三次接见吴耀宗等人，最后摊牌，提出教会可以被允许在新中国存在的三个条件：

一是对外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

二是对内清查队伍，揪出“反革命和坏分子”；

三是不能再上街去传福音，发单张，信仰活动只能被限定在经批准的宗教场所。

事实上，直到今天，绝大多数教会（无论是三自还是家庭），都自觉地（自我审查地）遵守了周恩来提出的第三条。基督教在公共社会领域彻底消失，一直到今天。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教会在1949年后，整体上已经被世俗国家体制化。只不过分为被动的体制化和主动的体制化。仅仅在最近十年，才在中心城市中重新出现了一批反体制化（公开化）的家庭教会。半个世纪以来，环境无论是严酷还是宽松，包括绝大多数家庭教会在内，中国的教会都下意识地认为，“生存”是一间教会的最高目标。而“惧怕”也成为了中国家庭教会最基本的生命经验。

王明道对三自运动的第二个反对理由，其实是“自立运动”及背后的民族主义独立意识的一个延续。他说其实我们早就“三自”了。在三自运动早期，有一个运动扩大的分界线，就是韩战爆发，因为韩战一爆发，中美就成了交战国。那时，全社会都被铺天盖地的反美口号笼罩了。两国交战之后，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所有财产。而中国还有很多宗派和教会是依赖差会跟基金会的财政支持的。所以中美一打仗，凡与美国有关的钱都被冻结了，这时，政务院（当时的国务院）就召集了一次“领美国津贴的教会和机构”的大会，要清算跟解除一切跟美国的关系，所有的人、财、物，要把这些关系砍断。可以说，这是三自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会议，也是与会干部级别最高的一次。陆定一主持会议，习的父亲习仲勋发表讲话。甚至连基要派领袖也大多参加了这次会议，包括倪柝声和敬奠瀛（山东耶稣家庭的创始人）。而耶稣家庭和聚会所，是当时最大的两个本土教会系统。

王明道虽然有很大的属灵影响力，但他的“基督徒会堂”是独立堂会主义，大概在49年前扩建了一个院子，新修了礼拜堂。1949年基督徒会堂迎来了一次复兴，整个院子前前后后坐满，大概500到700人聚会。但基督徒会堂只此一间，与任何其他教会都没有属灵权柄上的关系。而倪柝声的聚会所，遍布全国，号称10万会众。敬奠瀛的耶稣家庭，主要在山东。虽不是全国性的，但耶稣家庭有点像人民公社，仿照使徒行传里面，五旬节之

后，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不同的是基督家庭还是一个生产和创业的共同体。十几家人组成一个基督“小家”，许多小家组成一个“大家”，家有家长，这有点类似以色列复国之后搞的犹太公社。信徒自愿奉献，放弃私产，形成凡物公用，而且效率很高，经济上很成功。所以在当地乡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130多个耶稣家庭，分散在北方几省。

之前提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乡绅是乡土中国的精英阶层，教会出现后，宣教士和牧师，变成了乡土中国的“洋乡绅”。宗教开始影响到社会结构，又影响到文化秩序，“民教冲突”就爆发了。譬如1860年的《北京条约》解除了禁教，之后的第一个教案是发生在贵州的“青岩教案”，时间就在端午节，旧节、旧教、旧乡绅，民众敲锣打鼓，经过一座与这一切格格不入的天主教堂，骚乱就爆发了。

共产党在1949年后，开始在乡村消灭乡绅阶层，之后就以村支书替代了旧乡绅，实际上是以流氓无产者替代了传统的耕读之家。党棍们都不是传统乡村社会中有文化的人，也不是传统宗法社会中被大家敬重的人，五老七贤都杀光了，出来掌权的都是地皮流氓，他们冒升为乡村的新统治者。

但是，耶稣家庭在山东等地，已打破旧的乡绅秩序，形成了新的乡村社会结构，就是“家”，从经济上就是公社。他们的“家长”，同时是宗教领袖和乡村领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耶稣家庭是最在地的宗派，扎根在最传统的中国乡村秩序中，成为了一个小范围内的新秩序。而且看起来也是“最社会主义”的。你不是想搞公有制吗，人家耶稣家庭已经搞了三十年。

所以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耶稣家庭”比其他任何教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都更大，也更为共产党所忌惮。1950年，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读燕大，在宗教学院里，当时好多牧师的儿女都在那里，如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杨绍唐的儿子杨安溪，都是同学。吴宗素说，有一天大学举办讲座，很热闹，来了一群打扮得像农民的人，领头的就是敬奠瀛，到燕大做报告，讲他们的耶稣家庭。整个燕大都沸腾了，同学们挤得水泄不通，看到在中国的乡村有“基督徒公社”，这么社会主义，这么革命，同时又这么基督教，大家就兴奋得不得了。但到了1952年，政府第一个彻底消灭的就是耶稣家庭。为什么呢？因为不把你打掉，就没办法让

党支部进来啊。你先一步把我的位置占了，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乡村结构。因此，虽然耶稣家庭在三自运动中是最积极参与的宗派，全国第一批在《三自宣言》上签名的教会领袖共1500多人，以耶稣家庭为首，他们就占了300多人。因为他们也觉得自己是“最社会主义”的。然而他们也是被迫害最早、最严重的群体，全军覆没，彻底打散。当时还没有设国家宗教局，是政务院的宗教事务处处长何成湘亲自带队，一个工作组进驻耶稣家庭，控诉反革命和大恶霸，最后敬奠瀛坐牢，反革命罪，四年后死在监狱，整个耶稣家庭系统就被摧毁了。

倪柝声也建立了教会系统。共产党首要打击的就是有组织的教会系统，因为它要改造整个社会结构。倪柝声的神学是反宗派的，他认为一切宗派都错了。这话也有一部分对，因为20世纪上半叶，普世教会都在整体上受到自由派影响，走窄路、持守古旧福音的教会，的确已变成了“一小群”。所以聚会所也被称为“小群”教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被分别出来的，要恢复已经失落的真福音。于是他们反对一切宗派，说我们不要宗派，甚至不称自己为教会，更没有名字，大家就叫他们小群。后来在上海哈同路聚会，因为要登记地址名称，就称为聚会所。他也强调一地一会，不分宗派，所以也称他们为“地方教会”。其实他们并不看自己是“教会”，而是一群真信耶稣的人在一起聚会、掰饼。然而，宗派从来都是反宗派的产物，在1940年代，聚会所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教导最系统和组织程度最高的本土宗派。

所以，共产党在1951年就抓了倪柝声。聚会所在信仰上是非常基要派的，强调内在的信仰生活，内在的灵修和与主的关系。基本上是反体制、反神学的，非常强调与社会的分离。他们受到英国弟兄会，以及教会史上的奥秘派的影响，你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属灵，不会跟你们谈电影、小说这些世俗的东西，更不会和你谈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魂”的内容。他们的人观被称为“三元人观”，就是把“灵魂”泾渭分明地分为“灵”和“魂”。所以有人说，王明道是“儒家基督徒”，倪柝声是“道家基督徒”。把“灵”抽空了道德内涵后，就容易出异端。我之前遇到一个异端，有个弟兄接待他，说这个弟兄太属灵了，跟他呆了两天，没听他说过一句“人话”，每句话都引用圣经，有点不知道怎么跟他打交道，佩服得不得了。一方面这是美好的传统，但他们又有点过了，不关心社会和文化，实际

上最终连解经都会出问题。

并且，基要派教会在1950年，有一个现象，就是平常不关心政治的人，到了某个时候，会忽然在政治上变得很幼稚。1950年的教会，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因为你根本没有辨别能力，结果大部分教会很轻易就被裹挟到政治运动中去了。在1949年，聚会所在上海举行了一个祷告会，要以祷告拦阻解放军过江。并穿着白衣，在街头传福音，宣告天国近了，末日到了，你们再不悔改就没机会了。这样到51年他们就成了反革命。不但是教会与政治的关系，聚会所在教会与经济的关系上也显得幼稚。倪柝声去东北，因为在那里有工厂，他以为一边办工厂，一边用盈利来供养传道人，结果在列车上被抓，一直关押到56年才判刑。其间从中国教会消失了5年。不知道关在哪里，也不跟家属说。直到王明道的反革命集团案出来，倪柝声的反革命集团案随后出来，对聚会所是巨大打击。

倪柝声也是加入了三自的，一开始他反对，后来态度又变了，可能压力太大，也可能他并没有对政治的清楚立场。后来他说：国家是一个盘子，教会像一个杯子，杯子要放在盘子上，所以可以加入三自运动。倪柝声最喜欢用比喻，有时候横竖都能解释。于是整个聚会所都加入了三自。但共产党还是不放过他，因为怀璧其罪，你的教会系统太大了。结果他被捕后，尤其是反革命案出来后，很多地方的聚会所便纷纷退出了三自。同时，政府抓住了倪柝声的一些道德犯罪的把柄，可能是真实的，教会没有处理，结果成为撒旦攻破教会的武器。也可能其中有诬陷、逼供。据杨绍唐的儿子杨安溪在口述史中说，当年很多主的仆人被击打，包括倪柝声在内，都的确有道德的犯罪，成为魔鬼攻击和上帝管教的破口。

这样，各地的聚会所态度不一，有三自的聚会所，也有离开三自成为家庭教会的。实际上，几十年来，两边都有聚会所。

王明道和这两位领袖不同，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政务院会议，倪柝声和敬奠瀛都参加了，只有王明道坚决不去。政府特别派了青年会代表、几个老传道人，苦口婆心请了他三次。他还是不去，说我跟帝国主义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换成今天的话），我早就“三自”了，从来没有领过美国教会一份钱津贴或一分钱奉献，我几十年都是自立、自传、自治的。他的确可以讲这个话，

因为他连浸礼都是自己跳下河去自己洗的，所以他说，我不需要参加这个会，也没资格参加这个会。就他一人不参加，共产党就对他恨之入骨，就像哈曼恨末底改，就他一人不在朝门下跪一样。不过，一方面是因为王明道最缺乏教会系统，对付他不像对付敬奠瀛和倪柝声那么急迫；第二，他又最有个人影响力，所以还是想法设法争取他，共产党在这方面还是很有耐心的。

直到1955年，周恩来仍放话说，三自为王明道先生留着一个位置，只要他愿意，就是全国副主席。中国跟美国打了一仗后，很希望在国际上、外交上有突破，因为承认它的国家当时不多。政府想邀请联合国秘书长访华，当时的秘书长提了一系列访华条件（最后没有成行），其中一个是中国后想见王明道。所以政府还是希望把王明道留着，作工作，也当一张牌。可王明道嘴硬，政府工作人员去了他也不见，最后发现留着这个人没用。到了当年6月，王明道一连发表三篇重要文章，有点像1520年，路德一连发表《论基督徒的自由》《教会被掳巴比伦》等三篇檄文，很多人认为，那才是宗教改革的真正开始。王明道在那年写下《真理呢？毒素呢？》，说圣经里面到底是真理呢，还是有帝国主义的毒素呢？他说，圣经里没有一个字是帝国主义的毒素，“都是上帝纯全的真理”，这是一个基要派信仰的坚决表达。他又写了最著名的护教文《我们是为了信仰》，说我们为什么不加入三自，不是因为我们反革命，不是因为我们反对共产党。不加入三自单单是为了信仰。因为那些加入三自的人，我们不屑于与他们为伍。他们是不信派。你看他一句话不骂共产党，只骂那些不跟耶稣走、却跟着共产党走的人。一方面跟他的基要派信仰有关，他并不是在政教关系上讲，我不能加入三自是因为政权不能凌驾在教会之上，他始终没有说这样的话。

这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基要派不会说，党不能管理教会，毛泽东不能作教会的头。这样做是违背圣经的，要遭上帝的审判。他们只是说，那些人（三自）是不信的，是犹大，是跟随凯撒的。但我们只是为了信仰，“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所以不能参加。这样，1951年北京政府就退而求其次，给了他们一个顺理成章的出路，不加入三自算了，给你们在三自之外，一个临时的聚会点登记如何？你们另成一派，但还是要归政府管。北京政府同意他们不参加三自，但要求他们自行组织政治学习。然后王明道和袁相忱、王镇等11位独立教派领袖商议后，答复政府

说，我们可以作为公民，私人参加政府要求的政治学习，但教会跟政治无关，我们仍然不能参加。

这个立场，就与教内的信与不信无关了，教会必然要碰上政教关系，最终你必须说出来：对不起，教会跟政治无关，我不参加。政府不能干预信仰，凡政府组织或要求教会举行政治活动，我绝不能参加，不然我就卖主了。他们的态度是谦卑柔顺的，因为他们说作为公民，私下可以参加。因为你是掌权者，你有枪，逼着我去，我也不能不去。王明道的意思是，作为公民，我没有殊死抵抗的责任；但作为传道人，我有责任殊死抵抗。

于是，在他发表《我们为了信仰》之后，政府下了抓捕的决心。在8月7日，主日，他讲道《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当晚在家，会堂和他家是一个院子。不知睡了还是没睡，突然他起身，后边有声音说“不许动”，一个公安拿着手枪，抵住他的腰，问他钥匙在哪里。他才反应过来，他们不是从门进来，而是翻墙进来的，所以问他钥匙在哪里？十几个公安风高月黑，越墙进来，开了大门后，再让其他人进来。就那一刻，王明道回忆说，他被吓坏了。你从来没有被人半夜拿枪抵过你的腰，你不知道人的软弱是巨大的，他说自己从那一刻起，心志其实就已崩溃了。被抓进去没多久，还没有经历毒打、刑讯，他就承认了所有加诸于他的罪名。从1950年到1955年，他所反对的一切，他全都承认了，他所坚持的一切，他全都放弃了。王明道在里面写了自白书、认罪书，答应加入三自。政府就把他放出来了，然后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他的认罪书，就跟今天的电视认罪一样。

这是王明道第一次入狱，进去就跌倒了，他后来承认，自己里边有一种属灵的骄傲。因为他一直在抗争，也有过跟日本人抗争的经验。日据时期，北平被占领。他在日本人手下活了八年。日本人也搞三自教会，叫做华北基督教团。这是由日本军部的情报部门组织的，还请了日本教会的代表团过来。日本人说，教会应该彼此相爱，日本教会来了，中国教会不应该迎接吗，不该互相团契，客要一味款待吗？所以他们就组织了华北基督教团，归特务部门管。王明道拒不参加，日本大佐登门几次，先礼后兵，最后把他请到宪兵队里关起来了，在宪兵队里，对他也很客气，说话都是“王先生，你坐”。但他打死都不松口，宪兵队拿他没办法，觉得这个人也没什么政治上的利用价值，就是个“耶稣迷”，杀了他对我们有害无益，就把他放了。这样，王明道赢得

很大声誉，就是在日军面前持守了信仰，变成了教会界的“民族英雄”。

所以，他说自己里边有一种属灵骄傲，日本人我都不怕，还怕共产党？共产党好歹是中国人，中国人对中国人，难道比日本人对中国人更凶吗？他心里是这样想的，后来发现，其实中国人对中国人更凶，他一下就跌倒了。监狱分一号房、二号房，三号房等。他被关在二号房，两个狱友问他犯什么罪，说关二号房一定是罪大恶极，一般都要枪毙。其实那两个人是政府放进去的线人，他们故意在旁边议论说：“现在政府发明了一种新子弹，这个子弹钻到脑袋里，一直钻，几个小时都死不了。”王明道说，他偷听到这个就信了，非常害怕。心想一枪打死也罢了，还一枪打几个小时都不死，越想越害怕。罪人都是软弱的，王明道也如此，我们都很尊敬的被主大大使用的忠仆，他在刀剑面前，也一度软弱到这样一个愚蠢的地步。所以，他出来后就停止了所有服事，但也没有加入三自。他知道自己跌倒了，就闭门思过，向主悔改。有首诗歌叫《一切全献上》，他在监狱里想到这首歌，就改写了歌词，叫“一切全完了”。你看他崩溃到这个地步。我们的信心，高也从未高到王明道的地步，但低也从未低到王明道的地步。所以我们是浅尝辄止的基督徒，而他是被福音大大充满和使用的一个“伟大的罪人”。

你在家里没有说，“一切全完了”，但他在狱中会唱“一切全完了”。这显明神确实是从粪堆中提拔人的神，也显出中国教会的道路，是唯独恩典的道路。不是因为教会有几个很了不起的人，道德灵命杰出的人，所以才复兴了。王明道跌倒后，用了很长时间恢复。实际上从那之后，王明道半个世纪以来就很少公开讲道，包括在80年代放出来，在上海家里有小范围聚会，但也不再建立教会，不再有公开讲道服侍。有人说，20世纪的基督教会，全世界有两位伟大的布道家，一是葛培理，他是两千年教会历史上向最多人布道的牧师。司布真在伦敦的“会幕教堂”，没有麦克风，最大限度就是坐两千人听道。但借助麦克风和现代音响，葛培理的布道会常有10万人、20万人参加。有人统计，他总共向超过两亿人讲过道。而另一位伟大的布道家就是王明道，他在半个世纪中几乎不再讲道，他被上帝使用的主要方式就是坐牢。所以，你能了解这同样是对教会的伟大服事吗？连你的软弱和跌倒，同样可能成为上帝使用你侍奉他的方式。王明道虽然从

此不再公开布道，但他的《灵食季刊》（从27岁一直写到55岁），对中国教会的喂养仍然是不间断的。

昨天有人发一张照片，是戴德生夫妇合葬的墓地，墓碑下边写了一句话，“他们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王明道也是如此，半个世纪来，藉着他的信心仍旧说话。一生悔改，一生信靠，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在1950年代，既有大规模的卖主叛教，也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如刚被主接走的边云波老弟兄。他在1940年代成都和重庆的校园复兴运动中信主，随即献身传道。49年后他就坐牢了，进去前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献给无名的传道人》。一直到70年代末他出狱，后来去了美国。才发现这首诗被印成无数单张、小册子，在海外华人教会已传唱了三十多年。他才知道自己坐牢之前写的这首诗，鼓励了教会那么多年，喂养了那么多上帝的百姓。

上次提过，赵中辉牧师是在王明道的布道会上受洗的。赵牧师在1984年进大陆，去上海拜访王明道。1988年，三自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请来葛培理牧师来中国三自访问了一次，结果三自借着这件事，在国内外大肆宣传，说中国有宗教自由。其实葛培理是被利用了。但葛培理也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去拜访王明道，政府还是答应了，毕竟要请人家来统战。所以有张照片，是1988年在上海王明道的寓所，葛培理跟他夫妇的合影。这是20世纪的两大布道家的唯一一次见面。而赵中辉在1984年与王明道重逢，给他做了很重要的口述史的记录。在这份口述史中，王明道谈到自己的第二次入狱。

第一次出狱后，他向主悔改，慢慢恢复信心和力量。之后，他就主动去派出所说，我之前写的悔改书要收回来，因为我错了，犯罪了，我说了谎。当时我说自己有罪，其实这是谎言。那之后，政府就决定，把他们夫妇一起抓起来了。这次他被判无期徒刑，一直到1980年。他在狱中没有圣经。但他背得很多圣经。《弥迦书》7:7-9，就是他在监狱中大得上帝安慰的一处经文。他在访谈中告诉赵中辉牧师，在监狱中，主给他最重要的经文就是这一段。

他记忆力很好，还背得很多四书五经。所以在80年代，他

为自己的案子，写了很多封《致江华院长书》，里面大量引用儒家经典。江华是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那时王明道视力不好，快要瞎了，很难查考书籍了。他在这些信中阐释，他为什么坐牢，为什么他的案件是错的。因为当时放他也很有意思，改革开放需要跟美国搞好关系。1979年邓小平访美，当时叫邓副总理。美国总统叫卡特，是个对信仰很认真的人。卡特不算聪明，但他的当选，代表着美国在70年代后期的一个重要变局，就是福音派的崛起和保守主义的回归。经过六十年代的性解放和民权运动，整个反基督教、去基督教的社会风潮，开始有所扭转。卡特在竞选中，公开声称自己是重生的福音派基督徒，强烈地诉诸于基督教的价值观。他的当选意味着福音派选民的崛起。接着是1980年里根上台，一直到现在的川普，虽然中间隔了几个民主党总统，但基本上这四十年，可以称为美国福音派和保守派复兴的四十年。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重要背景。因为美国福音派兴起的这四十年，与中国家庭教会复兴的四十年，是有莫大关系的。没有美国福音派的兴起，就没有新时期的对华宣教运动的规模和力量，更没有最近20年来家庭教会在神学教育上对美国教会的依赖和成长。因此，卡特就给邓小平提了一个请求。就是在1980年新春之前释放王明道。邓小平一口就答应了，说没有问题，本来我们就在拨乱反正嘛。过去有很多冤假错案，我们正在清理。回来后，就按承诺要释放王明道，但释放总得有个理由吧。法律上只可能有两个理由：第一是我们判错了，那政府就要认错，撤销“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承认你不是反革命分子；第二就是政府没有错，但该犯确已改造良好，所以提前释放。但王明道不干，说我其实没有改造好，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认罪，现在也不认罪，所以你不应该放我，你放我是违法的。除非你承认自己判错了，你把案子推翻，那么我可以出去。结果没办法，最后就只好把他骗出去。说我们要转监，结果出去门后，“咔”的一声就把铁门关了。以前不想进去也要进去，现在想进去也进不去了。

王明道就回到上海，然后一直上访（用现在的话说），写《致江华院长书》，告诉他们你们放错了，我这么多年之所以被关，只为着一件事，“就是我反对三自运动”，就是为了信仰。我只为这一件事坐牢，我从来没有服罪，也没有被改造好。但政府迄今为止，也没有平反“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包括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而当年因此被捕的人太多了，袁相忱、林献

羔，他们都是王明道的晚辈，比他小得多。他们都是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抓的。释放王明道，却不承认迫害基督教是错的。政府就只能假装王明道已经被改造好了。但王明道却像那个说皇帝没有穿新衣的孩子，不断声称，不，你们错了，我还没有改造好。

王明道的一生很独特，他基本上不关心社会和政治，但他的一生都得到了政治力量的庇护。不过这丝毫不是他争取的，而是来自至高上帝的计划和命令。他在20世纪初，中国教会的第一场教难中，作为遗腹子出生于美国驻华大使馆。又在20世纪晚期，经历中国教会的第二场教难之后，因着美国总统的请求而被释放。这显明一件事，就是一切关乎教会的事，都必须在属灵的权柄和普世的视野下去理解，而不能在民族主义的视野内去认识。上帝是全世界的王。教会在全球和万国中的成长和命运，是紧密相连、万事相互效力的。教会不拥有政治力量，也不寻求金钱势力。但一切政治和金钱，都可以在上帝手中被随意使用。我们相信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自己不追求这一切的原因。

简单来说，在1955年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家庭教会其实都是王明道的同案犯。因为王明道的“反革命集团”案迄今也没有平反。换言之，王明道对这个共和国来说，仍然是一个罪犯。如果今天我们持定跟这个罪犯一样的信仰立场，我们就仍然同属于“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因为王明道和倪柝声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案，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起源。只是今天不叫反革命了，今天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叫寻衅滋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若为主的缘故披上这些罪名是荣耀无比的事。在这个政权没有平反教案、或没有改变它打击基督教的立场之前，这些罪名就是主基督在中国的荆棘冠冕。我们可不想尽快取掉它，因为神什么时候取掉，它什么时候就要被取掉。逼迫是上帝的礼物，是教会的健身房。逼迫显明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来真的。我们诚然信靠这位主，我们果然信靠这位主。

回到1950年，周恩来三次接见吴耀宗和基督教代表团（成员都是政府钦定的人）。吴耀宗过去在重庆跟周恩来见面，他说基督教与共产党的信仰99%是相同的，周恩来却表示不同意。吴耀宗很佩服周恩来，相信他承诺的“新中国是有宗教自由政策的”。所以他和这个代表团去全国走了一趟，在各地收集了很多宗教

政策落实不好的案例，如抢了教堂不还了，干部辱骂牧师的信仰啊，跑到教会中宣传无神论啊，他们回京就报告给周，列了五百多个案例，以为总理会帮助教会落实政策。结果，周恩来把材料看一眼，就放在一边说，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宗教自由政策落实不落实的问题，“而是人民群众还能不能接受基督教继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带着帝国主义的痕迹。如果教会不跟帝国主义划清界限，不把帝国主义分子揪出来，那么人民群众“就不答应”。基督教在新中国就根本无法存在。

这话一说，翻脸无情，他们几个都吓傻了。吴耀宗赶快回去，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起草了一份《三自更新爱国宣言》，要揪出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要划清教会跟帝国主义的界限。交上去之后，周恩来说哪个地方不深刻，来回改了三次，最后找了40位教会领袖签字，寄送给全国各地教会。两个月后共征集到1527人签名，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看了，说这个应该向全国广播，然后又在光明日报上全文转载。

毛泽东也曾四次见到吴耀宗，开国大典安排他上了天安门城楼。你知道天安门城楼上的位置是有限的，但他们一家三口都上去了。他的票是周恩来给的，他的妻子和儿子两张票是宋庆龄专门送来的，他是提前录取的统战对象，毛还在城楼上跟他握了手。第二年国庆，毛又跟他握了一次手，说“你们这个做的好啊，要签名，有些人会反对，一定要扩大签名”。这样，从50年到53年就在全国教会继续征集签名，直到超过40万基督徒，都在上面画押卖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画押过关呢？那是一个生死抉择。不签名就可能坐牢，不签名就会被整个社会抛弃。在1950年代，不但王明道跌倒过，倪柝声跌倒过，贾玉铭、杨绍唐就更不用说了。事实上中国教会在整体上都是跌倒的，出现了大面积的，触目惊心的叛教卖友。在三自运动中，不认主岂止三次而已。鸡的嗓子都叫哑了，人们还是不认主。这一卖主的规模在教会史上是罕见的。亲手的、白纸黑字的签名，人人过关。然后就发动控诉运动，华人牧师控诉宣教士，同工起来控诉牧师，弟兄姊妹起来控诉同工。类似“某某人有官僚主义，上次叫他打印一个文件，他没有给我打。某某人有资产阶级思

想，上次贫下中农的信徒从他身边走过去，他没有打招呼。他们心里边对普通群众存在着严重的高等华人的帝国主义毒素”。你觉得这些话好笑吗，政治运动一来，在我们这间教会也照样会扩散的。在那个时代，这些话都是刀剑，是要人命的话。平常信徒之间、同工之间有嫌隙，政治运动一来，魔鬼的恶就像潘多拉的盒子在教会中被释放，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控诉，就会铺天盖地而来。

贾玉铭是最重要的基要派领袖，他是王明道的前辈，声望更高。一开始他拒不加入三自，但宗教局几个干部跟他谈话后，可能有威胁也有利诱。贾玉铭是上海灵修学院的院长，也是作家、神学家，有很多书在写。他大概太想保住自己的事工和神学院。人家就讲，你加入三自，这些都是可以的，马照跑、书照出、学院也可以继续办。你不参加的话，这些就统统没了。所以，如果上帝拿掉你的一份工作，你要赞美主。因为下次逼迫来的时候，你要放弃的东西就少了一件。如果上帝提前剥夺了你的出版，你的地位，那么当逼迫来的时候，你在这些方面就不会被世界威胁。令人畏惧的是，上帝没有提前拿掉贾玉铭太多的东西，所以他最终参加了三自。这是对整个基要派教会的一次重大打击，无数的信徒因他而跌倒。他加入三自后，政府把他当头面人物供起来，任三自全国副主席，但几年之后，兔死狐悲，灵修学院关闭了，书也出不了了，晚年的贾玉铭，深陷在属灵的失败中。

但主耶稣是配得称颂的。在王明道被捕之后，全国仍有大概不超过10万信徒，坚决不加入三自，或慢慢脱离了三自。教堂都是三自的，脱离三自就意味着你去不成教堂了。脱离三自就意味着你只能秘密聚会，这样家庭教会就慢慢兴起来。一直到1958年，三自运动做了一件更恶的事，就是所谓“联合崇拜”。意思是打破宗派，大家在一起主日崇拜。因为所有宗派都是西方教会带给我们的，都是帝国主义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跟帝国主义划清界限，那么在中国为什么还要有浸信会、长老会、圣公会呢，这不是保留了帝国主义的痕迹吗？所以现在只有一个“新中国的教会”，就应该取消一切宗派，大家联合崇拜。

其实，“联合崇拜”是个幌子，100个宗派就有100间教堂，取消宗派的目的是取消大部分教堂，削减教会数量。如上海有500间教堂，就压缩到10间；成都有26间教堂，压缩到2间，就是上翔

堂和恩光堂。经过联合崇拜之后，大部分地方，教堂都压缩到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所有宗派被取消，大部分教堂被关闭。这是一个“谋杀教会”的阴谋，这时退出三自、转入家庭聚会的人就更多了。因为现在你就算想去教堂，也没得去了。

归纳一下，伴随着三自运动，有三次退出三自的运动，“退出三自”的运动，一直都构成家庭教会运动的一部分。第一次退出运动，是1955-1956年，王明道和倪柝声的被捕，激励了一部分与他们认同的教会和信徒退出三自。第二次退出运动，是1958年后的联合崇拜运动，刺激了很大一部分教会和信徒退出三自，转为家庭聚会。第三次退出运动，是文革开始后，只要你想聚会，想保持信仰，你就一定属于地下的家庭教会运动。

有位贾玉铭的学生，写了一篇回忆录。说文革开始后，他见到自己的老师，贾玉铭跟他说，请你为我祷告，他说，“老师，你是教我们祷告的，怎么让我为你祷告呢”？贾玉铭悲伤的说，“我已经很久不祷告了，我无法祷告，也不知道怎么祷告，神不再听我的祷告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祷告。求你为我祷告吧”。中国教会的一代属灵伟人，竟衰败到这个地步。我们并不知道他的永恒结局，他的结局在上帝手中，他是否得救不是我们能评判的。但我们实在看到他在这条投靠凯撒的路上，属灵生命破碎如一地鸡毛。杨绍唐也一样，最后在文革中被批斗，在上海扫大街，倒地而死。他的儿子、家庭教会的老道人杨安溪在回忆录中为他作见证，说父亲最终看清了时局，没有丢弃信仰。他说自己作为儿子，很慎重地询问了父亲临终前的信仰状况，因此在墓碑上，仍为父亲刻下了“神的忠仆”字样。

令人敬畏的一点是，加入三自的教会领袖，大部分都活得不长，多数都死于文革。但家庭教会的领袖，那些在55-56年被捕、在57年反右中被捕、或在文革前就被关押、下放的人，到了80年代初全都放了出来，大部分都还活着，而且基本上都活到80-90岁。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李天恩、谢模善、边云波（国外）、杨心斐、李景沆，这批圣徒都坐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牢，哪有什么营养餐，保健操，但上帝都让他们长寿，最年轻的84岁（杨心斐），最年长的93岁（谢模善）。

这里隐藏着上帝极大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最残酷的文革来临时，这些1949年前的基要派教会领袖，都被神保护起来了。

保护在哪里呢，他们都被保护在监狱里。因为他们早就坐牢了。所以文革爆发后，被红卫兵批斗致死的、不堪受辱而自杀的都是三自领袖，因为他们都在外边。而家庭教会的领袖都在监狱中过安息年。坐过监狱的人都知道，从看守所到监狱，简直就跟进了天堂一样。因为相对来讲，监狱是有次序的。三年大饥荒时，外面饿死几千万，监狱中反而很少饿死人。文革开始后，更没有红卫兵冲进来批斗你。所以家庭教会的修道院，就是监狱。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要等着坐牢才有安息年。这是神特别给中国教会存留的恩典。兰州的李景沆长老，他是57年的右派，在夹边沟的劳改营幸存下来的，两年前离世归回天家。神在文革中，拿走了许多三自领袖的命。神却留着这些“共和国的罪犯”，一直活到90岁是为什么呢？请注意，三自领袖就算坐过牢，文革后都平反了，因为人家算“人民内部矛盾”。而家庭教会的领袖，没有人被平反过，因为人家看我们是“敌我矛盾”。这不单是他们个人和家庭蒙了祝福，更重要的是，神存留他们的性命是为着我们。这是给家庭教会留一个传承，一个血脉。当这个传承被牢牢建立之后，神才陆续接他们回天家。就像第一世纪，老约翰被留到最后，作为福音的见证人。没有这一批坐过牢、经过火炼的基要派传道人的老当益壮，就没有1980年后中国家庭教会的复兴。他们一直陪伴着家庭教会的复兴，一直陪伴到21世纪，才陆续被主接走了。

这是非常感恩的事。因为唯有主的名是配得称颂的。

第四章

十年生死两茫茫



前情提要：

1、自由派阵营，跟基要派阵营，在1949年前已形成了两条路线。

2、自立运动和山东大复兴，使属灵权柄转移到本土教会，中国半数以上教会脱离西方差会和宗派。

3、50年代的三自运动中，自由派教会演变为三自系统，以吴耀宗为代表。基要派教会的一部分转化为家庭教会，以王明道代表。



林伯（林献羔）的教会给我们寄了一批见证小册子，里面讲到1955年的情形，林献羔是王明道的晚辈，王明道在8月被捕，两个月后他在广州被捕，罪名就是“王明道分子”。林献羔有文字侍奉，写了很多小册子，这一点和王明道很像，当时他正写一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写完就被捕了。直到1979年，坐牢24年后被释放，林伯在1980年代印了这本小册子，对家庭教会影响很大。在改革宗神学尚未兴起之前，爆发了家庭教会中一次重要的救恩论争议，即救恩是否稳妥，是否可能失落。

救恩的核心是“唯独恩典”，如果救恩全然出于耶和華，在我没有一丝功劳。那么福音的奥秘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因着基督的死而复活，被绝不会失败的恩典所拯救。在改革宗神学兴起后，很多归正教会的牧者，会把这句话改为，“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因为这是我们称为“加尔文主义五要点”中的第五点，“圣徒永蒙保守”。

他也和王明道一样，两次入狱。反右运动开始后，王明道跟妻子刘景文在1958年第二次入狱。不久后林伯也第二次进去。1980年后，他们和其他一些前辈，都蒙神保守，陆续出来

了。王明道视力不好，到1984年，近乎失明。有人介绍广州有很好的眼科医生，他就去了广州，见到林伯说，“献羔啊，眼睛看不看是次要的，我这次来主要想见你一面”，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1980年代的家庭教会，有个流传很广的提法，叫“北王南林”，称他们是家庭教会两位标杆性的领袖人物。

上次提到，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最近站出来揭发三自运动的内幕，也反思他父亲的一生，给了我们很多宝贵资料。家庭教会的一位前辈杨安溪，他父亲是与王明道、贾玉铭并列中国教会三巨人的杨绍唐。他们父子走了不同道路，杨安溪有很多口述史，也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资料。

还记得吗，杨绍唐和王明道一样，也是出生于1900年教难中的世纪婴儿。1948年10月他在南京凯歌堂讲道，公开责备国民党的罪恶。杨安溪在口述史中，有一段令人动情的回忆。凯歌堂是蒋介石夫妇聚会的教会。那天早晨，杨绍唐把全家叫来，对他们说：“我今天去讲道，可能就回不来了。因为神感动我，要让我指出国民党的罪。如果蒋介石愿意悔改，我就回得来。如果他不肯悔改，我今天就回不来。”全家一起跪下来祷告，他说我把妻儿都交托给主了。然后起身去讲道。结果讲完道，蒋介石特意上去和他握手，说我们的确需要悔改。和贾玉铭一样，这也是一位曾被主大大使用的忠仆。但令人扼腕的是，到了50年代，他还是投身三自运动，成了全国三自的副秘书长。

他的儿子杨安溪在1949年考上燕京大学，和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宋天真，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一批“教二代”都成了同学。很有意思的是，杨安溪跟王明道关系特别好，一直在基督徒会堂聚会。父亲加入三自后，他还是一口一个“王叔叔”，甚至在王明道被捕前的大半年，他都住在王明道家里。当时一批年轻人，热烈争论应不应该加入三自。我们从中可以稍微看见基要派的一些局限，和当时加入三自的一批人的内心挣扎。

杨安溪谈到1949年共产党进城之后，对整个教会的思想冲击。你可能很难想象那种冲击，一夜之间街头的妓女就不见啦，一夜之间烟馆妓寮都消失了。那时的确有一个欣欣向荣的气象，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气象。无论教内教外，知识分子们都拥护共产党，觉得扬眉吐气，都以为前面是金光大道。很多传道人觉得，我们基督教做不到的，努力禁毒，禁鸦片啊，办教育

啊，一百多年做不到的，人家共产党一来就做到了。整个社会一下就换了天地。抓一批，杀一批，关一批，“妓女、税吏和大麻风”马上就没了。

一方面，自由派神学和社会福音，已席卷教会和教会大学多年，进步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占据了年轻一代基督徒的头脑。他们无法看见十字架与共产党革命之间的天壤之别。但另一方面，杨安溪的回忆也透露出，基要派也无力、甚至不愿回答福音与文化、福音与政治等重大议题。年轻一代发现，教会过去从来没有教导和讨论过这些议题，没有一个传道人教导我们应如何看待国家，如何看待革命。当时的燕京，大大小小两百多个社团，其中很多是主内团契。但政治运动一来，基本上全军覆没。只剩下一个福音团契，杨安溪当时是团契主席。弟兄比较少，姊妹们推选了他。但宋尚节的两个女儿都是他的大姐姐，他在属灵上乐于听从她们。

他们就讨论很多问题，也不知道长辈们是什么意思。比如应不应该、可不可以在爱国公约上签字？难道你们基督徒不爱国吗？对当时的教会来讲，基要派所传讲的福音，无法处理一个社会的巨大变迁。社会文化跟信仰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变得非常复杂，非常尖锐，所有长辈的教导中好像都没有现成答案。

他们就天天考察圣经，然后问长辈。大家都看王叔叔怎么说，贾伯伯怎么说，杨叔叔又怎么说。但到了最后，看人怎么说的人，大部分都跌倒了。一帮人跟着杨叔叔（杨绍唐），就加入了三自，跟着王叔叔（王明道）的，就不加入三自，但后来又动摇，多次反复。

杨安溪开始受父亲影响，觉得应该加入三自，就写了一大段，列了十几个理由，拿去和王叔叔辩论。后面被王明道说服了，觉得不应该加入三自，他又写了十几个理由，拿去给父亲看，劝他不要加入三自。他说，那几年非常痛苦，非常挣扎，其中有真诚的寻求，但这个寻求里很困惑，始终没有方向。以至于他的信仰，在1957年几乎完全崩溃了。

就像倪柝声的聚会所，在三自运动中“三进三出”。一会儿加入，一会儿退出。一会儿又加入，一会儿又退出。没有定性，没有确定的立场，其实并不知道该怎么办。压力一大，不加入不

行了；加入了也不行，又退出来。但到了最后，政府还是要抓你。

对一种“社会福音化”的信仰来说，整个共产主义的那种要建立人间乌托邦的伪宗教激情，非常冲击人心。杨安溪说，他经过几年的挣扎，读了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后，就几乎放弃了信仰。方志敏为了中国革命，慷慨激昂走向刑场。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这样掷地有声，使他深受震动。人家不是为了天堂，不是为了永生，也不是为了与主一同掌权，人家是为了解放中国人民。杨安溪感到，面对烈士的光环，我们基督徒特别渺小，特别自卑。

换言之，三自运动并非仅仅依靠了革命的暴力，而且首先依靠了革命的美学，就是意识形态的伪崇高和偶像崇拜。共产党人论到祖国的未来时说，“我们中间的党团员，我们没有给你们留下一个袖珍的新耶路撒冷，给你们留下的是一个960万平方公里一穷二白的中国，你们在上面可画最美最好的图画”。这种革命美学，俘虏了教会中的年轻一代。因此燕大在并入北大之前，学生团契就基本上一扫而光了。大多数人都失去信仰，其中包括王明道的儿子。

一方面，我们感谢主，为家庭教会存留了基要派信仰，在大逼迫中持守了福音。但另一方面，有少数老仆人都很诚实的讲，是神的手拆毁了中国教会。上帝使中国教会受管教，也使西方自由派教会的宣教事工被尽数拆毁。其中有教会的罪，有牧者的罪，也有宣教士的罪。就是教会逐渐离弃了古旧的福音之道，离弃了圣经的根基，被世俗之风吹来吹去。一切建立在沙土之上的工作，都被主败坏了，共产党成为上帝熬炼教会的鞭子。家庭教会史让我们看见，无论是一种跟随时代潮流的信仰，还是一种与时代潮流脱节、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信仰，其实都无法回应这翻天覆地的变局。

杨安溪说，他的一个同学跟很多著名的神的仆人关在一起，看见绝大多数人都放弃了信仰。只有郑惠端姊妹坚守了福音的呼召。她曾在成都服事过，成都掀起三自运动的第一场批斗大会，就是批斗郑姊妹的。她的自传叫《奇异恩典》。被抓之后，警察说她：“你看你信耶稣，却被关进来，出不出得去还不一定呢？”郑惠端说：“神要杀我，我也要信他。”这是引用约伯记

中的话。

杨安溪还提到，文革前他收到几封已放弃信仰的大学的来信。而且都有大致相同的内容，说，“当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关起门来追求天上的平安和喜乐。当烈士们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人民的解放牺牲自己的时候，我们却在那里自私地追求自己将来在天上的荣耀”。

如果你被抛到那个时代，如何自处？这些放弃了主耶稣的年轻人接着说，“普罗米修斯为人民而背叛了天庭。我愿为人民的缘故做普罗米修斯，像他背叛宙斯一样，我们为的缘故，有神也不信，宁愿自己下地狱”。

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最疯狂、最强有力的伪宗教。在那个时代冲击了整个中国教会。这是真神和假神之争，是空中看不见的上帝与魔君之争。然而假神携带着铺天盖地、改天换地的政治力量而来。你很难简单地去看那些叛教者。在50-60年代，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基督徒，都放弃了1949年前所相信的福音。这是极大的悲剧，极可耻的失败。如果我们被置于那个时代，我们大概也是如此。历史的教训帮助我们更认真、更要命的思考，更多认识主，更深知道主。包括必须知道信仰与整个世界之间的全部关系。

除了《可爱的中国》外，第二本对杨安溪影响巨大、足以令他放弃信仰的红色经典，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时代有一个热烈的红色文化，和一个狂热的红色宗教。你的信仰是“死而复活”，这个信仰叫“翻天覆地”。我们可以简单而直接的说，放弃信仰或加入三自的，都是信仰的根基不稳。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更细致、更有同情心的，去看基要派信仰本身的缺陷。

自由派有两个特点，第一，不相信圣经无误，脱离了上帝话语的权柄和一个超自然的信仰。第二，他们极其关注社会的不公不义，关注人民的疾苦，热切的盼望社会在道德上的更新。一方面，他们不相信基督的十字架，能够带来、而且已经带来人心与世界的彻底翻转；另一方面，他们又怀抱一种改变社会，关心民众的公义怜悯的情怀，甚至情愿为此而死。因此，新天新地的盼望，和罪得赦免的焦点，就逐渐转为一种要在地上实现公义怜悯的乌托邦主义。我们称其为“社会福音”，或一种提前实现的

末世论。

而基要派在与自由派的抗争中，有两个跟它刚好相反的特征。第一，坚决相信圣经无误，笃信上帝的话语和超自然的信仰，也坚持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焦点。第二，他们不关心社会与文化，强调与世界的分离和疏离。一方面，基要派想强调，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上，而一切现实的改变和肉身的福利，都不如灵魂得救更重要。这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基要派的不关心社会，也越来越成为对自由派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反弹。这导致了一种基要派的意识形态，“关心社会就是自由派”，“关心政治就是奋锐党”，“帮助穷人和更新文化就是社会福音”。所以基要派就成了“我们关起门来追求天上的喜乐”，民间疾苦由共产党负责，灵魂平安由基督教提供。那么我们所信的到底为何呢？所以杨安溪这一代燕京子弟，就在革命浪潮面前感到特别羞耻。

当时，燕大又发生了一场基督徒学生的大辩论，到底可不可以参军？而杨叔叔和王叔叔这些前辈的看法又不一样。王载是很重要的一个布道家，他说基督徒是可以参军的。但王明道坚决认为基督徒不可以参军。

基督徒可以参军吗？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能？不是绝对不能，要看参谁的军？那么战争违背圣经吗？不能一概而论？那么在战场上开枪，违背不可杀人的诫命吗？军队要听党指挥你怎么办？这些议题即使放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也很难有一致的教导和认识。

基督徒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人家说，你们基督徒也要尊重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写了保护宗教自由。我们给了你们自由，可以信耶稣，但你们基督徒不能这么自私啊。光让别人来保卫你们，让别人替你流血。你看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你让非基督徒去打仗，让他们去为国家死，给你们基督徒创造和平环境，好让你们高唱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们太可耻了！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你怎么回答？看守衣物的与上场打仗的一样，均分掳物？你们打仗，我们祷告？我们是纳税人，我们养活军队？有人出钱，有人出命？和平主义？耶稣基督说不要动刀兵？

事实上，中国基要派教会的立场，一直到90年代甚至进入21

世纪后，基本上都是如此，王明道、袁相忱都是这样看，蒙头会更是如此。不能参军，也不能告状，更不能告官。甚至不能看电影。除了没参军，其他几项我都干过了。

基要派相信圣经的权威性，同时也普遍相信一种字面解经，和一种时代论的末世论。那时全国基督徒才接近一百万人，相当于成都市区的一小块。是很边缘的一个人群。现在，突然被带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里，发现我的信仰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我以前根本没想过这些问题。传道人也没有对会众清楚教导过这些问题。怎么看待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怎么看待打仗，诉讼？什么叫顺服掌权者，教会跟一个无神论政府是什么关系？什么叫政治？这一切议题，自由派都振振有词，基要派对他们所说的都坚决反对。但除了“反对”以外，基要派并没有自己的完整回答。

关于爱国公约，燕大所有学生社团里，最后只剩下基督徒福音团契决定不签字。他们说，我们可以作为公民签，但不能作为一个团契签，因为团契是主基督的教会。我们个人是爱国的，但教会不能参与爱国宣言。他们希望和其他社团公开辩论，但后来取消了。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也是基要派走到最远的一个立场。今天家庭教会反对三自的一个共识，就来自这个立场。当时他们这样做是很勇敢的，受到难以想象的压力。

到1958年的联合礼拜，这是三自运动的第二个高峰，消灭了宗派，也等于消灭了90%以上的教堂。这也导致了家庭教会运动的第二个高潮。第一轮高潮在王明道被捕之后。之前不参加三自，并不算反革命。之后不加入三自就是反革命，就足以构成被捕的理由了。而在第二轮高潮中，教会普遍失去了会堂。以前你不参加三自，仍有自己的会堂。现在你不参加三自，就只能退回家里聚会。

因此，虽然家庭聚会从1950年就在各地零星开始了。但家庭教会作为一个运动，是在政府以反革命罪正式逼迫教会，拘捕王明道等教会领袖之后开始的。1955年8月以后，不跟吴耀宗站在一起，你就要被逼迫。你说好吧，我就不跟他在一起，我愿意和反革命分子王明道站在一起，我情愿受逼迫，情愿被我的国家视为人民公敌。这个立场一出来，才有了中国家庭教会。

在家庭教会运动的第二波中，你不愿意联合崇拜，就只能

在家里聚会。这时，更普遍的理由，其实跟政教关系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宗派的理由。非要让长老会的人去浸信会聚会，我不去。因为我的良心不能处理认信上的差异。现在政府一声令下，十个宗派必须在一间教堂聚会，浸信会一个人来领会，长老会一个人来祷告，圣公会一个人来掰饼。很多信徒和传道人都不能接受这样的合并。因此，在这一轮政治运动中，很多教会退回家庭。虽然是被迫的，但理由变得更简单，就是为了保持宗派的认信。因此，家庭教会运动的特征之一，是在某些地区明显保持了宗派的特征。尤其是聚会所，你一旦接受了联合崇拜，你还能叫聚会所吗？所以对很多宗派来说，接受联合崇拜就等于放弃自己独特的认信。

而三自就从此就号称自己是“无宗派的教会”。因为枪杆子把所有宗派都融在一起了。丁光训后来居上，成了吴耀宗的接班人。他本身是圣公会主教，联合崇拜后，尤其是文革后恢复聚会，三自多少保存了一些圣公会的礼仪。

再到1963年，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宗教问题大讨论。当然，不是让基督徒来讨论，而是党的宗教政策大讨论。譬如一只鸡关在笼子里，几个人在旁边讨论该怎么杀，那只鸡并没有发言权。不是宗教界的讨论，是党的干部讨论如何及怎样消灭基督教。在这个大讨论中，出现了温和派和强硬派。

杨凤岗老师，把这场大讨论中出现的、一直延续至今的党内温和派和强硬派，分为三类，称为“温和的无神论”、“启蒙的无神论”和“战斗的无神论”。战斗的无神论是激进派的无神论，认为宗教是鸦片，而且是政治上的敌对势力。“消灭宗教”是他们的政策目标。“启蒙的无神论”认为，宗教是不科学的，是一种无知导致的迷信，需要被启蒙，被教育，因此宗教是迟早会消亡的，但有一个过程。不能一口气消灭它，要促使它衰落和渐亡。因此他们的口号是“限制宗教”或“促退宗教”。

当时只有这两派，在启蒙的无神论眼里，基督教的主要罪名是“愚昧”；在战斗的无神论眼里，基督教的主要罪名是“反动”。至于“温和的无神论”，要到20世纪末才会在党内出现。

这场宗教大讨论的结果就是，“战斗的无神论”在党内获胜，从此主导了直到1979年的宗教政策。因此，这场大讨论是文

革的先声。要立刻、尽快，努力促成宗教作为腐朽的和反动的人类文化在新中国中的消灭。所以在文革尚未开幕，对基督教的文化革命的目标就已经确定了，恨就一个字，杀。看法不同的只是有人说注射，有人说枪决，有人说砍头，“最终解决方案”不一样而已。

有一点需要反思，就是“战斗的无神论”不但是党内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几十年的浸泡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教会对自身的理解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的自我认知，事实上仍然是被“体制化”的。说基督教“愚昧”，主要是让自由派坐立不安，而基要派纹丝不动。因此自由派希望自己变得“文明”和“现代”起来，他们为自己申辩的主要方向就是“我们与科学是一致的，我们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我们是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而说基督教“反动”，主要是让基要派坐立不安，自由派则纹丝不动。因此“我们与政治无关，我们与海外势力无关，我们不关心社会问题，我们顺服掌权者”就成为家庭教会为自己申辩的主要方向。

那时主管宗教的叫李维汉，他早期是特务头子。主管宗教的都是特务，宗教管理的最高部门从来不是宗教局，而是特务部门和统战部。共产党早期的特务部门由周恩来负责，后来在白区由刘少奇负责。周恩来之下就是李维汉，他也是中共统战部部长。

现在宗教局直接划归统战部，变成了不拿枪的党卫军。如四川省宗教事务管理局，从政府编制中撤了，只保留一个名义。但机构和人员都直接合并在中共四川省委下面，党政合体，连办公地址都变了。如果宗教局成为一个党务部门，跟基督的教会就更没关系了。我们可以服从警察，但不可以服从宗教局。因为它已成为无神论政党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民政府”的一部分。这样，圣经赋予我们顺服政府的责任，就完全豁免了。家庭教会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彻底拒绝服从来自宗教局的任何命令。教会怎么可能让共产党的一个办公室，来指导我的信仰呢？谁这么做，谁就是卖主叛教。如果它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它实质上是敌基督的工具，我们稍微还要有顺服掌权者的外在程序和基本礼貌。可它现在直接是党委的一个部门了，我们仍然尊重每一个宗教局干部，因为他们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类，更是我们的同胞；但我们绝不再因他们“宗教局干部”的身份而尊重他们。

李维汉是强硬的消灭派，当时在温州搞了无宗教区的试验。1963年那场大讨论之后，战斗的无神论要消灭宗教，就在温州尝试了“无宗教区”，因为温州在文革前就是教会兴盛的地区。

到1966年开始文革，逼迫很厉害，来得非常快。首先是所谓“党内走资派”基本上被批斗了，陆陆续续坐牢，甚至迫害致死。对教会的消灭是同步的。文革开始不久，地上的教会就基本消失了。后来到70年，北京和上海有一两间，重新开放，作为接待外宾的地方。这个“地上无教会”的时代，一直持续到79年，宁波的百年堂，是全国文革结束后第一间恢复聚会的。接着上海有一间，然后是北京的崇文堂，各地才有教堂陆续开放。1966年-1979年，整整13年中国没有一间教会。在上海，张春桥宣布说：“中国已经没有基督教了。”江青也宣布说：“我们只用了几个月，就把基督教扫进了历史的博物馆。”毛泽东最后一次在中南海见到吴耀宗，对他挑衅说，“你那个上帝最近不太灵啰”。

这样，中国教会跟海外教会也很快失联，普世教会得不到任何来自铁幕内的消息。他们为中国教会祷告，以为教会在中国已彻底消失。许多宣教士和差会都十分哀伤。然而神对教会总有特别的熬炼与保守，13年来地上虽无一间教会，无一位牧师，无一位长老。但家庭教会却进入它的第三个高峰期。退出三自的运动也进入第三波，因为任何坚持聚会、团契和祷告的信徒，都必然成为“地下教会”的一部分。

文革有一个转折点，就是1971年的9.13政变。副统帅林彪叛逃，他儿子林立果策划杀毛。他们出逃的飞机被中共打下来。这一事件对时代氛围带来比文革本身更大的震动，冲击了个人崇拜和国家崇拜的不可一世的潮流，很多人慢慢幻灭或看清了问题。

尤其是林立果的政变计划，叫《571工程纪要》，他策划了从军事政变到重建国家的整个政纲，文件中毛泽东的代号叫B52，就是美国的隐形轰炸机。除了政变计划外，纪要揭示了民众不了解的，甚至想也不敢想的真相，和一种与官方宣传截然相反的价值观。里面说，整个统治集团内部上层腐败、昏庸无能，高层已经众叛亲离，敢怒不敢言。林立果宣称，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文革正在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互相残杀的绞肉机。纪要对毛泽东本人，有一个会把一半中国人吓死的评

价，说毛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在1949年后，革命文化对教会的年轻一代的巨大冲击，曾导致杨安溪失去信仰，而他在口述史中说，在林彪坠机之后，他才慢慢开始恢复信仰。

在1968年，文革仍处在高峰。杨安溪回家见到父亲。父亲跟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他很惊讶，说“爸你身体还不错，怎么说这话呢”？但杨绍唐有预感，知道这是在地上最后一次见面。果然不久后，他就上海街头被批斗，扫大地，昏迷后死去。在那次谈话中，杨安溪就问父亲，“中国教会还有没有希望？”杨绍唐沉默了一分钟，然后说：“这两年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但我都不敢回答，因为我信不过他们”，为什么？因为经过几年的控诉运动，信徒之间都失去了信任。当然，边云波在回忆录里，对这种情况有一个辩护，为了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他说，基督徒之间都养成了不问、不说的习惯。因为如果我不知道，那么就算警察施压，我也不能出卖你。这样，信徒之交淡如水，街上相逢点一个头，知道主基督永远活着，就把思念存在心中了。

今天要控诉一个人就更简单了，把手机截屏直接拿出去。但那几年的控诉运动是很残酷的，杨绍唐又说，“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过这个问题，但你不同，你是我儿子，我信得过你。我跟你谈，中国教会仍然有希望，主的教会必然有希望。”

在文革中，家庭教会有一奇人，叫叶乃光。据说没信主前练过武功，是个高手。到处传福音，当年冯玉祥曾驻军河南信阳，使信阳成为基督教复兴之地。冯玉祥的军队剿匪，叶乃光到山上跟土匪传福音，被当成冯的探子，把他绑起来打个半死。放下山后，又被当土匪的探子，被冯军抓起来，又打个半死。最后他又重新回到山上，去跟土匪传福音。结果他真的带领土匪信主，叫他们下山来投降。

1968年，杨安溪去见叶乃光，问他同样的问题：“中国教会还有没有希望？”叶乃光说了八个字，“新人不齐，新日不至”。他解释说：前几十年上帝在中国教会是做“养育”的工作，这几十年神要做“拆毁”的工作。等这几十年过完了，新人齐备，

新日才会到，中国教会就要进入“倒输”的工作。倒输的意思就是向国外传福音。

90年代后，家庭教会常讲一句话，“福音进中华、福音在中华、福音出中华”。这就是叶乃光在1968年所看见的三阶段，养育、拆毁和倒输。他的信心是很了不起的。因为那时还能信主、偷偷聚会就是神迹了。几十年后中国教会要倒输出去、向全世界传福音。这就像先知说的，“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叶乃光说，1949年后的几十年，神的目的是要除掉旧酵，拆毁教会，然后训练新人，新人不齐，新日不至。

六十年代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在山西、厦门、山东、上海。9.13事变是一个转折，思想被震动，管制也稍微松一点。秘密聚会就开始增加了，游方布道的人也非常多了，河南教会和安徽教会，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复兴的。1958年的联合崇拜是一个大的起源，9.13之后的文革后期是快速发展期。

联合崇拜的目的是透过消灭宗派，来消灭教会。所以1959年，就有配套政策出来，叫做“15个不准”。内容各地略有不同，以下是张义南在《河南家庭教会的起源与发展》中提供的版本：

1. 不准在堂外传教；
2. 不准祷告治病；
3. 不准有剥削行为；
4. 不准歧视和污辱妇女；
5. 不准非法聚会；
6. 不准妨碍生产；
7. 不准到处流窜；
8. 不准吸收18岁以下少年儿童入教；
9. 不准包庇地富反坏；
10. 不准破坏社会主义和集体经济；
11. 不准造谣惑众和悲观厌世的反革命宣传；
12. 不准设堂口和家庭聚会；
13. 不准私升神职人员；
14. 不准把教义和党的政策混淆起来；

15. 不准与海外联系。

其中大部分内容，在2017年以来宗教局对教会的全国性逼迫中，都基本一致。如河南三自在2018年出台的“基督教教堂公约九个不准”：

1. 不允许18岁以下儿童入教堂；
2. 不允许共产党员非工作原因入教堂；
3. 不允许未经两会批准接待外来讲员；
4. 不允许宗教活动场所外，开展任何宗教活动（包括传教、探访）；
5. 不允许非法传播及经营宗教书籍、刊物及宗教用品；
6. 不允许到未经批准的场所活动；
7. 不允许网上非法传播宗教内容的文字图片；
8. 不允许在街道或路边设置宗教色彩的标牌；
9. 不允许未经批准举办培训班。

对比一下就知道，就宗教领域而言，文革从来就没有结束过，今天共产党的逼迫教会的宗教政策，就是文革的遗产。

如方城的前辈传道人高允玖长老，文革前就坐牢，坚决不加入三自。文革中多次被批斗，游街。有意思的是，在河南，批斗会成了最主要的布道会。干部和民兵让他坦白交待，他就借机向群众传福音，向乡亲们见证信主可以病得医治，现在被批斗，但灵魂可以上天堂。文革后期方城一批年轻传道人，都听过批斗会，都受过高长老的影响。一大批被称为“灵歌”的河南教会诗歌（小敏诗歌的泉源和前身），如《打魔鬼歌》、《为主殉道歌》，极其悲壮，催人泪下。

高允玖也是另一位家庭教会的前辈李天恩的姐夫，在1971年的9.13前后，李天恩在上海极其痛苦，看不到教会的希望。路上遇见一个信徒，亲切的喊一声，结果对方不敢应答，装作不认识就走了。之后他做了一个异梦，梦中登上一座山，看见漫山遍野

的基督徒跪着祷告。而一个共产党的高官，也跪在山坡上。他十分惊喜，也十分惊讶，说这怎么可能。在梦中他听到主的一句话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不久，姐夫高允玖就来信，邀请他回方城、叶城，说弟兄姊妹很渴慕，盼他回家乡，天恩在1972年回到河南，与高长老同工。

方城教会在文革后期的复兴就是这样开始的。上帝在各人心中做工，上帝也在国家的历史中做工。没有这封信，李天恩不会回去。没有那个梦，李天恩也不敢回去。没有9.13事变，也没有文革后期的氛围和管制的稍微放松。但在主那里，主都亲自预备好了，预备好了，复兴就要来临。

你知道文革时的家庭教会，在什么时候聚会吗？通常是半夜两、三点聚会，等警察下班了，朝阳区大妈困了，民兵也打瞌睡了。地下教会就在半夜聚会。地点呢，很多是到旷野去聚会，到山洞去聚会，跟初代教会一样，这种经历都特别多。我去温州，有一座祷告山。以前没有路，一大早爬山几个小时去聚会。警察民兵不想来，来了也容易跑。最后，就是游方布道的运动。在逼迫面前，随走随传。

成都的家庭教会，也是在1971年的文革晚期出现的。之前零散的也许有，但形成聚会的没有。家庭教会的前辈叫刘本耀牧师，他跟郑惠端姊妹一样，都是49年前后来四川的。刘牧师从陕西来，好像读过华西的神学院。然后在成都服事，1958年被打成右派，坐牢。文革后期就出来，开始秘密聚会。和他一起的有龙爷爷，张爷爷，还有龚爷爷。龚爷爷的儿子是华西骨科的老教授，我三岁时发现髋关节先天性脱位，龚老师从华西到三台，给我医好的，使我没有瘸腿。信主后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父亲是被称为龚爷爷的家庭教会前辈。覃德富弟兄的父亲是老传道人，当年是由张爷爷施洗的。

按刘同苏牧师的说法，家庭教会在早期很看重类似“使徒统绪”的传承。在后使徒时代，教会在逼迫中，都是按着肉身的传承，领受父辈的教导。譬如使徒约翰的门徒之一是坡旅甲主教，坡旅甲的门徒之一是爱任纽主教。而伊格纳丢主教是坡旅甲的好朋友。这就是正统信仰在早期的传承。因为新约圣经的权威性还没有完全确立。这时，用家庭教会的话说，“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个人传承就是最重要的。

覃弟兄的父亲跟张爷爷学道，张爷爷跟刘本耀牧师，刘牧师跟的是王明道。这就是“根红苗正”的家庭教会。直到90年代，家庭教会仍有这个“使徒时代”的特征。“你们教会是谁建立的？”“我们传道人以前在广州林伯那里聚会”。教会保证自己的信仰的纯正，脉络都是往五、六十年代的老前辈那里追溯。如果问了半天，跟所有人都没关系，就令人怀疑了。互相了解的交流成本很高，需要花时间慢慢地了解你，才能判断你的信仰是否基要。

直到2008年的5.12大地震还是如此。全国各地来了很多教会，很多传道人，大家在一起，没有宗派，没有教会体制，没有圣职，也没有信仰告白。问“你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信耶稣”“使徒信经？”“那是人写的，我们只认圣经”。那我怎么知道你到底信什么呢，大家又问，小敏的歌会不会唱？这个会啊，一开口就唱《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啊，这是家庭教会的。所以教会在5.12后浮出水面，主要是靠小敏的歌来互相认亲。会唱迦南诗选，就是自己人，走，一起去灾区。不唱小敏的歌，多半是三自的。

所以从文革开始，家庭教会就有一个肉身的传承，教会产生于一批“父老”。直到21世纪初，你的信仰如何都是与父老有关的。而城市新兴教会的意思，就是没有父老的教会，像我这代的传道人，中间有断层，没有跟随过父老。我们是通过阅读、视野的扩大，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很多海内外的牧师都牧养过我，对我有很大影响。包括唐崇荣牧师，我跟他只见过几次面，没有深谈，但在属灵上我仍将他视为我属灵的父亲。不过在具体的信仰生活和牧会中，我是摸黑成长，缺乏被父老门训的经验。这不仅是我自己，而是整整一代传道人的情形。家庭教会的父老总量上不多，而且零零散散，只在一些教会有根基的地方，如福建、上海、山东、山西和北京等地。

所以八年前，福音派教会的一批中年牧者，想去寻找父老。那时文革坐过监的父老大多离世归天了。后来，袁伯，林伯，杨心斐阿姨，谢模善，李天恩，都在过去十年内被主接走了。这批中年牧者就往西北去，找西北灵工团的后代，赵西门的妻子还在。这样，他们就把一批经历过文革火炼的父老找来。和他们一起聚会，在属灵上去“认父”，承认这是家庭教会的父辈。这

个“属灵的认父”是有意义的，表达了新一代家庭教会的自我认知，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誰。

以前学者朱学勤跟我讲一个故事，他没有信主，文革中被下放，是当地一个根红苗正的老太太家里。最纯正的贫下中农，还作为典型上过报纸。半夜他起来解手，发现老太太跪在灶台旁，叽咕叽咕，不知说些什么。他不好打扰，忽然意识到，她是在祷告。这个阳奉阴违的革命家庭，居然是个反革命，是个基督徒。朱老师非常震惊，给他思想上很大的冲击。原来文革中全国江山一片红，不革命的都被抓起来了，但竟然还有一个地下形态，还有一个夜晚的精神世界，还有一个秘密社会仍然存在，并没有被共产党消灭，那就是教会。

9.13事件之后，地下教会开始增加，到文革结束后，76年到79年这三年，是半个世纪以来政教环境最好的三年。教会爆发了大复兴，和更大规模的游方布。同时，文革前后这几年，家庭教会的神迹奇事也特别多。

今天你的信仰生活中，似乎没什么神迹奇事。但是，第一，神迹奇事是存在的。只要有神，就会有神迹奇事。第二，我们不要追求神迹奇事，因为神迹的意思就是表明神掌权，神作主，神说了算。你说了算，还叫什么神迹呢。在圣经记载的以色列历史上，和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上，大多数时代都没有神迹。第三，不过你真想经历神迹奇事的话，建议你去西藏宣教，或者去巴基斯坦也可以。

因为在旧约时代，神迹奇事就高度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出埃及时期，直到进入迦南。上帝的作为奇哉大哉。之后就没有神迹奇事了。大卫行过神迹吗？没有。所罗门也没有。接着是先知运动的时期，以利亚和以利沙。被掳之后，也没有什么神迹。有神迹奇事相伴，是天国来临的记号。所以神迹都是高密度发生的，表明救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和转折。神迹奇事从来不会平均分布在救赎历史和世界历史中，而是在救赎历史的关键时刻，上帝藉着神迹来推动和见证他的国度。

你明白吗？神迹不完全跟你个人有关。你为了个人的原因，说：“神啊，我生病了，你行个神迹让我好吧。”这不是不可能，但这件事相当严重。你有没有想过，病好后要去非洲宣教？

有没有想过，你这一生要经历多数弟兄姐妹难以承受的磨炼？被主破碎、摔打到一个多数弟兄姐妹难以想象的地步？如果你根本没想过这一切，你就别去求神迹。因为神迹都跟上帝的国有关，跟救赎历史的推进有关。李天恩作了一个异梦，看见教会在不可能中的复兴。后来显明，上帝的确使用这个梦，也使用这个人，推动了河南和中国家庭教会的复兴。而有人说自己20年前经历了一个大异象，大神迹。结果20年后，他的生命糟糕得不得了，他作的工大多被主拆毁了。那么他宣称的所谓神迹，显然出于魔鬼的伪造。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神迹临到你，表明你在救赎历史中要扮演一个不一般的角色。十字架的道路和十字架的能力都要临到你。这不是求来的，是主的拣选，临到谁就是谁。

新约时代也一样，神迹集中主耶稣身上和使徒时代，因为使徒直接代表主。在使徒行传中，凡是提到“病”或生病，都是使徒行神迹、给别人医病，甚至使死人复活。没有一次是说使徒自己生病。但到了后期的使徒书信中，只要提到“病”或生病，都是他们自己生病了。保罗说我这个同工生病了，我那个同工也生病了。这个生病要用一点酒，那个生病你们要好好照顾他。没有一次是使徒行神迹、替人治病。因为教会的根基一旦建立，并且在一个代表性的意义上，福音已经传到了地极，神迹的密集期就过去了。

而在教会历史中，每当福音进入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空中的魔君与邪灵在其中肆虐的族群及其文化中，就会有神迹奇事发生。见证神的国征服魔君。之后，教会的根基一旦在那里被立好了，就不大会有神迹发生。成都教会的根基已经立好了，你在这儿活着是不太可能有神迹奇事的。非洲也在过去一百年经历了大复兴，也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不过现在还有一些小岛上，有食人族，还有藏族地区，偶像林立。还有伊斯兰国，残酷迫害教会。如果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去这些地方，你一定会经历神迹，经历到上帝在绝不可能中做没有不可能的事。

这就是文革前后，家庭教会普遍经历神迹奇事的原因。因为整个中国教会被上帝重建了。上帝收复了失地，中国教会在与普世教会彻底脱离三十年之后，再次出埃及，神迹宣告中国在属灵上重新属于基督。文革前后的神迹，和1927年的山东大复兴一样，证明圣灵将属灵权柄赐给了中国教会。神迹是合法性的证

明，证明中国只有这一个教会，就是经历了大逼迫之后死而复活的教会。

最后讲一个故事。杨安溪的见证，他从57年信仰崩溃后，就在神面前求圣灵充满，使他恢复信心，祷告了17年，神都没有给他。最后在文革中，他被关牛棚，被一个看守绑起来，用鞭子鞭打了三个半小时，直到快死了，这时他忽然经历到圣灵充满。他以前是运动健将，相当以体魄自傲，当他被打得快死了，才知道被鞭子打是最痛的。为什么被打呢？因为有个人告发他。告他什么呢？年长的人知道，当时有个词叫“三忠于四无限”，四个无限就是“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崇拜”。

那人说，基督徒肯定做不到四个无限，因为你们信神，就不可能无限信仰毛主席。杨安溪说，我不能无限信仰，因为我信耶稣。但我还是可以无限热爱，因为上帝要求我去爱他人。辩论了半天，人家得出结论说，你们基督徒只要没有放弃有神论的信仰，就肯定做不到四个无限，所以你们还是反革命，于是那个人告发了他。

他被鞭打到一个地步，告发他的人崩溃了，跑过来给他说对不起，那人甚至倒在地上哭，以为他要被打死了。就在这时，杨安溪突然经历到圣灵充满，里面充满了一种力量，含隐不住，十分喜乐。他就跟神祷告：“主啊，不要是这会儿吧，这是在牛棚，我现在被鞭打，又不能赞美你，又不能唱诗。我祈求了十几年，怎么这会儿给我呢？”于是他就饶恕了告他和鞭打他的人，因为他里面有喜乐，和主恢复了亲密的关系。他在信仰上经历了极大的被肯定，圣灵就激动他，鼓起勇气找领导说：“我的确做不到四个无限，我不可能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毛主席，你们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我这个死不悔改的基督徒身上了，我绝对不可能悔改的，你们要杀就杀，不要浪费时间了，我就这个样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去找杀你的人摊牌，说死就死吧，我就是信耶稣。王明道在1980年代，经常给请教他的人送八个字，叫“但遵神旨，莫问前程”。林献羔对来访者，也经常总结家庭教会的“神圣原则”，叫“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有复兴”。因为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今天，逼迫再次临到家庭教会了，我们有谁不惧怕，有谁不软弱呢。从现在开始，祈求圣灵充满吧。

结束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若没有你圣灵的工作，我们就被那“可爱的中国”，被时代的潮流和人间的社会理想裹挟了，或者在那一切面前，没有办法坚持和回应教会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主啊，你使中国的基要派教会经历了磨炼，很多人放弃了信仰，背叛了你。但也有很多人在极端的情况下仍然蒙你保守。你在拆毁的工作中，仍然有丰盛的恩免。那些前辈圣徒，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刚强，都经历了软弱，跌倒，甚至如彼得一样不认你。但你还把他们熬炼到一个地步，来祝福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教会。我们既是这些父老的属灵后代，求主也照样感动我们，虽然今天我们抵挡罪远远不到流血的地步，眼前这一轮逼迫也远远没有到丧失生命的地步。主啊，你若再做拆毁的工作，也求你做保守与复兴的工作。求主激动我们一些人，全然献身给你。求主让我们来认家庭教会的属灵父辈，知道自己是谁，就去跟随他们的脚踪，好叫我们在后代面前，能将那属灵的道，将十字架的道路和荣耀传承下去，再传给三十年、五十年后的中国教会。感谢主，听我们如此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阿们！

第五章

基要派的大复兴



图：80年代青岛基督教圣诞节唱诗班。

文革之后约40年的当代教会史，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可称为“基要派的大复兴”。从1978年开始，结束有两个标志性事件。第一个是1989年的六四屠杀。这既是整个国家历史的转折点，对家庭教会而言也是一个大扭转。第二个标志事件是1991年王明道离世。89-91，是暗昧无光的三年，历史和一切有价值的事物似乎都停顿了，就像日头停在空中。我正是在那几年度过漫长的青春期。1992年后，中国开始进入又一个高歌猛进的新石器时代。

80年代的焦点，是乡村家庭教会的复兴。复兴主要是发生在乡村地区，从规模、人数和流动性来看，运动的中心都在乡村。因为在城市，每个人都被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和公有制度牢牢盯着。没有人的流动，就没有福音运动。而在当代，人们主要在乡村流动。所以，改革开放也是从乡村到城市。福音运动和经济改革，都是先从极权主义的边缘地带开始复苏的。而且都跟安徽有关。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安徽的小岗村开始。家庭教会的复兴也从安徽的阜阳、颍上开始。世俗社会的活力，从乡村慢慢影响到城市。家庭教会也一样，也是从乡村复兴，慢慢影响到城市。

河南教会、安徽教会和（浙江）温州教会。这三个地区，是基要派教会大复兴最重要的省份。除此之外，福建、山东、山西等地，包括东北部分地区，都有基要派的复兴。教会的觉醒几乎是全国性的，但这三个省最突出。

城市中的灯塔

在1949年前，中国教会的中心在城市，特别在沿海一带。内地教会相对少一些，力量也小得多。中国的“圣经带”集中从广东、福建往上，直到浙江、上海，再往北到天津、北京，直到渤海对面的营口这一圈。50-60年代，为主坐牢的一大批仆人，多半也集中在这一圣经带的大城市里。所以80年代的大复兴有两个特征，第一，基要派大复兴的标杆人物，都是居住在北、上、广（今天叫一线城市）的几位传道人和几间教会。但是，第二，整个大复兴的地域中心是上述几省的乡村地带。

大城市里，王明道住在上海儿子家里，没有再建立和带领教会。1980年春节前，按着邓小平访美与卡特达成的协议，王明道被释放，之后不久，他就回到上海居住。在整个80年代，他主要作为一个精神榜样，影响着中国的家庭教会运动。但他不再牧会了。继续牧会、影响最大的传道人，也是南北两位。一是北京的袁相忱，他带领的教会叫白塔寺教会。一是广州的林献羔，他带领的教会在大马站。所以广州大马站教会和北京白塔寺教会就成为一南一北的两座灯塔。灯塔的意思就是孤立，四面都是海水。和乡村教会相比，当时的城市教会都是孤岛，人数不多。

1978到1982年，大城市中陆陆续续放出来一批传道人，其中有些辗转去了海外，但大部分留在了国内。这批老仆人，成了大复兴的中流砥柱。为什么说他们是标杆人物？因为那个时代的特征，是坐过牢的传道人比整间教会的影响力更大。坐了几十年牢的人，你再抓他也没什么意思。做过牢的人出来，再建立一间教会，当地政府就得过且过，装做没看见了。因为生命的见证是很难征服的力量。像林献羔的大马站教会，从82年开始，直到92年，几次说要关闭。1988年，公安局在半年内6次传唤林献羔。但之后不但没有关门，反而人数越来越多，成为南方的一座灯塔。

任何时代都是这样，教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走到一个地步，才能让世界睁只眼、闭只眼。你要付代价到底、死了又活过来，人家就装着没看见你。袁相忱在北京，林献羔在广州，还有杨心斐在厦门，李天恩在上海，都是如此。这些从1949年延续到1980年代的基要派教会，中间死过，后来又活了。一旦复活过来，就从来没有再被消灭过。

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就是这跟教产或家产也有关系。每次去香港，我就很感慨，香港有很多教会，很多福音机构，都有很多教产。这儿有一幢楼，那儿有一块地，有好几个可以举行大规模营会的基地。你知道怎么来的吗？其实不是单靠香港信徒奉献的。而是1949年前后，大陆教会撤到香港，把积累了100年的教产，都带去了一部分，所以在香港这买一块地，那修一幢楼，那边又盖一个学校。这样香港就成为福音基地，三分之一的学校都是教会盖的。没有这个跨代的积累，教会很难在现代城市扎根。香港的地就跟纽约一样贵，上海、成都的地也跟香港一样贵了。就算政府放开了，说我们可以买地建教堂，你知道目前成都主城

区一亩多少万？要1500万。第一代教会只能买写字楼，根本建不了教堂。

因为教会不但是一个时代的圣徒团契，而且是历代教会的一个积累。我曾有一次去台湾神学院，他们在阳明山上，现在是台北最贵的地方。风景很美，在那里读书你根本不想毕业。宣教士当年很便宜买下那里，因为那里是坟山，当地人都不想要，现在就祝福后世的教会了。还有，欧洲一些大教堂，是用了超过一百年、甚至两百年才修好的。

林献羔和杨心斐他们这一代，祖上就住在沿海开埠城市，他们的教会，都是奉献自己家里的院子聚会。教会的存在背后，有一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的积累。他们不但坐过牢，而且家大业大，他们家就是楼上楼下，前院后院，可以坐五六百人，每个房间都坐满人，放个电视机转播。这几个大城市中的孤岛，都是全家奉献、家里刚好有个院子，自己又为主坐过牢。没有这几个条件，你在80-90年代，没有经过2000年之后城市教会从家庭到会堂的变迁（这是最近10年才发生的），是不可能存活的。

但这都是个例，是上帝特别预备的。其他地方效仿不来。这是1949年前的基要派教会，经过火炼之后，留在大城市中的几个孤岛。他们的任务是坚守阵地。而福音运动的开拓任务，是给了一个开始流动的乡村社会中的教会。

从基要派到福音派

1989年是转折点，之后的中国教会，直到今天仍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正在发生的大转变，就是从基要派到福音派的转型。这涉及到对基要派的反思。而这个反思，起源于六四屠杀带来的全社会的绝望与压抑、流亡与沉默。正如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西方基要派与福音派的分裂。文革与六四也将为中国教会带来基要派与福音派的区分。“民主败北、福音进城”，也将成为下一个十年的主题。

80年代的大复兴，转折于这场民族苦难。1949年前，中国教会形成基要派与自由派两大阵营，这一对峙，因着国门封闭和逼迫而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但在全球范围，基要派与自由派分道

扬镛后，因着二战的冲击，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基要派向福音派的转变，以及老基要派与新基要派（福音派）之分。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欧美教会成为自由派的天下。于是基要派站起来说：我们相信圣经每个字都是无误的，上帝的启示。我们相信这个古老的和超自然的信仰，这个世界是“神启”的，因为这个世界有神。这个世界是超自然的，不是道法自然，不是一切按照理性和科学去理解的世界。恩典是超自然的，所以我们相信童贞女怀孕生子，相信死而复活的十字架。历史的目的也是超自然的，所以我们相信基督再来和末日审判。

上一讲提到自由派的两个特点，第一，他们不相信圣经无误，脱离了上帝话语的权柄和一个超自然的信仰。第二，他们极其关注社会的不公不义，关注人民的疾苦，热切的盼望社会在道德上的更新。他们的问题是，面对时代和文化冲击的时候，他们总是通过修改信仰来面对时代。

基要派是保守派，在与自由派的抗衡中，保守派的问题是一种刻舟求剑的道德主义。我偏偏什么都不改。在信仰根基上什么都不改是好的，但基要派最终把这种保守立场变成了：“我什么都不改，会堂就是会堂，会堂必须用长板凳，像你们用这种塑料椅子就是现代派教会。”对古板的保守派来说，抽烟是现代派，看电影是自由派，诗班是自由派，弹吉他是自由派，打官司是自由派。他们的保守主义，从最基要的福音真理，一直蔓延到整个教会文化和生活形态。同时，这种对内的敏锐态度，又与对外的麻木相对应。不关心社会、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文化，被视为一种最属灵的、对世界的反抗姿态。然而，如果一切都不关心，又怎么关心灵魂呢？在1950年代，这种基要派立场，失去了一大批教会的年轻人。因为教会无法教导他们，以福音来面对共产主义，面对热情似火的红色文化。因为基要派根本没有思考过那些席卷而来的时代浪潮。

第一，每个时代都需要重新认识福音，不断把握和定睛于福音的焦点。第二，每个时代都需要认识福音使命在那个时代的处境和迫切性。有些东西永远不能变，因为那是福音的本质，但是面对每一个时代，你的信仰生活的外观和教会文化的形态，必须接受破碎，才不会变成福音的拦阻。

但是保守的基要派不回应时代，不关心社会的公义。你知道20世纪人类社会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20世纪是前所未有的颠覆一切的世纪，是各种激进主义、极权主义反复兴起的世纪。几乎十年一次，便翻天覆地，整个文化、社会、政治和心灵的精神结构，都翻了四五回了。基要派怎么可能当这些变化没有发生？然后以为，持守古旧福音的方式，就是持守某种18世纪或19世纪的教会形态、事工模式和一成不变的神学表述？这是不可能的。举例来说，威斯敏斯特神学家们，没有经历启蒙运动的挑战。但今天的神学表述，和今天的讲道，不能不回应和辩驳启蒙运动的挑战。加尔文也没有面对同性恋文化，所以经典的改革宗神学也从来没有形成过针对性别文化的成熟的神学辩护。就如教会史上的每一个信条，都是针对异端文化的挑战而作出的神学表述。信条为我们提供的是教义立场，而不是在处境中面对文化挑战的现成的教牧答案。

实际上，那些持守基要信仰的人既正确，也不正确。他们所相信的都是正确的，但他们错误的以为，在字面上持守这些教义对一场福音运动来说就是足够的。换言之，他们把必要条件当作了充分条件。因此而逐渐远离了福音在这个时代的战争。面对时代的极大苦难，面对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冲击，他们说自由派的回应都错了，但他们却干脆不回应。

这样，自由派跟基要派之间，就在时代的巨浪面前，形成了非常大的鸿沟。这是理解50年代大批信徒背主叛教的一个信仰背景。这不是对三自阵营和脱教者的辩解，而是对他们的悲剧的理解。一位弟兄问我：这真是很奇怪，杨绍唐成了三自的领袖，他的儿子却成了家庭教会的前辈。王明道是家庭教会的领袖，他的儿子却到现在都不信主。

这也是理解80年代大复兴的一个背景。1949年的中共政权，将中国教会的挣扎和分裂，隔绝在了英美福音派的运动之外30年之久，直到80年代。

经过二战，经过纳粹，经过屠杀数百万人的集中营，现代社会所孕育的各种乌托邦，几乎摧毁了中世纪以来的整个西方文明。我们知道这是错的，这是远离了上帝的结果。教会说，我们早就预言了这样的结局。但你仍然需要有说服力地去证明这些乌托邦都是错的。而且对这些乌托邦的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的反

思，也都是错的，不过是刻着凯撒头像的一枚硬币的两面。

等我们的孩子长大了，遇到共产主义革命或其他的激进主义浪潮，父母都有保守的基要信仰，我们就跟儿女说，不准到外面去参加政治活动，不准读那些书，不准看金光大道，不准加入共青团。这些都很好，很正确。但这样能保住年轻一代的信仰吗？不能。共产党进城后，妓女和腐败似乎一下子没了，整个社会欣欣向荣，这些年轻人的信仰就崩溃了，因为父辈的基要派信仰不能装备他们的心灵和思想，从容的、有尊严和智慧的，去面对这个万花筒一样的现代社会。而中国教会又被隔绝在了福音派运动之外，不能得到属灵资源的帮助和大公教会的团契。

福音派在二战后兴起，第一，他们要坚持基要派的古旧福音，第二，他们要以福音的公义与怜悯回应这个社会，要关注和责备社会的罪恶。但教会关心社会，不是要给出一个现实的社会解决方案，或组织一个政党和公益组织去改变社会。在福音书中，耶稣一边传福音，一边医病赶鬼。一面宣告灵魂得救的消息，一面体恤和进入邻舍的肉身苦难。教会发现，在面对现代社会的苦难时，基要派远离了邻舍的痛苦。同时，西方的基要派没有意识到一件事，就是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基督教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福音运动在现代社会面临一场新的文化战争。虽然罪的本质自古以来都一样，但在不同的文化中会获得不同的表达，形成不同的结构。福音必须对现代意识形态说话，就如当初福音对着罗马文化和希腊哲学说话一样。现代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怎么激起了人的罪并摧毁了福音的文化，现代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怎样重新竖立了巴比伦的金像。基要派几乎放弃了教会在基督里的先知和君王职分，从公共生活中退出，仅仅保留了私人祭司的角色。

举例，中国的教会传统特别注重信主后不能拜偶像，这是十诫的教导。你信了主，家里的观音像一定要砸掉。这是对的。然而，一个强烈要求砸掉观音像的教会，却同时认为入党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更广阔的社会文化里的偶像缺乏敏感，缺乏对话和、辨别和弃绝的能力。基要派的信仰只能应付私人层面和有形的偶像。反正你家里挂了一个八仙过海，是肯定要撕掉的。至于参加政治学习，就顺水推舟了。然而，政治学习比八仙过海厉害多了。

美国福音派的代表人物卡尔亨利，在40年代写了一本《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被称为福音派的宣言，随后出现了福音派的一些重要机构，如富勒神学院和《今日基督教》杂志。最后到七十年代，出现了洛桑运动。这是基要派整体向福音派的一次转变。当年家庭教会的传道人都还在牢里。但海外华人教会参加了洛桑会议。然而，到80年代后，英美福音派又开始在基要信仰上出了问题，许多教会逐渐模糊了对圣经无误的坚持。到90年代后，海外华人教会也逐渐受到影响。但与此同时，在中国却出现了基要派的大复兴。

上帝的奇妙工作，使中国教会从1949年-1979年，然后一直到1989年，都保持了基要派的品格。似乎遗憾的是，它没有经历福音派的洗礼。但在当时，教会毫不关心社会也没有问题，因为社会根本就不允许你关心，你也没有可关心的余地。福音在中国的任务很艰难，也很简单，就是当别人抓你的时候，你坚持信耶稣就是了。所以在过去半个世纪，上帝在东方专制主义和无神论的文化中，大大使用了基要派信仰。对王明道这一代人来讲，我只知道信耶稣，要抓就抓，要杀就杀，我的使命就是至死忠心。就这样，把中国教会的根留下来了。只需这一点，其他的不用讨论，福音与文化的复杂关系，想不通就算了。信仰首先面对的，是干涸的土地和尖锐的冲突。

八九悲歌与福音运动

89.64巨变使80年代的政治开明和思想启蒙被打断了。八九十年代的家庭教会有个说法叫“三多”，基督徒中农村的多、老年人多、文化程度低的多，大家退休之后去信主，似乎教会里都是没文化的老太太，不去跳广场舞，就去了教会。那时大家都是这样看的，城市人、年轻人和有知识的基督徒很少，是孤岛和零散的现象。从总体上，教会没有从农村进入城市，因为城市的人口流动和管制放松，要等到1992年后的“下海”浪潮。教会在中国，没有进入知识分子阶层和中产阶级阶层。因为中产阶级也要到90年代末才出现。总而言之，在1989年之前，教会还没有进入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

直到1989-1992，民主败北、福音进城。中国的受教育阶层和

9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流动的市民阶层，经历了一次最强烈的幻灭感，甚至比文革更令人绝望。因为文革之后是欣欣向荣的。80年代唱的什么歌？“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但64之后，全社会都失去了梦想。

因此，64屠杀带来了中国受教育群体在1949年后、与福音运动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一是大批的流亡者群体，这批知识精英到了海外，而上帝在海外已预备了华人教会几十年，等着这拨人来到。学人查经班从港台到北美，已办了二十多年，一直缺少人来，一直在讲对中国的宣教负担，但中国也不容易进去。中间经过1974年的洛桑运动，1976年产生了“华福（华人福音派）运动”。海外华人教会从1970年代-1980年代，完成了基要派向福音派的转变，正好可以牧养和带领这批当时的家庭教会难以牧养的知识分子。赵天恩牧师也不断在讲“三化”异象，强调福音与文化的关系。唐崇荣牧师也在1989年创立了印尼归正福音教会，开始对全球华人社会布道，致力于以全备的归正福音，打破华人基要派根深蒂固的“圣俗两分”的传统。这一切预备到了1989年后，都祝福了大陆流亡者群体。

几乎每一个流亡者，一下飞机就被接到教会里去。香港的朱耀明牧师，在89年发起“黄雀行动”，帮助了很多流亡者从香港逃亡。他甚至动员了黑社会来帮助流亡者。古惑仔的电影系列有一集，梁家辉说：当年吾尔开希（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就是坐我的船跑的。后来，据说有几个参加过黄雀行动的黑社会大哥，都信主受洗了。有点像北美内战之前的“地下铁路”，一些教会和牧师把南边的一些奴隶偷运到北方去。还有近20年来，一批韩国牧师和教会也建立了类似的“北逃”通道，把朝鲜人救出去，帮助他们借道中国逃亡。好几个韩国牧师就这样在中国被判刑。北美和欧洲也有很多教会来帮助流亡者，给他们传福音。那时几乎所有逃亡者都听过福音，虽然不是都信了主，但六四流亡者中的福音运动，是1949年后福音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一次复兴。

过去20年，对家庭教会有很大影响的海外华人牧师有多少？其中有89背景的？张伯笠，远志明，他们都是逃出去的。洪子健，刘同苏，他们是六四前就出去留学的，还有王峙军，还有熊焱，他在美军中作军牧。通缉名单上的二十几位学生领袖，不完

全了解，大概有12位信主了，而且出了几位牧师。

赵天恩牧师和唐崇荣牧师，还有林慈信牧师，都对这个群体有服侍和影响。尤其是赵牧师，流亡者群体中几乎每个信主的和献身的，都与他的服侍有关系。唐牧师回忆说，90年代初，有一次赵牧师请他飞了大半个地球，专门来和十几位流亡知识分子分享福音。他说自己从没试过为十几个慕道友的聚会，飞了大半个地球。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当他们流亡时，港台教会在那边已等了他们几十年。等他们中间大批人信主，并奉献了一批89背景的大陆传道人 and 牧师出来。接着中国的“新移民浪潮”就来了。这都刚刚好。你想台湾牧师说话都软绵绵的，而中国出去的个个都跟狼一样。没有一批大陆牧师，谁来收割这批苦大仇深的果子呢。所以上帝在1989年后，藉着港台背景的海外教会预备了一批大陆传道人。接下来的20年，这批大陆传道人又被神使用，带来了大陆新移民浪潮中的第二波知识分子福音运动。尤其在2000年之后，这第二波海归的福音运动，又与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和互动非常多。譬如我们这间教会，早年就有不少人是因着远志明和张伯笠的服侍而信主的。

福音进城的第二方面，是对国内的影响。大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流亡，他们同样在89年经历了角色的觉醒。很多年前，流沙河老师讲，他是在64开枪之后才彻底醒悟的。我说我也是。这样我们尽管相差几十岁，其实也算同一代人，因为都是“89一代”。但你醒悟之后，并没有真正的出路。那时传福音的人很少，但慢慢在大城市中有了第一批知识分子归主。目前国内城市教会的一批中坚力量的牧者，最早都是追溯到89后信主。金天明牧师和金明日牧师，两位都是89年考上大学的。一个北大，一个清华。金明日毕业后去考燕京神学院，人家高兴死了。因为1949年后，还从未有过一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去读神学院，他是第一个。

美国长老会的宣教士，韩国裔的车英珪牧师，在1990年来到北京，作为外籍教师，在大学生中传福音、建立教会。他是1989年福音进城后的第一批植堂的宣教士。北京家庭教会有相当一部分都受到车牧师的造就和影响，包括金天明牧师和高真牧师等。他建立的门徒神学院，也是家庭教会历史最久、相对最成熟的一间神学院。成都的彭强牧师也是在1991年，特别苦闷的时期，留着长头发，穿着有洞的牛仔裤，在北京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时信

主的。从这间马克思主义的“神学院”里，出来了不少传道人。

城市教会中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信徒和新一代传道人，基本上都是64后信主的。除了第二代、第三代信徒外，几乎找不到89前信主的。因为在80年代，你必须跟林爷爷、张爷爷或龙爷爷有关，才可能听福音信主。这就是64的转折。

这个扭转，对城市福音运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90年代初的大城市，谁给你传福音呢？基本上都是外教。宣教士进入中国只能找到一个身份，和车牧师一样，在大学里教书。在宣教上我们区分三类国家，一类是宣教士可以自由出入的国家，你来做生意，或他来宣教，都一视同仁对待。第二类国家，宣教士不能以宣教的身份进来，但他可以另一个掩护的身份进来，这要看政府是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旦发现，也可以将你驱逐。第三类国家，是宣教士无论以什么身份都进不来，发现了就要逮捕，或者判刑，或者驱逐。

中国属于第二类情况。90年代的市场化进一步打开了国门，尤其是想加入世贸组织，做了一些迁徙与流动的承诺。所以在1994年，国家宗教局首先通过了一个《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办法》，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参与中国人的宗教活动。但实际上，宣教士在中国，是隐蔽存在的多，赶出去的少。他们都需要被掩护，而第一个掩护身份就是教师。就像当初，马礼逊进入中国的掩护身份是东印度公司的翻译。

因此，2000年后的城市新兴教会，最初基本上都从校园事工而来。除了校园，你还能在什么地方听到福音呢？你不太可能在其他社会领域听到。如北京的锡安教会，守望教会，上海方老师带领的生命之歌教会，厦门杨心斐阿姨带领的巡司顶教会。还有成都的恩福教会、溪水旁和生命之泉教会等，其实最初都源自一个校园事工的查经班。秋雨之福教会也是从成都大学开始的，一位叫林鹿的姊妹，她和我都是这所大学的老师，我们在校门口遇见，她在公车上给我传福音。

五大团队和异端运动

1989-1991是一个重大分期，之前是基要派的大复兴，之后直

到今天，是中国教会从基要派向福音派的转型。1991年王明道回归天家。1992年是邓小平的“南巡”，结束了压抑和绝望的社会气氛。大家都不知道方向，共产党也不知道方向。我是在那年高考的，我读了一些书，很怀念80年代。结果邓小平说：其他的不用说、不用想了，大家挣钱吧！这话石破天惊，就像在葬礼上，终于有人干咳了几声，然后说，谁想打麻将？大家终于知道该干什么了。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思想启蒙，经过89-91两年半的黑暗时刻，快速转向90年代“人人向前钱看”的市场化。上帝在这个时刻把王明道接走了。因为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跑了他当跑的路。下一个时代开始了。

80年代的基要派大复兴。主要力量是本土被圣灵兴起来的游方布道，随着农村体制的松动，复兴的火开始从河南、安徽和温州开始燃烧，“随走随传”是他们拓展福音的方式。直到90年代，形成了所谓农村家庭教会的“五大团队”。有时候，他们宣称自己有上千万的会众。河南的两个，一个叫“方城团队”，小敏姊妹就是这个团队的。一个叫“唐河团队”。唐河和方城都是河南的小地方，但大复兴就从小地方开始。唐河后来改名叫“中华福音团契”。安徽也有两个，一个叫“颍上团队”，一个叫“利辛团队”，颍上和利辛也是小地方，都属于阜阳地区，有时也叫阜阳团队。在1998年的《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上，是阜阳团队的代表签字。最后一个“温州团队”。所以温州一个，安徽两个，河南两个，并称农村家庭教会的五大家。

这五大家的形成，都是自下而上的，但其中有圣灵的工作，在后期的组织化上也和赵天恩等人的帮助分不开。他们和大城市的几个孤岛教会，并没有太多联系。但河南的团队与李天恩的服侍关系密切。基本上，城市教会的持守，和农村教会的复兴，是圣灵在两头作工。

圣灵在哪里工作，撒旦就在哪里工作，这是一个属灵规律。所以河南教会，很快成为家庭教会异端运动的中心。几乎所有本土异端都是从河南教会出来的。这么说不是贬低河南教会。因为亚洲最多异端都从韩国出来，全世界最多异端都从美国出来。哪里福音复兴，异端一定从哪里出来。麦子跟稗子在一起。家庭教会运动经历了神迹奇事，这是上帝特别的工作。但偶像的原则，和道德主义的精髓就是好东西一定会成为最好的东西的敌人。教

会缺乏真理的根基，最后就开始追求神迹奇事，刻舟求剑地面对恩典，最后开始走偏走歪。

八零年代初期，首先是灵恩派开始进入家庭教会。外来的灵恩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可以划三条线。首先是本土灵恩派，集中在河南、安徽，包括1949年前的本土教派的影响，如真耶稣教会和耶稣家庭。因为他们有灵恩的体验，产生了本土的灵恩运动。外来的第一波是美国的灵恩派异端，80年代之后进来，很快跟河南教会连上了。很多教会就说：你们讲的就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个人体验就上升为教义，合在一起了。兴盛的时候，到处都有方言培训班。第二波是韩国的这条线，从北边往下传播的。第三波是台湾的灵恩派，从广州往上传播的。所以广州和深圳的教会一度成了灵恩派的天下。

一般灵恩派我们不算为异端。但灵恩运动与农村家庭教会的结合，最终产生了异端运动，如1989年出现的“灵灵教”。另一个催生异端运动的主要力量，是李常受的召会从海外重新传进来。召会比其他任何海外宗派都更早、更迫切地把握住了时机，他们在1978年就透过香港天文台道的一间教会，成为进入大陆的桥头堡。因此，李常受在大陆的影响力与80年代的农村家庭教会复兴，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倪柝声是被主大大使用的一位传道人。他的神学有剑走偏锋之处，但他和整个聚会所并没有走得太远。但1949年后，李常受脱离了聚会所体制，在海外走得比较远，一度被主流教会质疑为异端。他的影响、灵恩运动和河南教会的自身偏差，几个因素结合，出现了被称为“呼喊派”的运动，这是一种灵恩运动与律法主义的奇怪结合，把一些外在的、偶然的个人感动和经历，高举为重生得救的记号。这也导致了领袖的个人权威被高举和神圣化。

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和严打运动，是新时期对家庭教会的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全国约有70万信徒因“呼喊派”的名义被捕。但据一些家庭教会前辈回忆，被捕者中真正的“呼喊派”不足十分之一。到1992年后，呼喊派再次被中共定为邪教予以镇压，但他们主要还是倚靠倪柝声和李常受的教导，算偏差和极端，不能算异端。但呼喊派被镇压后，从里面出来了几个变型，如哭重生和全范围教会（主要领袖徐永泽、徐永玲兄妹）、三赎基督（又称二两粮、门徒会）、被立王、三班仆人等，最后从其

中产生出“东方闪电”。这些本土异端运动大多都从河南、安徽出来，也大多都从李常受的召会系统里出来，也几乎都从“呼喊派”里蔓延出来。这是八零年代的基要派的大复兴和本土异端运动的兴起。

重新敞开的门

另外一支复兴的力量，来自海外华人教会的大陆宣教。1981年6月18日，荷兰的福音机构，“敞开的门”，组织了一次雄心勃勃的“珍珠计划”。由海上偷运100万本圣经进入潮汕地区。但在汕头海边，船只被军队拦截了。他们把一袋袋油布包的圣经扔进海里。其中一些被胆大的信徒和渔民打捞起来，但大部分被缴获了。

你们有多少人听过香港的良友电台？大半都听过！这是对家庭教会影响很大的海外福音力量。蒋蓉师母读中学时收听过良友电台，她几次想写信，最后也不敢。文革中，为了使“最高指示不过夜”，及时传达到千家万户。生产半导体收音机就成了一项政治任务，全国拼命生产收音机，结果却帮助了福音传播。良友电台在1964年收到第一封来自大陆的听众来信。1966年文革爆发，当年仍收到超过100封大陆来信。接下来的十年，他们每年都能收到大陆听众来信。到了1978年，一年收到2,000多封，再到1989年，当年收到20,000多封。到1998年为止，30多年间，香港良友电台共收到大陆听众来信超过100,000封。

海外华人教会的宣教士，最早进来的可能是1978年从香港进入广州的赵天恩牧师。国内一开放华侨返乡，赵牧师马上就以旅游身份进入大陆。当年就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到1987年，改名叫“中国福音会”。香港在1978年也创立了远东福音电台和福音证主协会等机构，开始对大陆的事工。赵牧师对河南、安徽的五大家有很大影响，甚至对哭重生这一派都做了很多教导工作。这个工作一直做啊做，直到1998年，赵天恩牧师给五大团队的领袖作教会史的培训，一起开会，由赵牧师起草、大家商议签署了一份历史性的文件，就是《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同时还有一份《中国家庭教会政府对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态度》，第一次清楚明白地宣告了福音派的信仰，以及家庭教会

为什么不加入三自、不在宗教局登记的原因。

这个《告白》，几乎就是改革宗的神学立场、政教关系和三化异象的表述。但其实呢，有人说河南和安徽的教会领袖们主要是给赵牧师面子。因为信任他，他起草的就同意签字。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变成了福音派和改革宗。尽管如此，这仍然是跨时代的，家庭教会面对国家和社会的第一份联名的信仰告白，是一次公开的护教行动。并且对改革宗神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家庭教会从基要派向福音派的转型都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其他任何一位宣教士，对家庭教会的委身、理解、关爱和影响力，能够超过赵天恩牧师。

宗教政策的变化

最后一点，是基要派的大复兴与政教关系的互动。1982年是一个重大转折。1979年到1982年，是教会增长最快、而且受到管制最少的几年。因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宗教政策，是当时的政治潮流。新的宗教政策还没有形成。1982年重新立宪，称为“82宪法”。所以1982年前，新政权还没有上轨道，一切似乎还有想象空间。因为不知道政教关系的走向。从1979年到1982年，可以说没有三自与家庭之分，教会都是合法的，没有谁打压你。王明道和倪柝声会不会也被“平反”？似乎都是未知数。这几年的教会复苏，基本没有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三自会刚恢复，吴耀宗死于文革，丁光训成为他的接班人。1980年底，三自会出台了所谓“三定”、“三不”和“十不准”等政策。但并没有得到有强有力的执行。

丁光训在1982年接见外宾时，不得不承认中国基督徒有200万人。后来官方报告的数据是300万基督徒。经过30年的迫害和消灭，基督徒反而从100万增长到300万。这一点不能不令管理者感到沮丧。但政府也不能容许这个趋势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等到“82宪法”出台，其中的第36条写明“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是一个恢复，意味着“战斗的无神论”不再主导政府的宗教管理。但同年，中共又出台了关于宗教工作的“19号文件”，确定了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性政策。直到2017年《新宗教管理条例》出台之前，这个文件都是40年来共产党宗教工作的基本政

策。其中提到“家庭聚会”，说“基督徒按照他们信仰传统的家庭聚会原则上不允许，但不要强制，要通过爱国宗教人员对他们的说服教育，另找妥当的方式解决”。事实上，这个“另找妥当方式解决”的过程就打打闹闹地一直持续到2017年。但《新条例》说现在已找到妥当方式了，就是直接宣布你们为“非法”。

19号文件意味着，“启蒙的无神论”取代了“战斗的无神论”，成为主导性的宗教政策立场。“限制基督教”或“促退基督教”的柔性目标，取代了“消灭基督教”的刚性目标。文件在三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不许”，并确定宗教工作的任务是“逐步削弱宗教影响，缩小宗教阵地”。而《新宗教条例》是对19号文件的某种否认。就如2018年的修宪是对40年邓小平路线的某种否认一样。“基督教中国化”的提出，意味着习政权认为“限制基督教”的目标失败了，必须升级为“改造基督教”的目标。

过去四十年，政府的基本态度是，家庭教会我们不承认，也假装它不存在。我们是不会同意它的，但我们也不努力消灭它。运动来了就打压一批，运动过后就装着没看见。通过三自系统发挥限制、引导和促退的作用。然而40年过去了，越限制越发展，一切促退都变成了促进。300万基督徒，变成了3000万甚至8000千万基督徒。

到1982年，“摘帽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浪潮早已过去了。55万右派中有53万平了反。但中央保留了96位不予改正或不予平反的大右派。基督教界也保留了“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和“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不予平反。对共和国来说，他们仍然是反革命。三自的角色也清楚了，它们被继续保留，作为限制和促退基督教的政治工具。于是，三自与家庭之分就再次形成。“三自爱国会”是一个政治运动的机构，名声很臭。政府又赶紧成立了一个“基督教协会”。从此并称两会。意思是说，爱国会是爱国基督徒的群众组织，而基督教协会是一个教会组织。实际上这是双簧，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但各地方的情况不一。比如成都，到现在都没成立“基督教协会”。只有三自爱国会。2009年我们教会宣布被宣布取缔的时候，有个干部给我出主意，说成都没有基督教协会，你们几个教会可以一起申请成立基督教协会。

于是，三自就开始搞“三定”，定点，定人，定片。宗教活动在指定场所举行，叫定点。神职人员要有统战部批准的传道证，叫定人。宗教活动不能跨地区进行，叫定片。这是一个基本的、也是毒辣的限制教会的政策。譬如青羊区的传道人想去武侯区布道，就要通过三自会报青羊区统战部，青羊区统战部报市统战部，市统战部同意后，再通知武侯区统战部，通过三自会告诉你可以去（但通常都是告诉你不能去）。这是完全把教会当事业单位来管辖了。教会虽然存在，但主权被彻底出卖。

我第一次去到温州，在2010年。温州鹿城区宗教局长带队，最后把我堵在一个教会执事家。他带了一帮警察，对我说：你不能跨地区传道。

还有一个促退基督教的政策，是不许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施洗。我们有好几个年轻人，是从三自出来的，他们从小都在家里信主，但18岁上大学，来到成都才受洗。

这样，家庭教会的立场就非常清楚了，不能加入三自，不能出卖教会主权，不能接受宗教局和统战部的管辖。什么定点、定片，定人，什么不给18岁以下的人传福音、施洗，这些我们统统不认。因为我们只认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只知道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

在1982年后，那些决定不加入三自的家庭教会，有时被称为“地下教会”。直到2000年后，出现了一场家庭教会的公开化运动。“地下教会”的名称才慢慢去掉了。“地下教会”意味着一种江湖状态（容易出现异端），或一种业余状态（容易形成俱乐部）。最近五年信主的基督徒，你们会这么称自己吗，说“我是地下教会的”。不会了，10年前我们还这么说。但今天中国已没有“地下教会”了，家庭教会都是公开的家庭教会，尽管公开化的程度不一。

2004年，我没受洗之前作为法律学者和律师身份去参与一个教案的调查。中途去到湖北，他们叫“华南教会”，是从河南的呼喊派-哭重生-全范围教会这样一路下来的，教会领袖叫龚圣亮，被判了死缓，早年与徐永泽兄妹关系密切，后期受赵天恩牧师夫妇的帮助和归正。我去到长江边上的一个聚会点，半夜起来解手，上三层楼顶，像以色列人的房子，是平顶。上去见一个弟

兄在那里守夜，等候天明。我说：“弟兄，你这么早来祷告”？他说，“不是，是站岗”。他从楼顶就看到江对面，如果有警察来了，就赶紧报告。直到2005年，很多受逼迫的农村教会都还有这个习惯，只要有聚会，一定有站岗的，看河边，看村口，有十几个形色可疑的人，就赶紧报告，赶紧撤。

不是文革期间才这样，从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地下教会仍是这样的。农村黑得早，等大家关灯睡觉了再进村，你不能在六点进村，会被发现。七八点后进村，然后开始聚会，完了黑漆漆的，大家就悄悄走。城里也是这样，聚会完了，我们说：“大家不要一起走，分开走。每两分钟走一个人。”家庭教会就是这样过来的。

即使我们教会，一开始就确立了“家庭教会公开化”的道路。但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个姐妹，她是从小信主，那时十七八岁了，有次她的祷告非常触动我。她说主啊，为什么我们从小就必须把房间关得严严的，把窗帘完全拉起来才能向你祷告呢？为什么我们从小唱歌都必须小声的，把门关死了才能向你敬拜呢？我当时听了心里特别难过。

弟兄姐妹们，你们有一半人都不曾经历过“地下教会”的时代，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在这时代为主来打美好的仗。不要看这一切是我们的福利，而要看我们今日得着王后的位分，是要为福音更加癫狂和付出。不要看我们今日的外在环境为不可放弃的，也绝不在逼迫的压力下，轻易放弃家庭教会用许多眼泪和祷告才换来的公开敬拜上帝的自由。

结束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到78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伟大的事，并不是改革开放，不是社会经济的复兴，而是从那时代以来你的教会的复兴。从文革中的几十万基督徒，文革后的两三百万基督徒，一直到今天的几千万基督徒，这是你在中国所做最奇妙的圣工。你使万事互相效力，都为着这个工作。没有比这更荣耀的工作，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求主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教会已稍微公开化，我们不会受到那么强烈的逼迫，我们拥有稍微好点的环境时，主啊，求你让我们

不是因此而胆怯，而是因此更刚强壮胆，效法你放在我们当中云彩般的见证人，一同来效法我主耶稣。如同基督所说的，那侍奉你的也要走你的道路。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因那忠心侍奉主的，天父必要赞许他。感谢赞美神，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宝贵圣名，阿们！



第六章

民主败北，福音 进城



图：2018年6月4日王怡牧师在书房留影。

民主败北，福音进城

历史到了1989年，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有一些进步，思想有一些开放，很多的人说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是经历了思想启蒙的运动。然后从教会的角度来讲是经历了十年的乡村教会的大复兴，我们称为基要派的复兴，然后民主败北，福音进城。六四之后有了第一波知识分子的流亡潮，他们流亡到了海外之后，经历了北美的福音复兴运动，一大批在89年之后对整个人生和中国社会的前途失去了一切的盼望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寻求信仰。可以说是1949年以后，第一批知识分子在痛苦和绝望当中开始转向基督，虽然这当中不是所有人都转向了基督，但是流亡者群体当中的福音运动和流亡者当中的信主是可以堪称一种现象，甚至就是很多没有信主的，对基督教的一种亲近和寻求也成为了一个海外流亡者群体其中的一个运动。

我举一个例子，我曾遇到以前认识的一些流亡者，像陈奎德先生、胡平先生等好些人，他们当中一些人跟我讲，陈奎德先生跟我讲到香港的“黄雀行动”，朱耀明牧师联络黑社会的老大救了很多六四之后被中国政府通缉的逃亡学生。那天有个人跟我说，当年救天安门学生的其中一个黑社会老大现在已经信主了，还有一批知识分子被送出去后由联合国难民署接收，很多的人就直接到了欧洲，然后被分到欧洲各个国家。陈奎德先生说他们被送到巴黎，到了巴黎之后，他们那一行很多的人一下飞机，放下行李，立刻就去了巴黎圣母院。他们以前从来没去过教堂的，巴黎圣母院当然是个天主教教堂，他们在里面看到有耶稣像的十字架，他们就跪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跪下来，但是他们就是跪下来，然后泪流满面，不过到现在还没有信，但是这个就代表了整个流亡一代民主败北后的虚空和迷茫，从而产生对信仰的渴慕和追求。

在国内的知识分子也一样，1989年到1992年是非常苦闷的，大陆精神思想是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1991年中国家庭教会属灵的伟人王明道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1992年邓小平南巡，整个社会突然活过来了，这个活过来是肉身的活过来，不知道该干什么，现在知道该赚钱了。所以1989年到1992年这之间是比较沉闷的，可是九十年代初到1998年，我们把这差不多的十年称为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十年，是教会重新被社会看见，教会开始

在整体上从乡村教会开始进入城市教会，而城市又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变化。1992年之后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最巨大的变化是城市化进程，随着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几亿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是乡村教会的复兴，那个时候赵天恩牧师评估家庭教会主要在乡村，那时可能已有三千万或四千万的基督徒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一直到今天，可能有一两千万的乡村基督徒进入城市，然后消失在城市之中。消失不是说他们每个人都不信耶稣了，这是整个城市化的浪潮带来的乡村教会复兴之后的社会变迁对乡村教会的冲击。那乡村到了九十年代末两千年初的时候，已经变成什么样了呢？有一个词叫做“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听过这个吗？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年人，所以乡村就已经成了“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所以男人就不见了，年轻人就不见了，一代的留守儿童，我们当中很多的都是留守儿童长大的。

在这样大的社会变化中，家庭教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首先是整个社会城市化的挑战，乡村教会一边经历复兴，一边经历很多挣扎，甚至某些传统地区的复兴跟衰落同时在进行。当你进城了，你就跟整个社会发生更深的接触，而且也因为社会变化太快，因此教会的教导很难去面对这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然后是家庭教会对抗异端的挑战，整个教会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都在抵挡异端。到了1992年之后，又带来另一个变化，就是中国更大的开放国门，因为市场经济，因此海外的宣教士，海外的机构可以进入中国。在八十年代也有进来的，但是很少，是个案，到九十年代之后，就是批量的进来。而且海外的华人教会针对中国大陆的宣教就变成一个战略性的事工了，所以在92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教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92年《海外校园》创刊，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海外校园》对中国大陆教会的影响非常大，海外校园就进入中国大陆服事。1997年《生命季刊》创刊，从那时到如今年二十年的时间《生命季刊》也坚定地持守家庭教会的立场，对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两个北美最重要的华人教会的刊物和机构，也是对大陆家庭教会影响最大的两个机构。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使得香港开始在中国大陆的教会运动

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些在过去十几年都互相见不到的传道人，还不要说是中国其他城市，就是成都的传道人一般平时都见不到，很多时候都是在香港见。大家在成都都碰不到，在成都都不打交道，在成都都互相不打电话，都害怕给你王怡打电话是不是也要受到监控？一般都是过一两年在香港握一次手，回来之后又都没有消息了。我住青羊区，他住锦江区，互相之间都不知道，过一两年又在香港见一次面，所以香港在1997年之后成为中国教会的重要的福音基地。我们开会都在那里开，因为在国内不敢开，培训都在香港做，因为在国内做不了，特会都在香港，因为大陆这边没有，所以香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基地。97年香港一回归，内地会当时已经改名叫海外基督使团OMF，内地会离开中国半个世纪之后又重新进入中国大陆来服事。整个九十年代，从海外来看，海外校园起来了、生命季刊起来了、内地会也重新进来了，还有很多很多的海外福音机构、香港的神学院、台湾的、北美的福音机构都进来。但是香港回归之后跟台湾是有些不一样，台湾教会是公开的支持家庭教会，悄悄的跟三自接触。香港的教会是公开的跟三自教会合作，然后悄悄的跟家庭教会接触。所以，这个叫地缘政治和地缘福音运动，这是海外对华福音运动。

国内的福音运动情况又如何呢？王明道1991年就安息主怀，王明道主要是精神上的先知式的人物影响家庭教会，他出来之后一直都没有再牧会了。所以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家庭教会实际上是广州林献羔牧师牧养的大马站教会。因为他一直在牧会，而且广州又是具备先天的条件，当时是中国最开放的地方。从1978年开始广州就是最开放的地方了，又地处港台、海外接触的前沿，再有因为林献羔牧师是坐过牢的，所以大马站教会就成为九十年代中国城市教会中的一盏明灯，他在1978年或1979年出来建立教会直到1990年，在1989年这个教会已经有九百人聚会了。因为他们家的房子很大，九百人聚会，楼上楼下，每个房间都有装满了人。期间他被抓过一次，被抓的时候教会是三百人，放出来的时候变成九百人了，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被抓，我知道我出来之后人会更多，后来他又被抓了一次，抓了一次放出来之后大概到九十年代末了，大马站教会已经是两千人聚会了。所以这是一个特例，到今天家庭教会也没有超过两千人的堂点。两千人的堂点从2009年的那一拨以来就要打压你，就像北京守望教会、上海万邦教会一样被打压。经过2009年那拨打压之后，到现在也快十年了，又开始出现了一些千人的教会，像北京的锡安教会，我们秋

雨教会也没到千人，我们只有六百人，所以这一波又开始要打压了。但是林献羔的大马站教会在九十年代就两千人，主日有四堂崇拜，所以他是孤岛的一个特例，因为那个时候整体上城市教会还没有兴起，他是城市教会，但是是传统家庭教会的城市教会，所以就成为了一盏明灯。

前面已经讲到了九十年代的自由派跟基要派，八十年代是基要派的复兴。那自由派的情况又如何？自由派在九十年代分为两拨，一拨是三自内部，但是在1978年到1981年这三年是共产党出台《19号文件》、《八二宪法》之前较自由的三年，这三年无所谓三自跟家庭之分，因为要落实宗教政策，整个环境都是很开放的。可是到了1982年之后，三自重新恢复了，家庭跟三自就分开了。但是三自跟家庭其实在那个时候，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没有分得那么开，为什么没有那么开呢？是因为整个八十年代的社会思想解放运动，连三自内都是如此。

丁光训在89年之前一直都是走的开明道路，这个开明不是指的神学上的自由派，是指真的开明，就是他一直希望成为家庭教会跟三自教会的共同的领袖，他希望能够得到整个教会的接纳。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在全国政协会上发了很多很猛烈的言论的，因为那个时代不像现在，那个时代还可以猛，因为那个时代从胡耀邦到赵紫阳都在讲党政分开，所以到1988年的时候，丁光训、赵朴初等宗教界的代表们，赵朴初是代表佛教的，丁光训是代表基督教的，他们都比较敢讲话。

丁光训跟赵朴初在全国政协会上明确提出提案，要求实现政教分离。在整个八十年代三自里面也希望改变，他公开的讲，以前我跟随过左倾的路线，就是恨的路线。现在整个国家都在反思，共产党也在反思对不对，我们绝对不要回到文革，邓小平也是那样讲的，有左的问题，有右的问题，但是主要是左的问题，主要是反左，所以当时的氛围是这样的氛围。连丁光训都在全国基督教协会会议上，专门去请家庭教会的领袖参加，氛围开放到这样。但到八九就发生变化，八九的时候，丁光训也跟其他的人一样，金陵神学院的学生一样是走上街游行的，要求宗教信仰自由，坚决要求政教分离，撤销宗教局，跟社会学校一样的诉求。用共产党的话来讲，丁光训在八九也是犯过错误的，八九之后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当然最根本的是生命里的问题，跟

其他的党员一样，八九之前说的到八九之后全部都变了，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了，要过关了，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基督教热

1994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1994年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94年国务院通过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这个是1994年政府开始初步建立对宗教的法制管理，意思就是说在94年之前是没有法的。在94年之前这是个政治问题，是通过政治运动来管理宗教，来打压基督教。94年在形式上颁布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外国人在中国宗教活动办法》，另一个是《宗教活动场地登记办法》。94年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开放市场经济了，共产党是不是也要开放宗教政策，所以94年出台的这两个办法对管制宗教信仰影响很大。

1994年之后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就是自由派在中国除了在三自里发展以外，也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发展，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是没有宗教思考和寻求的。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走的是西方启蒙思想运动路线，西方的现代思想在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一遍一遍的过，他们追赶一个一个的潮流，今天流行萨特，明天就换成了存在主义，几乎西方现代的各种主义全部过了一遍。到了89的时候，刘晓波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八九六四之后刘晓波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赤露身体走向上帝》，这本书中说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但是在那个时候，上帝这个词出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当中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是一个很新鲜事情。

另外还有刘小枫，他出版的《拯救与逍遥》这本书也是一本代表作。刘晓波和刘小枫他们这两个人是代表八九六四之后进入九十年代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各种绝望里，在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思想之源当中，慢慢的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慢慢开始对基督教有接触，而这种寻求到1994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热潮。94年的时候我读大三，那两年就没什么书读，很郁闷。但是到94年的时候，一个是北大的赵敦华，他是北大哲学系的学者，他在那年出版了《基督教哲学一千五百年》。这本书成为中国知识界了解基督教的一扇小窗，但基督教哲学不是神学，但是对我

们这些人来说是了解基督教思想启蒙的第一本书。然后刘小枫出版了《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在1994年刘小枫还主编了《基督教历代思想》文集，在北京三联书店，还有后来四川人民出版社，陆陆续续的出了两套基督教的译著和书籍。这样从1994年开始出现了中国社会被称之为的“基督教热”。

请注意，这个基督教热跟当时的中国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当时的中国乡村教会更没有丁点儿关系，这是在中国知识界出现的，在中国的整个文化界里出现的“基督教热”。这个“基督教热”热到了二十世纪末的时候，也就是到了1998年和1999年，就出现了一批以刘小枫为代表的被称为“文化基督徒”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精神上看到基督教是精神家园，是最后的精神家园，是可以去寻求的资源，因为以前的都已经破灭了。然后大量的基督教书籍那个时候被介绍过来，我们在九十年代读的基督教的书基本上都是二十世纪基督教自由派的作品。

新派神学及其他宗派的书籍都出的比较少，基本上都是自由派神学，受自由派神学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有人受洗，可是当这些知识分子了解信仰之后，放眼一看，他们觉得中国三自教会肯定不能去，又看不上家庭教会。最后他们发现他们只能维持在精神上相信耶稣，因为根本没有教会可去。当然中国那个时候也不是真的没有教会可去，第一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家庭教会，因为家庭教会要躲，所以要找的话是很难的；第二是教会和社会还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教会害怕打压都躲起来了。所以九十年代出现了两头两种现象，一头是乡村的教会，他们一方面受政府在政治上的打压，在整个社会其实是属于不可接触的人群，是边缘的人群。那时候根本没有人敢在大街上说我是基督徒，全部都是地下教会。然后面对城市化的浪潮，原来的信仰又马上被时之风吹来吹去，整个教会也没有预备好进入社会和跟社会有更多接触，这是一面。另一面，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又开始研究基督教、翻译基督教作品，出现一种所谓的基督教文化热。这些人就包括十年前我自己刚信主或者之后一段时间，我经常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听到这样的一句话说：“我思想上已经入党了。”你知道在中国，中国人以前喜欢讲这样的话，就是精神上我完全是一个基督徒，我绝对是支持你们的，我在精神上已经入党了，只是没有找到组织，或者能够找到的组织也不是我想去的。

所以在九十年代，有一些从国外回来信了主的基督徒，还有一些精神上的基督徒就是文化基督徒，他们甚至专门跑到国外去受了洗回来，他们都发现回来找不到教会，或者就是去看了一下教会之后他们就再也不想去了，他们觉得教会里的那些农村老太太，她们什么都不懂，就是不想跟她们在一起。大概十年前，我认识一个学者，他也是在国外受洗回来的，回来之后我就说你去教会吗？他说他从来不去教会，我问为什么不去教会，他说中国的教会那里能去嘛？他说我在国外的時候都去教会的，但是回国之后，中国的教会就不能去了。不能去既包括了知识分子在知识上的一种傲慢，在知识上瞧不起和农村老太太在一起敬拜的教会，再有就是因为政府迫害教会，自己也怕去了教会可能要被迫害，或者不愿意承担被迫害的风险。不能去有两层意思，第一是你去了之后可能有麻烦；第二你在智慧上还没有放弃希腊的智慧，你瞧不起这些弟兄姊妹的信仰，这就是两个意义上的不能去，整个九十年代知识界就是这样的变化。

家庭教会历史上第一份信仰告白

1989年到1998年这十年中国教会和社会有怎样的一个转折点的分歧呢？1998年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是中国家庭教会经过跟政府十到二十年的这种迫害与被迫害的拉锯战，在1998年教会发布了家庭教会第一份《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传统教会和乡村教会的五大家，这五大家主要是赵天恩牧师在帮助他们。因赵天恩牧师的服事，1998年11月这几个团队一起开会，先由赵天恩牧师给他们上中国教会历史课，然后带他们一起起草签订了并对外发布了两份文件，可以说中国家庭教会才算一种程度的正式的亮相！因为信仰告白在教会历史上都有对内对外的两重意义，对内来讲是清楚信仰的标准，用这个告白作门训和教会的基石，再有对外有护教作用。所以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前面是讲我们信什么：第一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要信什么；第二是让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知道我们信什么。告诉政府和社会我们不是邪教，因为政府用邪教的名义迫害基督教会迫害了十几年了。教会第一次公开的说我不是邪教，但是你自己凭什么说你不是邪教呢？你连个信仰告白都没有，所以他们就写了一个相对详细的信仰告白，从这个信仰告白来讲，信仰是很纯正而且基本上

是改革宗，因为是中福会赵天恩牧师在帮助他们，当然他们对此接纳到什么程度是另外一回事。当时写出来的两份文件，一份是《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另一份是《中国家庭教会政府对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态度》两份文件，前一份是信仰告白，后一份是讲政教关系的。文件里非常清楚的说明我们为什么不加入三自，我们为什么认为政教之间应该分离，所以这个是中国1978年文革结束后家庭教会的第一份护教文件，对内对外都是标志性的文件。

签署这份文件的有四个人，其中三个是：河南唐河团队、河南方城团队、安徽阜阳团队。唐河团队的代表叫张荣亮，这是河南教会最重要的一个领袖。方城团队的代表叫申义平，方城团队就是后来的中华福音团契，这些团队到现在都还在，我们今天为他们祷告的河南的魏金党牧师、现在在北京的张付恒（张恒）、申义平，他们这几个人都是方城很重要的几个带领。阜阳团队的代表是郑先奇，我们教会有很多从阜阳来的弟兄姊妹，这是三大团队的代表。还有一个叫王一平，他代表其他教会。这四个人加起来就发布了这个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这是当代中国教会史上一份很重要的文献。

仅凭这份文件，1998年就是中国家庭教会重要的第一次明确的对凯撒说出我们的信仰，我们被迫害了二十年了，现在我们要第一次明确的跟你说我们是谁。我们是教会、我们信什么、我们的信仰和历代教会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不加入三自，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宗教局的管理，但是我们是爱国的，我们并不反对政府，但是我们要求政教分离，所以这个信仰告白是一个非常勇敢、也是非常特别的代表中国传统家庭教会立场的行动。

三自和家庭教会再次壁垒分明

家庭教会已在1998年正式的亮相，1998年还有另外一件重大的事，三自在1998年也出现了非常大的转折，《丁光训文集》在1998年出版，然后三自掀起来了“神学思想新建设”的运动。丁光训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是一种开放的心态，他在1989年也犯过“错误”，他为了过政审就改变了，承认自己之前错了。九十年代初，他到美国访问，在美国富勒神学院访问时，当时赵天恩

牧师还在，赵君影牧师也在，这两位牧师发起对他的抵制，然后华人神学生也抵制他，那个时候的华人神学生基本上没有去过大陆，主要都是港台背景的华人神学生，学生们就在会议现场抗议他，这个事件给了丁光训很大的刺激，他终于知道自己根本代表不了中国家庭教会。

所以从那之后，他对家庭教会的立场就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家庭教会跟三自的立场在整个九十年代错综复杂的变化当中，最后以《丁光训文集》和《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同时在98年的出现收场，家庭教会和三自再一次的壁垒分明。丁光训从1998年开始认为教会要跟政府搞好关系，抗拒政府对教会的压制，有一条路是他认为比较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在神学上主张自由派神学，他认为如果在神学上走一个自由派的道路，那么就跟社会主义比较相适应。

所以1998年政府也有一个很关键的变化，江泽民明确提出来一个现在三自仍在使用的口号“宗教与社会主义价值相适应”，这个口号其实是来自于1982年中共出台的宗教政策文件《19号文件》。那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他就已经提出来要写上这句话，就是要推动基督教，包括其他宗教与社会主义价值相适应。但是这句话在1982年没有被写进去，因为82年的还是想往开明方向走，只是想限制基督教，还没有想积极改造基督教。因为文革已经过去了，文革之前是消灭基督教，消灭基督教的政策已经失败，然后改成了稍微怀柔的政策限制基督教，到我们现在最近的十到二十年实际上是在改造基督教，“基督教中国化”明确要改造基督教。所以李维汉的这句话没有写进《19号文件》，但是到了1998年江泽民执政的时候，就明确的提出来这个新时期宗教工作的方针，叫做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所以丁光训只不过是在回应江泽民的这个提法，引导与社会主义价值相适应。然后1998年在这个背景下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教会议，在中国社会都有影响，就是从那一年开始镇压法轮功，所以那一年是整个政府跟宗教关系改变都很大的一年。

整个八十年代是基要派的复兴，丁光训是反对基要派的，三自教会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也不是铁板一块，这个基要派的复兴同样也有一部分是在三自里的，所以三自里面也有基要派的力量，丁光训当时对三自里的基要派是一直打压的。

三自内的保守派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杨毓东牧师。1994年三自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后来被称为的“缸瓦市教堂事件”，缸瓦市教堂那个时候的牧师叫做杨毓东，杨毓东牧师在文革之后恢复牧会，在缸瓦市教堂做牧师，带领青年团契。他是基要派的信仰，八九六四的时候，缸瓦市教会的青年团契是唯一一个举着十字架上街游行，并且主动去救助那些被打伤、被打死的学生跟市民的教会的力量。所以八九六四之后，他就被清算，他在里面持守基要派信仰坚持到1994年，当时宗教局跟三自领导直接到缸瓦市教堂宣布将他撤职，之后杨毓东就离开缸瓦市教堂，离开之后就在三自外面影响家庭教会。但是他还是三自中的一个人，他终身也没有彻底跟三自系统划清关系。换言之就像我们中的一些基督徒还保持着党员身份一样的，他在三自中还是有组织关系在的。后来杨毓东对北京的家庭教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包括对金天明跟金明日牧师都有很大的影响。

北京的教会在九十年代是比较典型的，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九十年代大概有三种力量比较典型：一个是代表传统家庭教会的，例如袁相忱，当然还有杨安溪，或者还有其他人；二是海外宣教士，比如车牧师，他是从美国差来的韩国宣教士；三是三自内的保守派或者脱离三自的基要派，如杨毓东牧师。北京的教会一直从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这三股力量一直存在的。传统家庭教会以坐过牢出来的袁相忱牧师为代表，然后是以车牧师为代表的，海外宣教士在北京开始建立教会。九十年代初宣教士开始在中国建立教会是从大学生团契开始的，都是做外教的宣教士从大学生校园团契开始，车牧师最早也是在大学里做老师，然后建立校园团契，影响了金天明牧师，后来建立门徒神学院。

上海的情况跟北京就不一样，上海发展的比较晚，上海只有传统家庭教会，海外宣教士在上海带来的力量是比较弱的，上海也没有三自中的保守派，因为上海是全国三自运动的大本营，三自运动是从上海发展起来的，所以上海的三自力量很强，上海的政治很左，整个思想界包括知识界都不算活跃，所以上海的家庭教会也不活跃。

举一个例子说明，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家庭教会我们可以称之为“聚会型”的教会，那个时候大部分教会都没有主日崇拜，没有我们这种正式的崇拜，就是聚会而已。所以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家庭教会的一个传统就是大聚会，弟兄姐妹天天都盼着两天、三天都在一起的聚会，就像我们刚才过去的那三天营会一样。像温州教会，一年都在外面做生意，每年到了春节回去的时候大家才聚在一起，春节回去从初一到初十五都是聚会，天天都聚。初一开始教会有三天的祷告会，从初四开始教会有三天培灵会，从初七开始，教会有三天的讲道，这个是家庭教会的传统，特别注重擘饼的聚会，有些传统是我们现在其实慢慢消失的。家庭教会凡是有大聚会，同工们都会提前几天禁食祷告，这是有大聚会之前禁食祷告的传统。然后擘饼聚会，就是我们每个月的圣餐，家庭教会的传统在擘饼聚会之前要为这个擘饼聚会备好多个聚会，比如说我们下个主日是圣餐要擘饼，所以星期六大家就要一起有祷告会，预备主日擘饼，星期五晚上又有聚会，认罪祷告会，然后把罪认完了主日好领饼。传统家庭教会的擘饼聚会时间很长，一般擘饼要擘两三个小时，因为在擘饼聚会的时候大家要流泪祷告，彼此认罪。

上海的教会也不是一点没有宣教士的影响，只是宣教士的影响并不大。也没有三自中出来的自由派，所以上海家庭教会是非常保守的、规模小、封闭，然而很奇怪的是这个城市是中国最有国际视野的城市，但是它是最保守的。直到五六年前，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去上海，我们介绍他去上海的一个教会聚会，而且上海那个教会是我知道的，我跟他们的带领人也认识，就这样他都不能直接去。按照教会的规定，先在小组中考察一个月，然后才能悄悄的被带到主日聚会的地方，而且信息都是通过纸条传递，不能打电话。所以上海的家庭教会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才开始建立主日崇拜，2000年之前上海的传统家庭教会都是前面这种聚会型的教会，没有主日崇拜，讲道也很少，最主要的是见证，我们传统家庭教会出来的都知道，最重要的就是讲见证，分享很多的见证。

丁光训为了适应宗教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适应，他对应提出一个非常重要官方神学，叫“因爱称义”，淡化“因信称义”。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998年初就是批评基要派教会过于传讲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批评基要派教会过于传讲末日信息和末世信息，最后开始批评传讲因信称义。

他书里面这么说的：“有一位同工给我写信，然后跟我提到

一个问题，他百思不得其解，我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位同工说像雷锋同志这么优秀的人却不能得救，我们教会却要说他不信耶稣就要在地狱当中，我们这些人却在天国里面，我的良心不能够接受这件事。”然后丁光训就说，我的良心也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于是他就讲说我们不可能向中国社会传讲一个雷锋在地狱当中的福音，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必须要改变的，称义是因为一个人里面有爱，就像雷锋一样。所以他是吸收20世纪自由派神学、进程神学、过程神学、还有其他的各种神学观点。

丁光训认为基督不就是那一位永世存在的神嘛，不单是道成肉身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的基督，基督还是弥漫在宇宙和万物之中的基督。这位宇宙性的基督难道不也在印度吗？不也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吗？这一位基督，既然从自古以来就存在于宇宙当中，那么老子和孔子所认识的天不就是基督吗？印度教里面所讲的，他们不知道是谁的那一位神其实就是基督嘛。所以希腊哲学里、印度教里、中国儒家，其实都是信耶稣的，他们甚至信到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信的是耶稣！他们以为他们信的是释迦牟尼，或者他们以为他们信的是天，或者他们以为他们信的是别的什么。我们现在要告诉他们，其实他们信的是耶稣，他们是那些在不同的文化当中的隐藏的基督徒，既然在所有的文化当中都有隐藏的基督，所以在所有的文化当中也都有隐藏的基督徒，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是那一位隐藏的基督，隐藏的基督徒呢？那你就不能用他有没有信耶稣来做判断，而是要用他有没有爱，是不是个好人，他的道德怎么样，就是要用这个来判断，所以他认出雷锋就是隐藏的基督徒。

1998年出版的《丁光训文集》体现了他的这种神学观点，这本书出版之后就导致了三自跟家庭教会完全没什么关系了，因为家庭教会本来就看他这一套是异端，根本不理他。也导致了三自里的保守派和三自里的自由派的一次决裂。这次决裂除了1994年的缸瓦市事件，杨毓东牧师成了一个代表人物。那么98年《丁光训文集》出版之后，金陵神学院事件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了。当时有三个学生公开写了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拒绝在神学院唱社会歌曲》，这里所说的社会歌曲就是我们说的红歌，之后这三个学生就被丁光训开除了。然后第二年1999年，又有三个学生大胆的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为什么反对在神学院举行七一庆祝党的生日的活动，或者是升国旗的活动，或者是唱红歌的活

动，之后这三个学生也被开除了。这几个被开除的学生基本上都进入家庭教会服侍了，其中有一位就是今天北京家庭教会的代表崔彼得牧师。再过一年，2000年时候，就是老师的抗争，抗争者中最重要的一位是金陵神学院的教务主任季泰，他做过丁光训的助手，后来被金陵神学院开除，季泰曾发表了一篇很详细的批判三自的一篇长文，因为他是从三自里出来的，对三自很了解。所以季泰跟早年的杨毓东到九十年代末就成为三自里面保守派的代表人物，1998年之后他们都跟三自分道扬镳了。

1998年之前的三自里还有一些神忠心的仆人，他们在里面持守保守派的信仰，当时他们都觉得三自还可以改变，抱着希望三自不要变成完全的凯撒崇拜。但是1998年之后还留在三自里的那就需要悔改了，那就是把神的儿女带入到属灵的淫乱之中，经过了1998年的新神学建设你都还不出来，那你就大大的得罪了神。就算你在1998那个时候不出来，那2014年拆十字架你都还不出来，那你算什么？算什么？等到2018年这个宗教条例出来你都还不出来，然后还说你是留在三自中作忠心爱主的仆人，你骗谁啊？神是轻慢不得的！你骗谁啊？所以在98年之前不排除三自里还有一些忠人的仆人，但是只要你向主忠心，从1998年之后到现在这二十年间只要你向主忠心，你每年都有许多出来的机会！你每年都有许多被开除的机会！你每年都有许多受逼迫的机会！但是每一次都灵巧如蛇，最后你就变成蛇了！

1998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小敏《迦南诗选》的出版，代表着家庭教会的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小敏的《迦南诗选》第一版在98年出版，所以这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转折，我们刚才讲我们编的《郇城歌集》，我们也选了大概二三十首的小敏的歌，我们再唱两句，有哪些小敏的歌你们唱过？《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祈祷带来复兴和平，带来合一得胜。”有一年我在山东见到小敏，我说山东五点钟天就好亮了，你有没有考虑到四川的情况呢，我们这里其实要晚两个时区的，我们那里早晨五点钟天还是黑的，所以她后来说很抱歉，没有考虑到中国那么大。那么再来一首我们唱过的《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走过行过火热过灰心过，走过最低最低的山谷，爬过最高最高的山坡，年复一年有过失落，困苦颠连有过收获，岁月的大浪在耳边冲过，悲喜的眼泪无数次流过，看那终于有一道天上的生命河，流向中国，医治

中国，得着中国。看那终于有一道天上的生命河，流向中国，医治中国，得着中国。”

祷告：

我们感谢主在中国教会中赐下的恩典，所带领的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求主继续托起带领中国教会，我们在主的面前立志说，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你，求你自己来引领我们，让我们那悲喜的眼泪无数次的流过，但是我们知道羔羊你已经得胜，我们同声一起在主的面前开口来祷告，献上自己为祭。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孩子在你面前实在是看到那叙述你在我们当中的恩典的时候，就如同那以色列人来叙述你怎样带领他们经过红海，走过干地。主啊，你这样带领他们在旷野当中，你在中国教会的几十年中，主啊，你就是那位使乌鸦叼饼来养活你自己的仆人的主。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主啊，教会不断地跟社会接触，我们也看到主你在新时代对教会的引领。主，孩子感谢赞美你，就求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再一次的来引领我们，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孩子在你面前说，求你来悦纳，求你自己来接近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新兴的城市教会中，主你实在是来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图：北京守望教会于1993年开始聚会，最初只有10个人。

第七章

山上之城

初露微光



前情提要

第一章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新教来华200年的背景；第二章是20世纪的1949年之前的五十年，这五十年当中自由派与基要派的形成；第三章是五十年代的三自运动所带来的对教会的冲击，和教会开始形成自由派和基要派的两条道路，形成三自和家庭两条道路；第四章是文革期间六十年代。第五章是在讲文革结束到1989年的一个点；第六章是1989到1998年的一个点。

世纪之初的宗教打压运动

第七章是1998年-2010年。1998年已是世纪末，因此可以说是21世纪的前十年。

1998年，家庭教会的信仰告白出来了，三自官方丁光训的新神学出来了，三自的新神学其实已经是异端的神学，家庭教会与三自已经泾渭分明了。政府在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几年有一轮规模较大的针对家庭教会的打压运动，当然不止是对家庭教会，对法轮功的打击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有点像唐武宗灭佛运动，是政府对所有宗教的一次打击运动。除了法轮功以外，基督教是被打击的重心。没怎么看见打击道教，其实中国自古以来邪教最多的就是道教，但是那个不是他打击的重点，焦点是法轮功和基督教。所以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中邪教罪特别多，以前都是非法制的状态，但是那几年邪教罪变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罪，对法轮功是这样，对基督教也是这样。

早在1997年到1998年就有第一轮针对浙江的拆十字架和拆教堂运动，并不是2014年才开始拆，2014年是第二波了，1997到1998是第一波，那一波拆毁教堂运动其实比2014年更厉害。当然那一轮的焦点不是拆十字架，不是把所有教堂的十字架都弄下来，就是直接拆掉一批教堂。因为据说（不能百分百证实）朱镕基去了一趟温州，一路上都见到教堂，他就非常生气，教堂比便利店还多，党委哪里去了？所以就拆毁了一批教堂。

华南教案与家庭教会公开化异象

从1997年拆浙江的教堂一直到2002年，这是又一波新的运动式的对教会的打压。2014到现在又是运动式的一波对基督教的打压。这轮打压较大的教案是华南教案，这个教案是八十年代之后最大的教案，我个人信主和蒙上帝呼召牧会的异象和带领是跟这个案件有关的。因为这个教案的三位教会带领在2001年和2002年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二三十位同工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超过一百人被判处劳教。

华南教会是从河南教会呼喊派徐永泽这一支出来，影响到湖北在湖北建立，进入河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遍布全国九个省，当时号称有一千万信众。我在2003年到2004年作为慕道友参与了当时这个教案教会内的调查，当时这个案子已经被判了。我到华南教会系统本部和河南、湖北、广东、重庆等地，大概有五六个省，总共去过有六七次，跟很多的弟兄姐妹和同工见面，然后调查了解。我很明显地看到了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对我信主和蒙召牧会的影响很大，而这些也跟整个2000年后这十几年的教会的历史，时代共同的议题是有关系的。

那我到底看到了什么呢？第一，我看到他们的教导里面的确有一些偏差。当然我那时还没有信主，这也激励我不断地去学习。其实他们并不是异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用我刚才说的，1998年赵天恩牧师为河南团队，安徽团队起草的《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来做基本教导。赵天恩牧师和赵师母都曾经在这个团队中有过许多的教导和努力，甚至整个华南团队也是以“三化异象”来作为整个教会的异象。在对他们的定罪里面，这是一种政治化的定罪，在定罪里有两个罪名是很可笑，也很可悲的。一个罪名是政治性的罪名，反革命罪。因为他们说要推动教会国度化和文化基督化，这个是直接写在判决书上的罪名。还有一个是推动教会国度化，这是他们的纲领，还有相应的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有一次他们点兵召集弟兄姐妹上山练兵，就是在山上举行几天退修会，你知道整个《圣经》都是军事化的用语，所以这个听上去煞有其事，政府就很害怕，感觉你们是要谋反的架势。

在教会的带领同工群体中，我们通过几年的调查，也确实发现，但我们不敢做百分之百的判定，带领同工群体也的确也有犯罪。这个犯罪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淫乱的罪，还有一个是有使

用武力。

武力是怎么回事呢？跟另一个家庭教会的状况有关。当教会号称遍布几省，有一千万的会众，但却是非法的，处于地下状态。地下状态会导致什么呢？秘密地下状态会强化领袖的权威，还是会弱化领袖的权威？是强化，会强化纪律跟服从。因为有危险，所以教会的一切事务都是不公开的，那个时候没有家庭教会的弟兄会说教会的财务怎么不给我们公开？公开还得了，公开就被抓了。那个时候能够站出来，被神呼召出来服事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如果你是教会的财务，你是教会的传道，政府要抓你，风险是很大的，所以没办法公开财务，很多东西都不公开。秘密状态下，教会的神学培训、跟主内的连接、跟海外教会的连接，跟整个大公教会的传承基本是脱节的。所以慢慢地就独成一派了，独成一派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各种偏差，因为他没有机会被纠正。其实一开始是没有多大的错误，如果教会没有被一个公开的大公教会不断校正监督，不断有在“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的大公教会里的互动和学习，只是自己建立一套封闭的地下秘密系统，最后一定会导致教会领袖的犯罪，教会内部一定会出问题。我当时看见这些之后就非常坚定的相信，中国的家庭教会如果不走公开化的道路，那以后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案子。

武力又是怎么回事？很简单，如果你是基督徒，但你的家人不是基督徒，然后你们在村里聚会，你的家人基于恐惧就会向政府告密，警察就会来把弟兄姐妹抓走，你的家人直接卖了你，这个冲突很大，你怎么办？教会的办法就是让弟兄姐妹写保证书，保证我的家人不能出卖教会。如果出卖了又怎么办？后来教会就成立了一个纠察队，如果你的家人把教会出卖了，导致弟兄姊妹被抓捕了，纠察队就会上门警告、劝说，一般这种两方对垒到最后其实会发生冲突，这是因为政府的逼迫带来的。

纠察队还有一个作用，是用来对付东方闪电的。东方闪电很活跃，到处拉人，东方闪电有很多使用武力的行为。我们教会前些年也发现过几个东方闪电，他们到教会来拉人，他们会编一些理由，比如他会骗弟兄姐妹说他是信耶稣的，他想跟家人传福音，但是他讲不清楚，邀请你去他家和他一起向家人传福音果效会更好。然后就把你骗到荒郊野外，就是成都的郊区，到他们家后发现已经坐了一大屋子人，他就介绍说这是我二舅、这是我三

爸、那是我大姑、那是我表姐，正好今天没事，家里人都来了，坐了一大帮人来对付你一个，然后开始洗脑下迷药，再进行属灵的恐吓，各种各样的手段都有。

九十年代的时候有次河南教会的教会传道人聚会，这个会议是培养训练教会传道人的会议，而且这些传道人都是他们教会里的主要同工，就像我们会长执团队在一起聚会一样。长执团队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遇到了东方闪电的冲击，一半的人都跟着东方闪电走了。你就可以想象教会的真理根基是何等的薄弱，异端居然能把一半的同工都带走了。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很防备东方闪电，因为东方闪电有的时候是要动手的，为了自卫，纠察队在不得已的时候是要跟东方闪电动棍棒的，因为东方闪电来了，教会也不敢报警，一旦报警警察就把你们全都抓了，说你们都是反革命。这样教会就变成了一个地下社会，就像中国古代的那种秘密会社。一个秘密会社跟另外一个秘密会社打起来了，又不敢让政府介入，政府要发现了全抓，所以到最后教会就慢慢地脱离了基督的教导，教会为了自保和生存，就慢慢地吸纳大公教会以外的资源，吸纳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国传统秘密会社资源。

当时的教会内部也确实存在腐败、败坏、罪恶和教导上有偏差，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些问题都没有到达到法律上的犯罪的地步。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华南教案就是个大冤案。整个案子当中的刑讯逼供超乎你们的想象，有两个姐妹在看守所中就被打死了，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酷刑，我们听了很多的这样的见证，所以我当时的心被极大的触动。我就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我还没决定要信你，我还没受洗，你就让我了解这些，你是不是不想让我信啊？哪有这样的啊？人家一般信主的时候，进入教会都觉得教会多好啊，一般都是在教会里过几年才会发现教会有问题。我现在才慕道，你就让我看见这些，你是什么意思啊？”那时我在神面前很挣扎，但是在信主过程中神就给我一个清楚地看见，在我2005年信主的时候，我就看见教会公开化的异象。教会必须公开化，教会必须脱离秘密会社的状态，教会的财务、圣职、教导、认信、纪律，教会的一切都必须公开，都要成为山上之城，成为光明之子。所以神在这个过程中带领我个人的领受和对整个教会的看见是这样的。因此秋雨教会从成立开始我就是按着神对我的带领，坚决要走公开化的道路。

城市新兴教会兴起

华南教会案是2014年开始的新一波打压基督教运动之前，最后一波规模很大的运动式的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在那之后，从2003年到2014年的这十年间，政府和家庭教会处在一种拉锯的状态当中，就是政府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逼迫依然是存在的，但都是个案，不再是大面积的运动式的打压，个案式的打压，各地力度都不一样，有的地方相对宽松，有的地方就很凶狠。这十年就呈现出均匀的个案，有些个案也很凶，但是整体的波及全国的运动式的对家庭教会的逼迫在那十年中是停止了。

这样也进入到这十年中最重要的主题。这十年当中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从教会的角度来看，二十世纪末的时候，乡村教会的衰落已经非常明显了，因为城市化的进程已经是时代化浪潮不可抗拒。所以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是城市新兴教会兴起的十年，是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的主体在1949年之后，经历了前面几十年的复兴之后，再一次地从乡村转向城市，这个转向现在还在继续，但是可以说这个转向已基本完成了。

因为连传统的安徽团队，河南团队都已经在进城，这种进城也跟逼迫和城市化有关，逼迫和城市化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小乱避乡，大乱避城”，小动乱赶紧出城到乡下去住，大乱来了赶紧到城里住，因为乡下不安全。河南教会的几个老前辈，之前我们为他们祷告过的魏金党老师，还有张恒老师，他们都跟我讲过，教会的进城基本上是由政府的逼迫推动的，政府开始从村里抓人，就被迫赶到县城去建教会；然后在县里抓，就被迫赶到市里去建教会；在市还被抓，最后就在郑州建教会了。教会的城市化基本上就是这样一路赶过来的。社会的城市化过程是这样，教会的城市化也是这个过程，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河南教会的这批领袖们其实都在大城市牧会了，安徽教会也是一样的。城市教会的建立分为两种情况：第一是传统家庭教会团队型教会，因为逼迫和整个社会城市化的进程而进入城市；第二，就是城市本身的新兴教会的兴起。这两个加起来就完成了原本主要集中在农村的家庭教会城市化转型的十年。中国家庭教会的重心，这个重心不是以人数的比例来界定的，因为要说人数的比例肯定大部分人还是在乡村的，因为乡村

大，整个教会的重心开始从乡村转移为城市，这是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时代。

从神学上和教会发展上来定义，这十年是福音派教会兴起的十年。八十年代是基要派的复兴，这十年是基要派向福音派转型的十年。在中国教会当中出现了福音派教会，由传统的基要派教会转变成为福音派教会，而城市的新兴教会基本上在新兴的过程中就已经是福音派教会了。1949年到2003年是福音派教会在中国中断的几十年。而“福音派”跟“基要派”这两个词在1949年之前基本上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因为那个时候最主要是对应自由派，在当时面对自由派，我们有的时候是叫福音派，有的时候叫基要派，其实都是一回事。但是1949年之后，福音派是产生于基要派内部的一个运动，英美社会从四十年代以来，对二次大战人类的悲剧和罪恶以及教会在这个悲剧中的角色的反思，带出来对传统基要派立场的反思。基要派坚持圣经无误，坚持古旧福音是对的，但是基要派没有关心社会，没有与这个时代同步，没有去怜悯这个社会，几乎处于一种脱离社会的状态。自由派则是成为时代潮流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时代潮流的制造者和领头羊，基要派就躲在一边，圣俗两分，而把整个世界拱手相让。可是当你拱手相让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是坚持不了。二战是一个非常大的对人类世俗社会和教会都是反思的起点，这个反思在中国教会没有发生，1949年就断掉了。在共产党统治的无神论极权下，那个时候对于共产党政权来说，什么基要派和福音派根本就没什么差别，都是一口要把你干掉，你们之间争论谁关不关心社会一点意义都没有，反正关不关心都绝对不准你关心，也没有关心的任何空间，所以基要派和福音派也不需要被区分。

到了八十年代后，1992年改革开放，经过十年后到2000年，2000年左右除了市场经济的开放，有另一个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的全球性的变化，就是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的兴起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国内城市化的进程和来自全球性的互联网的兴起共同推动了城市的福音热。在那之前，如果你没有跟一个传统家庭教会的人刚好认识的话，你根本没有渠道听到福音，因为在生活中你根本就找不到，基督教只存在于传说之中。九十年代我读大学的时候，在九眼桥的书摊上看见一本传说中的《圣经》，一直到了2003年，我才见到一个传说中的基督徒。但是到了2003年之后，互联网的出现就打破了这个堡垒，你不需要在生活当中认

识一个基督徒，你就可以从网上看到很多关于福音的信息，可以在网上听到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可以看到电子版的福音小册子。

标志性的四件事

整个中国教会在2000年到2010年就是福音化的转变，教会不但要持守基要的信仰，也重新反思信仰跟文化的关系，教会跟社会的关系，以及基督徒对社会的负担。这个过程中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

一、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

第一是在2003年有一本书和一部片子的出来，对中国家庭教会和整个海外教会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那就是远志明拍摄的那一套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你们有多少人看过，有多少人没有看过？这部片子让中国家庭教会从地下秘密状态曝光出来，被全世界知道和看见。

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我约了十几个知识分子朋友到我家来看《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看完了几集之后，因为前面讲的十九世纪的历史我们都了解，我们读过书知道基督教是怎么来到中国的。但是看1949年以后的那两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我们都惊呼，“啊，教会还存在啊，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迫害、清洗，居然还有教会？”我们竟然完全不知道，居然还有这样一群人。我们以为知识分子里面有个顾准林昭，那时候也不知道林昭是基督徒，就觉得这些人就是最牛的了，中国人唯一的几个值得尊敬的灵魂。而这帮人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一群人，他们那种信仰所带来的价值文化等，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的，给我们的冲击非常大。这个片子最后讲到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已经有六千万人，然后我们大家一听都不信，感觉是乱讲，六千万是什么概念？共产党员才七千万，共产党员多到在我们生活中随便扔个砖头都要砸到一个的地步，你说有六千万基督徒，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呢？然后我们一起看纪录片的一个朋友突然对大家说：“我就是基督徒”。我们这些朋友就盯着他非常好奇的问，“你是？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他说：“你们也从来没有问过啊。”很多人都是悄悄地做门徒，这部纪录片的问世才让中国家庭教会进入一定范围内的社会视野，而被人们所知道。

还有一本与这部纪录片同时问世的书叫《耶稣在北京》，作者是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记者戴维艾克曼，他在中国待了很多年，对中国的家庭教会比较了解。这套书是在英文世界出版的，是英文世界中第一本影响巨大的描写中国家庭教会的书。这时人们才知道耶稣原来还在北京，原本以为耶稣早就“回国”了，回美国的回美国，回英国的回英国，回加拿大的回加拿大了。当然那些海外的宣教士是知道的中国家庭教会的，这本书让整个西方世界了解了中国基督教的存在，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存在和家庭教会的运动，而那套纪录片在中文世界里面是让国内的人和海外华人了解了中国家庭教会和基督徒的存在。

我的信主经历跟2003年的这波福音运动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不然我生活中连一个基督徒都不认识。2003年的这波福音运动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当家庭教会和中国地下基督徒浮出水面以后，被社会知道后就带出来新突破。

二、三个家庭教会基督徒跟美国总统布什见面

第二个标志性事件是2006年我信主不到一年，我跟余杰和李柏光三个家庭教会中的知识分子在美国参加会议，然后在白宫跟当时的布什总统会面。这个是当时中国家庭教会第一次在国际媒体上公开亮相，也是首次公开以家庭教会基督徒身份跟外国国家领袖接触，这个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一直到现在我都在被骂。

因为布什上台之后一直就想关心中国的家庭教会，一直想支持宗教信仰自由，他来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希望见到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使馆联络了一些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想在使馆跟他们见面，这一帮人还没有进北京就全部被抓起来遣回原地。所以布什什么都没见到，约好了一起吃早餐的人，结果全都不见了，失踪了！然后他想去一个家庭教会的教堂参加主日敬拜，来表达他对中国家庭教会的关心，政府死活不同意，政府把他拉到缸瓦市三自教堂去了。

然后我们去美国参加一个关于中国宗教信仰自由与法律的会议的时候，美国的一些牧师和团体就努力做工作，希望我们跟布什总统见一面，然后才有了这个见面。在这个见面之前，在我们进入白宫的那天上午，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几个官员跟我们谈话说：“今天早上我们收到中国外交部的强烈抗议，要求我

们取消今天的见面，并且说这个会面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外交部说不知道这几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不能代表中国教会，我们中国有官方教会，是合法的教会。如果你们想和中国的基督徒见面，我们可以提供官方代表。你们千万不能和他们见面，如果你们跟他们见面了，他们将来回国后可能会有麻烦的。”你懂的，这是双重威胁，对美国和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威胁，所以那天安全委员会的人就问我们：“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尊重你们的决定，如果你们觉得对你们来说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可以取消今天上午的会面。”我们三个一起商量后决定还是要见，江泽民能见，我们也能见，各有各的外交活动，江泽民代表地上的国有外交，上帝的国也有外交。我们只是见个面而已，管他以后发生什么，先见了再说，这是见面之前发生的事。

当我们回来之后，这件事在中国知识界和教会界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这个事件，我开始被中国的知识界抛弃，很多人开始骂我，包括在我们教会里聚会的几个成都的朋友是公开地写信要与王怡之流决裂。为什么中国的知识界攻击我们呢？知识界认为我们应该去争取中国自由的，为中国民主说话的，结果你们去搞宗教了，你们背叛了中国民主事业。那教会为什么也要批评我们呢？因为教会指责我们见的是外国国家领袖，就觉得我们不应该见政治人物，他们觉得见政治人物就是去搞政治，但吊诡的是基督徒见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这些政治人物，却又被视为是很荣耀主的事情！我们就因以家庭教会基督徒的身份见了个布什总统，回来后就两头挨骂，骂得很惨。

当时我经历两边的唾弃虽然很痛苦，但是神通过这些经历带领我生命有很大的成长。神给了我两个很大的安慰，一是唐崇荣牧师公开地支持我们的见面；二是有人拿着这个报道去找了林献羔问他的意见，林献羔说，我觉得这事情很好。老前辈认同了，唐崇荣牧师在国外，林献羔在国内，他们两个说了这番话之后，我们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至少没有被中国家庭教会彻底弃绝。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几个标志性的事件都指着教会开始向福音派转变。

三、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浮出水面的家庭教会

第三个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大地震把家庭教会整个从地下全部震到地面上来了。上海有些教会联祷会聚在一起

开会，本来是要讨论另外的事，忽然看到四川大地震的消息，然后大家赶紧收拾行李就变成一起去四川救灾了。那一年全国的教会都来四川了，甚至全世界的教会都到四川来了。

四川教会的复兴是在两次历史事件上，第一次是抗战，日本人把大半个中国占领了之后，教会也像当时中国的行政机关一样整体往西部迁移，教会来四川，教会大学也全都集中到了四川。第二次就是大地震，全国的教会都来了。这是上帝给四川很大的恩典和祝福。

民政部有一个统计，称2008年为中国志愿者元年。所谓的志愿者元年，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官方的志愿者运动，就是2008年的奥运会。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官方宣称有上百万的志愿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志愿者，只听说过志愿军，那一年北京有上百万人次的志愿者，志愿者是不拿钱的，但其实那是官方组织的。在2008年真正的志愿者运动就是汶川地震，全国有许多非官方组织的，甚至也不是单位组织的，超过一百万人志愿来到四川，参与当年的赈灾。而在这一百万的人次中，民政部有个内部的统计，基督徒占了其中六十万，基督徒在全国人口中占了多少比例？百分之二还是百分之三？但是在2008年大地震的志愿者中占了60%，因为家庭教会（当然也有三自参与）开始社会参与，开始做怜悯事工，教会前所未有的参与了整个社会最焦点的事件，这使得中国家庭教会在2008年地震中开始浮出水面，前所未有的被全社会看见。2006年的事件只是极个别少数人知道，但是2008年的时候，就是一个全国性的事件，被全社会看见。

四、守望登记事件

第四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在2008年之前的守望教会登记事件。1994年第一次出台一个宗教场所登记办法，十年之后2004年国务院出台《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出来之后，大家就在想：这下是不是要放开了，是不是可以允许家庭教会存在了？守望先做了一次尝试，守望在寻求合法化走在全国教会的最前面。在这之前守望已经完成了堂会的建造，已经有了治会章程，有长老的选举，这一切都走在中国教会的最前面的。然后他们想要再做一件事情，就是独立地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他们到了民政部门，民政部门说你们来登记之前需要主管部门的同

意。在中国什么行业都有主管部门，教会的主管部门是宗教局，守望找到宗教局，宗教局说我怎么证明你是牧师和教会呢？你们需要行业协会的确认，所以就又回到了三自。行业协会在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就是三自爱国委员会，所以你得去三自，让三自来确认你是教会，你是牧师，只有宗教局同意你登记，你拿到了宗教局同意登记的文件给民政部门，民政部门才给登记。这样绕来绕去，其实没有任何的办法，家庭教会不可能在不加入三自的情况下有任何合法登记的存在空间。

所以通过守望教会登记事件，全国的家庭教会看见了这个新条例是没用的，如果要持守家庭教会的立场不加入三自，就绝不可能在不损害信仰实质的前提下完成登记。守望登记事件的时间是在2005年到2006年之间，跟我们见布什差不多的一个时期。因为在跟布什的会见之后，我发表了一篇关于家庭教会登记的六个意见，其中就很明确地提出了几个意见，独立的登记，是社团的登记，而不是场所的登记等等，这个是标志性事件。

几个打压城市家庭教会的标志性事件

到2009年又一个标志性事件，2009年是政府决定要对城市家庭教会动手了，不允许城市家庭教会出现。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十年神学上叫做福音派的出现，或者基要派向福音派的转变，从教会的形态上讲是教会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那么另一个，这十年的主题就是教会的建制，从聚会性的教会开始变成地方堂会，开始有了信仰宣告、自立章程、选立长老、建立圣职，然后对内、对外公开。

我们教会在2005年成立团契的时候，就建立了公开的网站，把我的姓名、电话、地址就全部公布在网上了，我们可能是全国第一间这样做的教会（团契）。所以很多人当时到成都来，在网上查，除了三自就是我们，然后就到我们这儿来了，所以我们这里人数增长比较快。因为在网上查不到其他教会。只有我们这里在网上敢把带领人姓名、电话、地址全都写出来。当时很多教会都对我表示很惊讶，对我说，你们敢这样做啊？

2008年的退修会我们遇到第一次宗教局对我们的冲击，我们就开始申请行政复议，然后提起行政诉讼，我们可能是中国家庭

教会史上第一例民（教会）告官。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建造教会、用法律途径处理政教关系、主动公开化，在福音派教会转型的当中，守望教会跟秋雨教会是这个过程中两间最标志性的教会。

2009年政府决定选择三家教会，北京的守望、成都的秋雨、上海的万邦，进行打压，宣布取缔，要求解散教会。北京守望教会当时大概有八百人聚会。上海万邦教会当时大概有一千五百人聚会，三场崇拜，我去参观过他们教会，跟我在海外看到的教会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是全套。我们教会那时候只有一百人，但是政府说因为王怡见过布什，还是有典型性。

这三个典型的教会接在下来的十年的道路就不一样，上海的万邦被拆散了，分成了许多的小教会。北京的守望从2009年开始户外崇拜，中间有段时间有停顿，之后又继续，一直到现在守望教会仍然在为中国家庭教会承担受苦。

其他家庭教会有相对宽松一点的空间，其实是由别的教会撑出来的。你不要指着那些受苦的教会说，你们别那么激进嘛，像我们这样多好！你以为你有比受苦的教会多一些的自由，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吗？不是的，在今天中国的城市中，只有一百人聚会的教会我们觉得挺安全的，没有人来打压我们，那是因为有八百人的教会还没有被打压。如果两百人的教会彻底打灭了，那一百人的教会就很危险。一百人的教会彻底要打灭了，五十人的也很危险，自由的空间是这样撑出来的。

整个中国的家庭教会都应感谢守望的，他们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和苦难。他们的牧师到现在已经被关在家里七年了，没有行动的自由。我觉得在中国每一间的家庭教会，每一位的基督徒都应该在主里纪念他们，都应该为他们切切地祷告。我以前写过一篇牧函，题目叫《金天明是你什么人？》。我说金天明牧师是我的牧师，金天明牧师应该也是你们的牧师，他七年了没有讲过一次道，都是写好了放在网上给大家看。他被关在家里七年了，不能够出席教会的公共敬拜，他是这个时代上帝所使用的仆人，为他的教会受苦的人，所以求主来纪念他。

在这几个教会当中，唯有我们教会经过了十年到现在还没有被消灭。很多人很奇怪为什么你们还活的好好的？为什么你们还人越来越多？现在慢慢地，我们也快要到当年守望的这个规模

了，然后512（2018年的512）给我们来了这么大一个打压，可是又撤了。我们也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但是神的意思总是好的。守望教会受逼迫之后，我到北京去看天明牧师，天明牧师对我说：“以后就要看你们了。”我说：“好吧。”所以2009年对这三个教会的打压，以及之后守望教会持续的户外崇拜，就成为了一个标志性事件。

最后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10年的洛桑事件，洛桑事件是标志着城市福音派教会的形成和福音派教会运动。七十年代全世界的福音派教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叫做洛桑会议的世界联盟，因为第一次会议是在洛桑举办的，后来这个洛桑会议不管在哪里开都叫洛桑会议，洛桑会议带来一个强烈的福音派立场，就是我们既要持守古旧的福音，又要强调教会对社会参与和关怀，这就带出来全球性的福音派立场。

第一次全球洛桑会议是1974年，那时中国还没有开放，家庭教会的人还在坐牢；第二次也很有意思，跟前面讲到的家庭教会的转折点有关，会议在1989年7月召开，前夜才发生六四天安门屠杀，中国国门又被关了，第二届洛桑会议中国教会仍然无一人出席。中国教会在全球的福音派教会的大家庭当中始终是缺席的。但是那一年的会议很令人感动，在马尼拉召开第二届全球福音派洛桑会议，在整个会场中留了一大片空椅子，一百多个位置空无一人，写着中国教会。中国教会是全球福音派教会的一部分，虽然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出席。1989年的洛桑会议，整个大会就迫切的为中国教会祷告。

2010年是第三届全球福音派洛桑会议，在开普敦举行。这次的洛桑会议因前面2008年的事件使家庭教会浮出水面，在那之前各个教会和教会领袖之间都是没有什么连接的，连接的都是原来的团队。只有不同地区的团队内部之间的连接，不同的团队之间全国性的连接是没有的。但是因为2008年的大地震，全国的福音派教会领袖们实际上就有了一个比较松散的连接网，就是大概知道那个城市有那些人，只要在这个圈子里问一圈其他人的电话号码大概都能要到，那时候的联结程度也就只是到这个地步而已。所以到2010年洛桑会议的时候，就由一些福音派的领袖组成了一些小组在全国传统家庭教会和城市新兴教会里确定了两百位多位代表，两百位多位代表代表机构、代表传统乡村教会、代表新兴

城市教会。如果没有2008年大地震和接下来的这两年，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两百个人，因为大家互相之间连电话号码都找不到。而且当时教会做出了一个举动说中国家庭教会参加开普敦洛桑会议的全部费用由中国家庭教会自己承担。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么多人了，我们不是一个弱小的教会，而且中国家庭教会承诺负责为周边几个国家的教会筹集参会费用。然后这两百多个人，这个时候政府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可以说是49年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阻拦本国公民出境的行动。这两百多个人全部被守在国内，一个都没出去，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

成都地区准备去参加会议的四个，有的被警察堵在家里，有的在机场被警察拦截，有的想通过其他渠道出境，最后一个都没有出去。我当时到成都双流机场准备出境的时候，我看到周围有十几二十个人拿着摄像头一路跟着我们，就知道政府肯定要采取行动。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跟师母说：“我有一个决定，如果待会儿他们按照法律程序向我出示文件，我就老老实实地顺服他们跟他们走。如果他们粗暴的不出示任何文件，就是不依法的话，我决定非暴力不服从，绝不服从，但是我也不反抗”。然后我们进了机场大厅，到了海关检票，这时整个大厅就没有人了，政府把人清空了，来了四五十个警察、武警在旁边等着，然后他们就过来架着我们走。我说：“你们是谁，请你们出示证件，我到底犯了什么罪？”然而根本没有人理我，我就眼睛一闭，就开始非暴力不合作，意思是不再使任何一点力气，不跟着他走，我就变成一堆烂泥了。他们就开始拖我，我又比较重，他们四五个人抬着我，到了电梯上他们就拖着走，拖了我几百米，然后直接把我扔到车上去，我的脚上被拖了几道血痕出来。

厦门巡司顶教会的杨希伯传道讲过他的经历，特别有意思。他们家就是巡司顶教会那个大院子，大院子里已经被警察全部堵死了，根本连家门都出不去。但是他家有个后门是跟邻居家连在一起的，他半夜三点敲邻居家的门，从邻居家翻墙出去，连夜赶往上海。厦门这边发现人不见了，于是派人立刻赶到上海，在上海机场把他堵住然后带回厦门。他们还问他“你怎么出去的？你家不是被我们堵死了吗？”他说“这个不能说，说不定还有下次。”

所以2010年的洛桑会议跟89年一样，有海外中国教会的人

参加，但是从国内出去的一个人都没有。同样在开普敦的会场上也为中国教会留下了两百个座位，那些座位一直空在那个地方。然后大会就为这些空位置祷告。我们现在唱的《主爱在中国》，就是为这次大会写的。我当时到北京去跟金明日牧师和李广平弟兄，我们一起呆了两天就讨论这首歌，最后由我执笔，李广平修改，找海外的董弟兄谱曲，我们共同完成了这首《主爱在中国》。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大会就对着这两百多个空椅子放了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在《赞美敬拜》诗歌本第867首。

2010年洛桑会议事件代表着二十一世纪头一个十年的结束。

刚才我讲道的时候说到和我一起受洗的八位弟兄姊妹，其中有几位姐妹已经远离教会了，我讲完道之后，有位姐妹到前面找我说她今天来了，她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回到教会了。

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永恒的主，你给我们永恒的盼望，若不在你里面，一切都是短暂的，甚至连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跟随，我们的侍奉，其实都是短暂的。因为这一切若不是出于你而是出于自己的话，谁能够持守呢？谁能够保守呢？谁能够坚持到底呢？谁能够靠自己相信自己至终得救呢？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使今天的中国教会看到在这一路上主你的恩典，主啊，你的脂油滴满了我们脚下的道路。求你的爱在中国，求你的爱浇灌我们，使我们继续地向前，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全地的教会的大家庭当中，我们要与万国的你的儿女一同敬拜你，也一同参与直到地极的福音的使命，和在你面前的直到永远的敬拜，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第八章

在复兴中逼迫 在逼迫中复兴



图：秋雨圣约归正学堂第一届运动会。

前情提要

前一讲讲到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是城市教会的兴起，中国教会的中心重新从乡村转往城市。在城市教会中出现了走出家庭的独立堂会，这是这十年的一个特点。

主日学教育运动

从2010年到现在2018年的这8年中，有同样的两件事情一直在继续，我称之为是福音运动的衰落和兴起。在乡村教会中，在许多传统的乡村教会地区，随着城市化进程、随着世俗化浪潮、随着社会物质丰富、随着社会大环境变化，乡村教会实际在持续的衰落。整个传统的家庭教会地区普遍地出现了这种衰落的状况。

因此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短短的12年的时间，有另一个运动，在福音运动的衰落和兴起中被兴起，就是基督教教育的运动。2006年中国家庭教会出现了第一间教会学校，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在八十年代的时期，温州教会面对压力建立了主日学，就是儿童主日学。这个在当时是很大的基督教教育的得胜，在2017年9月到2018年的新一轮逼迫浪潮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禁止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入教会参加崇拜，不允许父母带他们的孩子去教会，在很多的方是这样做的。

在八十年代，温州教会顶住压力，建立起了儿童主日学。但是在河南教会、安徽教会和其他更多的地区的传统家庭教会中并没有同样的，或者说成熟有力地建立起儿童主日学事工。温州之所以能建立起儿童主日学，一方面是因为教会的基础比较好，因为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它的城乡在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很突出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虽然一开始温州货名声不是很好，但温州经济的发展使得它几乎实现了整个温州地区城乡的一体化，它的城镇化程度很高，城市教会和乡村教会就打成一片了。因此到了九十年代时期，甚至到了两千年以后，温州就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传道人。这些传道人又有大批的后代，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去温州就看到很多传道人已经将很多后代送到国外读神学。所以在国外读了神学院回来的，或者是

在国内读神学，当然国内读神学的更多，这一批温州年轻传道人就变得越来越多。他们从小也在主日学里长大，相对于其他乡村教会复兴的地区，温州教会在这点上做的比较好。虽然温州教会整体上有一些衰落的迹象，但总体来说温州教会没有失去他们的下一代。如今有一些从温州教会出来的二三十来岁的传道人，温州教会在这四十年复兴运动中，他们可以说是完成交棒了，温州教会的第二代被建立起来了。

这就是主日学教育运动。

基督教教育的兴起

一直到后来温州遍地的神学教育，到处是神学院，神学班，有些是短期的，有些后来关闭了。大约2012年温州一个神学院邀请我去讲课，当地政府不允许我去讲课，就把那个神学院关了。有很多的神学院兴起又倒闭，倒闭又兴起。但是温州仍然还是全国神学院最多的地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兴起。

河南教会，安徽教会基本上是失去了下一代，这并不是说完全失去。说温州教会没有失去也不是说他们一点儿都没有失去。这是指总体上的趋势。因为一个成熟的主日学系统没有建立起来，就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的浪潮来袭时再得着自己的后代了。

到了2006年的时候，很多教会开始慢慢地看到主日学不够用。一个星期在主日学学习两个小时，但是公立学校要学五天，这个是不行的，后代还是在不断地失去。所以在2006年，出现了第一间家庭教会的教会学校，第一间教会学校应该最早出现在哈尔滨。

我们有一个中国基督教教育联盟，这个联盟中现在有100多间学校。我们秋雨归正学堂我忘了是多少号，哈尔滨这家是001，是中国的第一间。2006年开始到2010年之间新办的教会学校很少，当然也有一些ACE教育起来了，在2010年之后开始出现就逐渐多起来了，直到今天规模也很小，但这就是正在开始的一个基督教教育运动。温州这两年也开始了这个看见，就是要把主日学变成日日学，温州也开始了从主日学到日日学基督教学校运动。

改革宗长老会运动

另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专题就是过去的十年之中，中国家庭教会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就是改革宗长老会的运动。改革宗长老会在过去的这十年中是非常突出的一个运动，从神学来讲的话，就是归正的信仰在中国教会的传播。当然在10年之前，2000年之后都有传播。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在2010年之前的归正运动在中国，或者是在全地，在整个华人教会里基本上是一个神学思想运动。主要是爱唐崇荣牧师的影响和服事，还有另外的一批海外改革宗牧者或者一些教师，他们带来改革宗思想的运动，改革宗神学教育和神学传播的运动。

这个运动只是在中国大陆，因为在台湾、在香港、在北美，改革宗运动都停留于改革宗神学的传播运动阶段，并没有因此发展成为教会运动。在整个大陆以外的华人地区，没有一个改革宗的教会运动。但是在2010年，当然十年也是一个简单的标志，大概最近的十年，改革宗在中国从神学运动发展成为教会运动，是这十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这十年中城市新兴教会的转型和建造，教会的中心开始转向城市中所出现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虽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是改革宗教会，但是改革宗神学的影响在过去十年中甚至开始慢慢超过灵恩运动的影响。可以这么说，灵恩运动在八十年代从河南教会开始一直到九十年代，或者到两千年初期，灵恩运动对中国家庭教会的影响很大，直到现在，这个影响也不小。但是在2000年之后，直到最近的这十年，我看到上帝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使得改革宗教会和改革宗神学传播阻击了灵恩运动在中国的蔓延，而使得灵恩运动并没有成为席卷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的运动，而且使得很多曾经受灵恩运动影响的教会在过去十年中，开始受到改革宗神学的影响。这是过去这十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城市堂会的兴起

另一个变化是城市堂会的兴起，堂会的兴起就是联络搭配

得合适，信的人都在一处。家庭教会开始离开家庭，房子大的能够坐七八十个人，房子小的坐二三十个人，家里的客厅不可能装两百人。当然我们冉云飞老师的家里已经装100人了，100人就是极限了。所以城市教会就离开家庭，开始租用写字楼或者购买会堂。这个是过去十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前面讲到2008年的地震，2009年对城市新兴教会的打压，以及2010年的洛桑会议事件。这三件事基本上是一个转折。2009年打压的这几个教会：“北京守望、上海的万邦、成都秋雨，另外还有乡村传统教会山西临汾的金灯台教会。”这几个事件中，金灯台教会受打压是比较厉害的，教会牧长被判刑了，万邦教会被分散了。守望教会的金天明牧师2011年4月份就被软禁在家里，一直到今天，快到七年四个月了。基本上守望教会和金天明牧师被软禁就代表着过去八年的历史，2010年到2018年这八年的历史。

从2000年到2010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上的变化，就是家庭教会在整体上从基要派教会向福音派教会转型。在福音派教会中有一个现象，就是从2010年之后，改革宗长老会运动在福音派教会中的转型，改革宗长老会运动在福音派教会中越来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这前面的十年，北京守望教会和金天明牧师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压迫，受到逼迫，七年多时间被软禁在家里，除了他还有教会其他几位牧师长老也被软禁在家里，有几位这几年已经慢慢松动可以出来了。虽然政府把他软禁在家里七年半，但却没能够打垮一间教会。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是极大的得胜，政府想干掉谁却谁也没能干掉。

2008年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社会的转型，2008年的零八宪章，代表了过去二十年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力量的一次聚集，签署了一个零八宪章，向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提出来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未来中国的构想。之后刘晓波作为零八宪章的带头人就被捕，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代表着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扭转。这个扭转很简单，就是重新专制化。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到习近平上台又是一个转折。习近平上台之前在我们成都上演了这十年来中国当代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王立军闯美领馆，这个事件撕开了中国的寡头制。中国在二十世纪末已经基本形成了常委治国的寡头制，虽然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他们都是比较弱的，但他们还不是

一个独裁者。基本上每个常委都是寡头，都是富可抵亿的家族。七大常委，九大常委都是大股东，没有哪一个股东能够干掉其中另一个股东，因此它变成了一个寡头制。

可是从王立军闯美领馆开始，我们就看到一个新变化。薄熙来想上位，然后被干掉，薄熙来被干掉之后，习近平就开始大清洗，习近平基本上结束了常委治国的寡头制，他重新把所有党政军的权力归于他一人，直到2018年修宪，完成了宪法的修订。中国的国家主席在英文中的译名就是总统，其实以前是叫主席的chairman，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改成总统了的。在中国的宪法里，国家主席是虚位元首，是象征性人物，没有实权，行政首脑是总理。习近平上台后，实际上国家主席已经变成实位元首了，国家主席成了超级总统，一切权力集于一身的超级总统。从一系列事件看国家的重新集权化。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1年金天明牧师被软禁在家里，接下来的这些年里清理大老虎，建立整个集权的体制，国家重新集权化。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里，清洗了中国前二十年改革开放所聚集起来的羽翼，初生的民间社会和一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直到前两年的709人权律师大抓捕。所以至此来讲中国除了教会以外，已经没有任何独立的民间组织了、已经没有任何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了、已经没有任何稍微独立的可以自由发声的媒体了。南方报系被彻底打压，民间NGO被彻底打压，人权律师群体被彻底打压，像许志永的新公民运动，这一批自由知识分子被彻底打压，每一个代表群体的人物和组织在这十年中基本上都被消灭干净，只剩教会。这是这十年的变化。

在经济上改革开放早就已经停止，从2000年以来的国进民退，整个市场实际上是被国家资本所垄断。当然你可以赚钱，但你不可能赚得太多，因为你不是赵家人，如果你想挣得更多你必须成为赵家人。因为整个国家实际上到现在，从经济上来讲是类似于洋务运动，因为洋务运动的特征是官督商办。所以基本上从2000年以后整个改革开放是走的回头路，是建立官督商办的国家资本主义。

我之前提过，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企业家，他跟我讲，他说在中国他持守一个原则，挣钱不超过五千万，做官不能超过处级。为什么呢？他说他公司差不多到五千万这个级别了，如果他再想

挣钱，想做更大的项目，就必须要跟某个官员靠近了，就必须要跟这个体制同流合污了。也就是说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结果就是如果你想在荷花池（西南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当个老板，在淘宝开个店，挣上一两千万，基本上是有这个空间的。如果你不跟共产党打交道，不与这个体制同流合污，不成为赵家人也就只有几千万的空间，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能干，只要你有机会，市场是可以给出这个空间来的。但是在中国这个市场里，如果你不是赵家人，你不要梦想几十亿的生意，你不要梦想几百亿的生意，至于几千亿，你听都没有听过，那都是九大常委瓜分的，那都是所有的太子党瓜分的，那都是要投靠一个主子才能够达到的，这是中国经济的状况。所以在政治上来讲是高度的重新集权化。

在这个过程中，来看教会，教会一个方面衰落，一个方面开始成长。这十年来，尤其是这最近的五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也有，但现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就是逃离中国的运动。就像大家所讲的，人大里面开会的都是外国人，当官的子女都在国外。现在不只是当官的，民间的有钱的，开始感到不安全的都去了国外，甚至连知识分子也都开始去国外了。整个社会的精英外流，在整个社会中发生的逃离中国的运动，越来越多的人对这里悲观失望、对国家悲观失望、对社会的前途悲观失望，当然顺带对自己的前途也悲观失望。这个反而一方面给福音预备了人心，所以这八年来人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上帝预备，自改革开放以来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前一波的福音运动已经进入尾声。上一代家庭教会前辈们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们在那个教会跟社会完全隔绝的时代，他们不可能关心社会，因为也不允许他们关心，再有他们也没有那个力量去关心，那时的神学是基要派，他们认为不要关心社会，只要多传一点福音一切就好了。那么进入到现代的时候，面对社会的潮流，他们发现如果再不关心，他的后代都要流失了，因为这个世界对他们的影响大过福音对他们的影响。

三化异象是什么？是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这个跟福音中国化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不能用福音去面对认识当前的社会，不能用福音去抵御世上的潮流，那个基要派的信仰在这个变化莫

测的现代后现代社会里是没有办法面对的。当然你刚强你可以持守，可是你没有办法在教会的会众，甚至在教会的年轻一代中仍然让他们持守整全的和坚固的信仰。

所以改革宗神学的发展以及植堂布道的运动，2010年面对的打压是中国城市教会从被动植堂走向主动植堂的植堂运动的开始。2010年6月我跟大约17位中国家庭教会牧师传道人一起去提摩太凯勒牧师带领的美国纽约救赎主教会为期一个月的学习。我们一起去的是守望教会的金天明牧师、安徽阜阳团队的领袖陈牧师、河南方城中福团队的领袖张牧师、传统家庭教会厦门巡司顶教会的传道，还有其他一些牧师传道人，我们在那里学习城市教会的植堂。北京的高真牧师说他们一直都在植堂，政府每一次打压他们，他们就植一个堂。他们人数一超过五十人，马上植一个堂。警察上一次门，马上植一个新堂。因为福音教会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只要一打压，只要人数多到四五十人，马上就会分一个小组，分一个家庭再开放。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有三十多个堂点，每个堂点都是二三十人到四五十人，这个叫做被动植堂，因为逼迫我们就分散了。还有外在的环境不允许有更大的规模，更大的规模冲突就会很大。很多教会是这样的模式在运作。

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一线二线城市中，这个模式基本被突破，教会一般会主动植堂，完整的建立教会，按立、选立长老、按立牧师、建立会友制、建立公共敬拜、建立地方堂会门训，建立了这些之后，教会开始主动植堂。可以这样说，在今天中国城市中，在单一的堂点聚会，就要突破场地的限制，就要突破政策的限制，就要突破教会跟社会关系的限制，不然就只能分散在不同的会堂。在同一个堂点，从两三百人到接近千人的教会（我评估不一定很准确），在全国来讲我想可能一百间左右，也许会再多，再多也不会超过两百间。

新三自运动

2017年9月以来以及到2018年2月以来的这场新宗教条例的执行运动，看起来是全国性，到处都有逼迫的风声。每一周都会听到一个消息，哪个地方的教会聚会被冲击了、哪一个地方警察又上门了、哪一个地方门口贴的春联都撕了、哪一个地方甚至政府

工作人员都进到人家家里，把十字架取下来换上习近平的像、哪一个教堂又插国旗了、哪一个地方又怎么样了，每周都会听到这种消息。这是一个全国普遍性的运动，这个是逼迫运动的社会背景就是前面所说的整个中国社会重新集权化的倾向。

这一轮针对教会的逼迫运动是从2014年开始的，2014年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拆十字架。2014年4月28日温州的三江教堂被炸毁，这被称为温州教难。实际上是这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么大规模的运动式的对教会的打压。接下来从2014年到2015年，整个浙江地区有一千七百万间教堂被拆掉十字架，然后河南也陆陆续续的有教堂被拆十字架。

拆十字架的运动是新宗教条例出台之前的一个测试。在浙江下令拆十字架的夏宝龙是谁的人？夏宝龙是习近平的人，所以他敢乱来，他在浙江做了两年的测试，很多人在这期间不断地发出消息说：“中央要改变政策了，拆十字架不是中央的意思，习近平是要给大家宗教信仰自由的，大好消息，中国要开放宗教信仰自由了”。前些年你们是否也经常看到这些利好消息，一般都是从那几个人传出来的，我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

实际上最近这几年，从2010年到2018年，特别是最近5年，习近平上台后的集权制度对于教会来说就是一个新三自运动。拆十字架运动是这个新三自运动的前奏，原因之一是因为浙江是中国教会最兴盛的地区，原因之二是因为浙江省的夏宝龙正好是习近平在浙江做省委书记时的马仔，所以就正好拿这个地方开刀，来做测试，然后新三自运动随着新宗教条例的出来就全面推行。

在这个过程中它也有它的统战工作。因为五十年代的三自运动，那个时候教会一共才80到100万基督徒，现在可能是7000到8000万，所以要先拉一批再打一批，共产党做所有的运动都是这样做的，拉一批打一批吓一批再关一批。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

所以在拆十字架运动一年之后的那年2015年，的确出现了一个所谓利好的现象，就是中共方面开始通过北京的几间家庭教会主动跟整个中国家庭教会接触。为什么能过几间北京家庭教会就能跟整个中国家庭教会接触呢？前面几章已经讲过了，是这样的：“2008年支持四川的抗震救灾，使得教会浮出水面，使得大部分的中国教会领袖开始有了一些连接。2010年为了去参加洛桑

会议，在中国教会领袖中，有几百个家庭教会领袖之间互相有了联络，中国家庭教会领袖群体已经逐渐成形。”经过打压之后，政府如果想要来统战家庭教会，他还是只有找这个系统。实际上政府对任何群体的控制他都要找头的。八九年在天安门广场时，最可怕的情形是什么？最可怕就是政府要直接面对100万人。一个一个地说服他，说服了这拨，那拨不同意；说服了那拨，这拨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成本是很高的，根本没办法谈判。所以如果学生中有领袖，高自联组织起来了，我就跟高自联的十个人谈。所以政府要统战的时候，他们也是需要找领袖的，如果找不到领袖，他到哪儿去找中国家庭教会谈呢？

国安会找到北京的几个家庭教会，真的伸出一根橄榄枝。中共在2015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会，由习近平任国安会的主任（或小组长）。然后由国安会出面，邀请中国家庭教会大概二十位代表，在钓鱼台宴请他们谈话。当时在成都地区邀请了我与彭强牧师。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说这个是北方教会比较关心的事，我们南方教会的牧师一般不太关心这事，我们路途遥远，出川不便，我们就不参加了。所以后面有17位代表参加了钓鱼台国宾馆跟国安会的见面。

在这次国安会见面中出面的是在国安会负责宗教的头子，他是中共的早期领导人被称为东北王的高岗的儿子，高岗的儿子跟习近平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他出面来宴请这些家庭教会的领袖，他说：“浙江的事是地方上的事，中央不是这么想的，你们要耐心地等待，我爸的案子到现在都还没有平反呢！”所以这十几位牧师就很兴奋，出来后就给家庭教会传播了很多的“利好”的消息。而且高岗的儿子说：“我们现在不是搞一带一路吗？你们不是也要回归耶路撒冷吗，那么正好教会向西宣教也可以帮助中华民族的复兴。”所以有些牧师出来就大讲一带一路。

但是过了一年之后，大家基本上就认清局面了，这帮牧师就知道家庭教会的牧师最好不要去搞政治，你明白吗？有人说我们搞政治，我们连钓鱼台都不去。这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是主的教会，跟政府没关系。跟政府搞得太拢，最后都是被人家骗的。你一定要知道我们这帮人不过就是信耶稣的人，我们的政治智慧在别人面前等于零，不要高看自己。共产党是搞什么起家的？你知道的。你别跟他们玩，你信耶稣就好了。你该传道就传道，该植

堂就植堂，该坐牢就坐牢。你别想着去国宾馆！

随着逼迫的加重，中国家庭教会看得很清楚了，而且国家的局势也看清楚了。到宗教条例出台，一看，以前说好的那个什么呢？完全不一样了吗？到2018年2月开始更严厉的打压，但是在那个方面，目前来看我们也不知道。

2017年教会出现分堂的冲突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是很着急，因为我们不知道冲击我们教会的时刻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要在2017年六四之前完成整个教会的分立和新教会的建造，不然的话我们担心当那个冲击来到的时候，整个教会就会一击而溃。但是上帝实在是怜悯我们，上帝在去年让我们完成整个教会的分立和重建，然后到2017年年底才开始出台宗教条例，今年2018年才执行。今年2018年的512到64冲击，你们所看见的不是我们这群人的信心有多么刚强和我们的祷告是怎样可以摇动上帝的手，而我们自己看到的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看到的是神奇妙的保守了祂自己的教会。如果这个换到去年2017年来，我们就死定了，是吗？如果提前一年多来做这件事，秋雨之福教会就全跨了，前面十年上帝的预备就跨掉了。所以你看见神的作为了吗？

今年的512和64冲击之后，我们回忆去年2017年9月宗教条例出台后我跟同工们的分享，同工们也都很支持，我的看法很简单，公开地反对宗教事务条例，吸引火力到我们教会来。只要它要全面执行，就必须把这间教会干掉，就必须把这间教会摧毁掉，否则他干不了。我们必须把自己摆在这个位置，同工们也支持我们这么做。

今年（2018年）上半年我们就说，如果今年512到64为国家祷告月，这个关过不了的话，那咱们就进去（坐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如果过了这个关，下半年我们就要做得更多，我们就要放胆，就要走到街上去布道。结果我们经过512到64到现在，没事！上帝奇妙的恩待。所有人都以为完了，蒋蓉师母的分享说她想到王明道在监狱里唱的歌：“一切全完了。但是没有完，上帝又坚立了我们。我跟同工分享说如果到年底都还没事，明年咱们就来做更多。咱们明年就胆子再大一点，咱们到天府广场去布道，咱们到川大校园中直接去布道，咱们再去被抓十次，因为时间不多了。”

上帝还会留给我们新一波的福音运动的时间吗？会有新一波的福音运动吗？八千万基督徒是中国教会的天花板吗？这是一个上限吗？中国教会去年以来到现在实际上人数已经在下跌了吗？很有可能中国家庭教会人数已经少了五百万，已经每年几百万的速度在减少，而不是在增加，而我们对此还没有反应过来。新一波的福音运动求主来带领！

所以目前来看，我自己的评估，我觉得这次的打压其实还没有到2009年的规模。因为2009年就是试点，打压几个，其他都没事。而今年是全国教会都在受打压。但是过去十年中国教会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城市堂会的兴起，就是教会中心转向一二线大城市，就是一二线大城市形成几百人到千人的堂会。这大城市中的几百人到一千人的会堂只要没有在整体上被冲击，这个运动就是雷声大雨点小，这轮逼迫就进行不下去。

在北京500人以上的堂点约有10间左右，在上海会少一点，在其他的一些城市会多一点。在成都现在两百人以上的堂会应该是七八间，五百人以上的除了我们之外应该还有一两间，但是有一间我知道已经在宗教局登记了。

这些教会就是目前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核心力量。

如果这一百间四五百人以上的堂会（单一堂点），这一百间之中有30间到70间都被打掉，那这场运动就得胜了。福音运动会衰落一个时期。但是如果经过这个阶段，这一百间教会只有一两间、两三间、四五间受到真正的实质性的打击，或摧毁、或解散，而绝大部分教会仍然在聚会，而且仍然是这么大的一个教会，那么这场运动就注定失败！

对秋雨圣约教会的呼召

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让我们一起再来持守。秋雨圣约能不能持守到今年年底？秋雨圣约能不能持守到明年还在？北京的守望、北京的锡安、北京的几间大教会、武汉的几间大教会、上海的几间大教会，或者厦门的，广州的几间大教会到今年年底，明年初是否还在？只要在，我就挑战你们，现在不全职的侍奉什么时候全职？现在不献身什么时候献身？所以我在上帝的面前祷

告：“要么我求主来一场大的逼迫，要么我求主在你们当中和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中，求圣灵带来一场献身的运动，全职侍奉的运动”。

如果今年年底，就像我上次跟一位弟兄说的，他说他不想来参加婚姻更新礼。我就说明年这时候如果我还没被抓，你就必须来参加。他说你这个是逼迫我。我说你不想来你就祷告让我明年不在这儿，他说你太逼迫我了。

所以我也逼迫一下你们，如果到了明年六四我们还在这里，你们的牧师还没有坐牢，我挑战你们，求主在你们当中兴起一批新的神学生，兴起一批新的愿意全职侍奉主的人，愿意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愿意把自己和自己的婚姻摆在上帝面前的人，为着未来的10年，20年，30年中国教会的复兴献上自己的人。阿们！你可以现在就在上帝面前为此来祷告。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可以祷告明年我们不在这儿了。但是求主的灵感动你，激励你。

2018年是一个转折，新宗教条例这个新三自运动是一个转折，这场新的逼迫的运动是个转折，甚至今年的修宪也是一个转折，无论是世俗社会，还是教会都会往前走。前面我不知道，我不能说前面是顺利，前面有可能更艰难，有可能更糟糕，有可能更专制，但是也有可能，无论怎样，上帝会给我们新的机会，上帝会带领教会的复兴。

首先我挑战每一位会友，我们不是说人人都有侍奉吗，你在这间教会如果还没有服事，我盼望你赶紧报名参加主日侍奉，好吗？因为没有几周了，万一下一周大逼迫就来了，你就没有机会给弟兄姐妹洗脚了。我们的爱宴需要同工，我们的服事需要同工，我们现在主日接待的团队需要更多的同工，因为我们楼上楼下都在开放。我们其实非常地欠缺同工，我们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参与主日的接待，最好是每个月只给他排一次的，轮流来的，因为服事那一天他其实很难很好地听道的，他要服事大家。现在我们的主日接待团队只有不到80个人，楼上楼下都需要服事，我希望有120个弟兄姐妹参与主日接待轮流服事。这样你既是对弟兄姐妹的服事，对慕道友的服事，甚至也是你对那些已经在主日接待团队中的弟兄姐妹的服事，就是你来替他一次，你不要让他轮得太勤。这就是你的爱心，这就是你的服事。还有我们的诗班也需要同工，我们现在两层楼开放，如果另一层楼里再来一个诗班

多好啊。我们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布道所，好几个布道所里面没有司琴，我们奉献几个司琴出去好不好？我们再奉献几个男高音好不好？我们再奉献几个女中音好不好？

结束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刚才没有讲到的，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90后年轻一代中的李欣恒和孟丽思两位肢体在巴基斯坦殉道。主，你带给我们一个过去的福音运动进入到尾声，整个社会都在剧烈的转型中，你也赐给了我们一个未来复兴的异象，甚至在那90后的年轻人中，你赐给中国教会，我们自己的司提反，我们这一代年轻的信徒中的殉道者。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来带领这间教会，求你带领今天的各城各乡的中国教会，能够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像我们所唱的这诗歌说：愿你赐我们这信心越来越刚强，主膀臂保护我们。

很多人说为什么你们没事呢？为什么512之后没有事？为什么64之后没有事呢？我们回答说因为我们上面有主，因为我们有最大的保护伞，是遮盖着天地的保护伞。没有主的许可，没有一根头发可以掉在地上，没有一只麻雀可以掉在地上。主，我们这过去的十年中也看到许多你的仆人坐监入狱，甚至在三自教会中，在拆十字架运动中也看到了三自崇一堂主任牧师顾约瑟牧师因为宣告脱离三自而被囚。

我们也看到活石教会的仰华牧师为你坐监，还有金灯台教会、其他各地的一些牧者、一些宣教士，他们在坐监，曹三强牧师现在也还在监狱中。主啊，求你纪念这些仆人，求你使我们效法，我们不但是有历史上的圣徒可以效法，就在我们同一个时代，我们也有许多神忠心的仆人可以效法，这实在是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第九章

改革宗在中国



这一章的专题是改革宗教会在家庭教会或者说改革宗在家庭教会中的传播和影响。

改革宗在欧洲的情况

先来看看1949年以前改革宗在中国的情况，历史往前追溯是新教的对华宣教，再往前追溯其实是荷兰人到台湾。荷兰人的教会是改革宗教会，在宗教改革之后荷兰最早建立了改革宗教会。后来在瑞士日内瓦建立了改革宗教会，在法国建立了改革宗教会，法国改革宗教会叫胡格诺派，可是胡格诺派后来受到很大的逼迫。有个名词叫圣巴多罗买之夜，就是说的对胡格诺派的屠杀。天主教用十二使徒的名字，有圣巴多罗买节，在那个夜晚，天主教的力量跟新教力量发生对抗，那是一场屠杀。在接下来一个月里面，法国对巴黎以及整个法国的胡格诺派信徒进行残酷的屠杀，杀害了十万人以上。胡格诺派就是法国的改革宗教会，当初国王都差点儿信了新教，屠杀之后改革宗教会基本上在法国消失了，所以后来法国就是天主教国家。不是说它里面新教教会一点都没有，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十六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正在逐渐形成，并不是今天看的国界分明的瑞士、荷兰、法国这样划分的很清晰。大概尼德兰地区就是今天的荷兰，所以胡格诺派对荷兰的教会有影响，他们也有一些人逃亡到北美，去往新大陆的后来也有胡格诺派的信徒。

瑞士改革宗教会建立起来之后，接下来苏格兰也成为非常重要的有长老会的国家。在欧洲最重要的两个加尔文主义或者改革宗教会的国家就是苏格兰跟荷兰。瑞士那时候还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邦。苏格兰的长老会跟荷兰的改革宗教会就成为改革宗在欧洲两大主要基地。

因此我们谈到改革宗教会的信仰告白的时候，我们也会谈到欧陆教会的信仰告白，就是以荷兰改革宗教会为主，当然也包括德语地区，荷兰也算是在德语地区。我们称之为欧洲大陆改革宗教会三大认信的标准是：海德堡要理问答，比利时信条以及多特信条。多特信条就是荷兰改革宗教会1610年的多特会议确立的。十六世纪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和比利时信条，以及十七世纪初的多特信条就成为欧洲的改革宗教会，特别是以荷兰为主的三大信仰

标准。

英国跟苏格兰呢？英国受苏格兰的影响，苏格兰建立了长老会，英格兰因为宗教改革不太彻底，主要是圣公会。但是圣公会的三十九条论纲基本上还是加尔文主义的。他们是在十七世纪中叶，就是威斯敏斯特会议的威斯敏斯特信条成为改革宗教会主要的认信标准。

长老会在台湾

对华的宣教，新教改革宗的来华，一般看主要是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加澳当时属英国）。这几国来华宣教士加起来占了全世界来华宣教士的70%以上，所以新教对华宣教的主要力量是英美，而英美主要的神学倾向是改革宗。

因此在70%的英美系的对华宣教当中，如果是长老会差来的，我们很确定他是改革宗的，但是如果他隶属于跨教派的宣教团体，就不太好算这个比例了。1807年来华的马礼逊，马礼逊的父亲是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他也出生于苏格兰长老会，他也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传道人，但是马礼逊并不是苏格兰长老会差遣出来的宣教士，而是由伦敦传道会差来的。早年对华宣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宣教机构，也是两个主要的改革宗对中国宣教的力量，一个是伦敦传道会，一个是美国的公理会海外宣教委员会。

这个背景是因为新教宗派林立，即使在一个宗派中通常也没有中央集权的大系统，那也是比较强调堂会之间的独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宣教对于一间堂会来讲，或者是对于成都地区五六间改革宗教会来讲，要去非洲宣教，不是二十一世纪，而是在十七世纪，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新教实际上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只有当教会的结构，基督的身体要联络搭配得合适，而且要联络搭配到一定深度才能拥有海外宣教的力量，没办法去那么远。

因此，荷兰是先于英国崛起的，荷兰的独立是先于美国独立一百多年的。因此荷兰是宗教改革之后第一个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海上强国的第一个崛起的新教国家。因此荷兰也成为向其他地区宣教的第一个新教国家，新教宣教的第一拨是荷兰改革

宗教会。1824年荷兰占领了台湾，把西班牙人赶走，3年后就有荷兰的牧师过来，所以荷兰改革宗是第一个来华的改革宗教会，也是第一个来到亚洲的改革宗教会，也是首先在台湾建立改革宗教会的，不过后来又中断了。荷兰人被赶走之后，改革宗教会就被中断了，当不是也不是什么都没有留下。中断了之后再到了十九世纪，十九世纪新教来华也是集中在厦门这一带，岭南这一带。英国长老会来华就渡海去台湾，他们先在岭南学闽南语，然后再到台湾。后来加拿大的长老会也来到台湾。所以台湾分北部的长老会是加拿大的长老会，南部的长老会是英国的长老会。

长老会的治理结构，不是中央集权的结构，它是联邦结构。这里一间堂会，那里一间堂，每个堂会是独立的，堂会在一起组成区会。但是区会并不是直接要管堂会所有的事务，不同的区会在一起，互相之间也是有一定的属灵权柄，主要是针对真理的持守和对牧师的考核，但是人财物都是独立的，这是联邦式的结构。联邦式的结构有个好处，联邦式的结构比较容易联合，咱们是联邦，你再加入一个，多个邦而已。它不是中央集权式的结构那么地插不进来，是高权威的一种结构。

到十九世纪末，英国的长老会跟加拿大的长老会一个在台湾北部，一个在台湾南部，他们在一起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全台湾的长老会，他们有这样的胸怀，就把教会的主权交出来了。所以台湾南部长老会和北部长老会就合并成为台湾长老会的总会。这个是改革宗在台湾的历史。

台湾长老会有几个特点。第一，台湾长老会入台较早，国民党还没有到台湾，长老会就已经在那儿了。实际上国民党1949年来台的时候，长老会在台湾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跟中国的问题不一样，中国直到今天政府还会说们基督教是外来，我们是中国，你们是西方的。但是长老会在台湾他们可以说我们是本土的，你们才是外来的。因为国民党政权才是外来政权，你来的时候我们都在这儿好多代了，我们甚至已经把一些原住民都全部变成最土著的最原住民基督徒。所以它已经完全成为一种本土的文化。

在1949年国民党去到台湾的时候，台湾社会里最主要的民间社会就是长老会，台湾社会里最主要的社会精英就是长老会里的信徒。因为是长老会带来教育。在台湾社会为什么文化精英也是

长老会的，因为只有他们才受了比较好的教育，不然很多人在外面没有很好的教育。

我记得我大概零几年第一次去台湾，到一些教会后，弟兄姊妹就问我们教会的情况，我们教会当时大概有一百人。他们问到我们教会有没有四声部诗班。四声部诗班，我们想都不敢想，那时我们诗班经常稀稀拉拉的，有两三个人就不错了，连司琴有时都找不到。他们说在我们台湾那怕是二三十人的教会，一定都是四声部诗班，因为台湾的整个音乐教育就是长老会带来的。所以台湾的音乐教育水平是很高的，每个教会里唱诗班水平都是很高的。

马礼逊来华是1807年，他是长老会的，但是当时长老会这支宗派很小，因此没办法做海外宣教。当时英国出现了一个跨宗派的差会伦敦传道会，这个差会此后就成为大概一百多年来新教对华宣教最主要的跨宗派的差传会。我们那天跟孩子们一起看威伯福斯的电影，叫“奇异恩典”。威伯福斯除了在废奴运动中带领英国废除了奴隶制度，他也非常注重海外宣教。威伯福斯对伦敦传道会有很大的支持。伦敦传道会的建立是跟威伯福斯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个来到台湾的长老会，第一个来到中国也是长老会，第一个去朝鲜的也是长老会。所以直到今天，长老会是台湾本土教会的主流，长老会也是韩国教会的主流。政府最近十年来特别关注长老会在中国教会中的发展，因为他们很不希望长老会也成为中国教会的主流。七八年前，听到一个宗教局的人说他们现在已经不研究灵恩派了，他们觉得灵恩派没有太大影响，他们已经开始研究改革宗了，他们觉得改革宗才是对他们威胁最大的。

英国的主流教会不是长老会，而是圣公会和浸信会。但是苏格兰长老会在十八世纪1860年之后，苏格兰长老、加拿大长老会、爱尔兰长老会都有对华宣教，但对华宣教最重要的一支是从英国或者说是英伦三岛大不列颠来的，分成四拨，英格兰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加拿大长老会和爱尔兰长老会。

接下来看美国的长老会，美国的长老会一开始的特点就是经常开会。每次蒋蓉师母听到我们要开会了，心里就很紧张，说

你们怎么开这么多会。因为长老会是共和制，不是拍个脑袋就做决定。长老会聚在一起讨论到底要不要对华宣教呢？然后他们大概就讨论了二十年。其他宗派都已经去到中国了，他们一讨论就讨论了二十年。他们讨论这背后有神学问题，比如说到底由谁来派呢？由总会来派吗？那总会来派会不会损害区会和堂会的权柄呢？会不会导致中央集权的倾向呢？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就讨论了二十年，就是要不要在总会当中差派。因为长老会是联邦制，其实跟美国的国家结构是一样的，美国早期是很松散的联邦制，联邦没有多少的权力，权力主要是在州。是在最近的一百年，尤其是二十世纪以后美国的联邦的权力才开始变得越来越大。美国的长老会里面也有这种保守的力量，他们防止总会变大。美国的国家精神就是地方主义，国家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当然公理会更不用说了，公理会根本没有总会和联会，每个堂会都是独立的。

所以整个美国从教会到国家到社会，非常重要的就是地方精神，就是地方的重要性。对教会来讲，地方堂会才是教会的核心和教会的重心。对国家来讲，每一个镇，南方的每一个小镇才是美国社会的根基。所以他们非常害怕和提防一件事，就是害怕中央政府的出现，最好不要有中央政府，联邦政府最好做越来越少的事，钱也是给的越少越好。

美国长老会的章程里有这么一条规定，在我们华西区会的章程里也是这条规定的，就是区会其实没有什么钱，区会是不拥有教产的，一定是各个堂会拥有教产。所以我们的规则都有一句话说：“区会开会的一切费用，不论是骑马来还是坐火车来都是各个堂会自己负担。”没有所谓到那里去报账的这种事情。谁开会谁自己带干粮，自己买票。没有说开会到这里来开会会议给你报，没有这回事。所以他们非常强调地方主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长老会开了二十多年的会议讨论我们要不要成立一个海外宣教委员会。因为成立海外宣教委员会就扩大总会的权柄，这个讨论了好久。

所以最早的美国长老会的宣教士不是通过美国长老会差遣出来的，而是通过美国公理会海外宣教会来的。来得比较早的是美北长老会委理华。这个时候美国长老会的背景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不断地分裂。这也同步地影响了美国改革宗长老会在中国的成

长。比如说，最重要的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发生最重要的内战，在南北战争的时期，美国长老会就分裂成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美北和美南不只是因为政治上的分裂。当时南北战争几年后就结束了，奴隶制也废掉了，照理说因为南北长老会也应该合在一起了，但是他们分容易合在一起就难了。在那半个世纪中长老会都是分成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一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发生长老会的重新大的联合。联合之后又分，分了又联合。因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重要的变化是基要派和自由派之争，当自由派的神学影响到长老会的时候，长老会就不断发生分裂，不断觉得对方已经不归正了，然后就开始分。今天来讲，要想搞清楚美国长老会里头的宗派，是要读到博士才能搞清楚的，我们的神学生读到道硕都是搞不太清楚的，因为这个过程太复杂了。

但是在中国我们也讲了，在1949年以前的五十年里，基要派跟自由派开始形成了两大阵营，在中国基要派阵营里，主要的力量就是来自于长老会的力量。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持守改革宗信仰的宗派，有一部分公理会。

公理会的信仰基础是改革宗，为什么起初委理华是通过公理会差过来的呢？因为公理会在神学上也是改革宗神学，只是他的教会观，他接受的是独立堂会主义。因此加上一部分的公理会，也算改革宗教会，也加上一部分浸信会，浸信会分成两个，一个叫改革宗浸信会，一个叫一般浸信会。非改革宗浸信会就叫一般浸信会或者普通浸信会。改革宗浸信会叫特别的浸信会。所以浸信会中也有一部分是改革宗的。

马礼逊入华之后，他基本上按照小要理问答，威斯敏斯特信条带过来对中国教会最初的一些教导。接下来是英国长老会，长老会的力量主要都是在岭南地区，包括台湾，福建跟广东一些地区。岭南地区是长老会的重心。

1860年之后，长老会就开始北上。长老会第二个重心就是山东。所以山东被称为是长老会想在那里建立中国的新英格兰地区，所以狄考文在齐鲁大学办学，想办成中国的普林斯顿。所以山东是中国长老会的一个重心。

再往北，达到长老会在中国的第三个重心就是东北地区。爱尔兰的长老会跟苏格兰长老会的主要地区在东北，在松花江

上。1900年庚子事变的时候，有个在庚子事变中逃亡出来的爱尔兰长老会的重要宣教士，叫古约翰。古约翰带来了东北大复兴，使得东北成为长老会改革宗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接下来就要讲到对1949年之后直到今天的改革宗在中国的传播的影响。

1949年前，改革宗的三个重要地区，其中之一东北，有古约翰带领的东北大复兴。

一个是山东，山东大复兴不完全是改革宗的，包括本土的耶稣家庭这样的本土教派，但是山东是长老会的老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中国基要派信仰有很大影响的机构，在山东的华北神学院。华北神学院是从齐鲁大学神学院分离出来的，支持这个神学院最主要的一个是美北长老会的山东区会，一个是美南长老会的江北区会。这两个区会成为中国基要派里面重要的力量，他们一同支持了华北神学院，所以华北神学院对中国1949年后家庭教会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之前列出来的一大批人物像杨绍唐，贾玉铭，甚至包括王明道，西北灵工团的张谷泉，这一大批的人，一批人1949年前后的基要派领袖和本土的复兴布道家都跟华北神学院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华北神学院是改革宗信仰影响到49年之后的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第三个岭南地区，这个地区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家庭教会，特别是改革宗在中国传播影响稍微要小一些。

东北为什么影响也很大呢？因为东北大复兴古约翰在那里建立了之后，就有一些加拿大长老会的，主要是大不列颠系统的，也有美国的，在美国的荷兰人教会，荷兰裔美国人的改革宗教会，在美国的荷兰改革宗也去到了东北。在美国的苏格兰长老会，也去到了东北。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院，实际是个圣经学校，叫营口圣经学院。

营口圣经学院跟华北神学院，这两个都是对改革宗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家庭教会的影响非常重要的基地。营口的学院主要是出了魏司道，还有其他的几位宣教士在这个学院里面。在这个学院里影响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赵中辉牧师。赵中辉牧师是王明道在东北举行布道会的时候信主的，然后又去了营口圣经学院受到改革宗的影响，1949年之后逃到香港，营口学院魏司道也逃到香港。他们就在香港成立了改革宗翻译社。

这个改革宗翻译社，我们可以这样讲，华北神学院主要的影响在1949年后是对中国教会的一批基要派人物的影响。而东北的营口圣经学院的影响主要是对49年之后整个海外华人教会的影响。赵中辉就成为改革宗在整个海外华人教会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他翻译了大量的改革宗的书籍，从改革宗的翻译社到后来改叫改革宗出版社。他又生了好几个儿子，赵天恩牧师又成为一个重要的被上帝使用的人，并且在1980年之后的中国家庭教会，河南，安徽的家庭教会的发展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赵天恩牧师成立中国福音会。所以赵氏父子在整个改革宗在中国的影响和对改革宗对80年代之后中国家庭教会的传播起到非常大作用的一个家族。

有的时候上帝就使用几个家族，使用赵家，使用唐家。计志文跟宋尚节，他们的伯特利布道团和后来的海外布道团到了东南亚。计志文在马来西亚建立了一间神学院，叫圣道神学院，而唐崇荣牧师就在这个神学院中毕业。他的老师叫黄彼得。他就成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改革宗整个归正神学的运动在华人教会当中最重要的力量。

我们可以这样讲，整个归正福音运动是由唐牧师的努力，唐牧师的布道，赵牧师的翻译所带出来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到了90年代的后期，首先因着赵天恩牧师在中国大陆的服事，然后因着大量的盗版的出现，所以没有盗版就没有中国家庭教会的复兴。唐牧师讲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不准印我的东西，那就是中国，但是全世界听我的讲道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中国教会复兴。我们以前都是看盗版的唐牧师的讲道，听盗版的唐牧师的视频，看盗版印刷的唐牧师的小册子。

特别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在2000年以后是改革宗在中国非常重要的。因为网络突破了肉身上的限制，而且网络带来另外一点，比如说你的信仰最主要的是生命的传承，是有一个人你要跟着他生活几年，你才慢慢在里面来经历信仰。那如果人家根本不准进来，你旁边没有这么一个人，你就很难成长了。可是如果你特别渴慕认识上帝的道，你特别寻求神学习，这个时候文字事工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改革宗教会因为强调神学，就有很好的文字事工。互联网的出现方便文字事工的传播，而生命很难通过网络来传播，但是文字是可以通过网络很好的传播。

因此2000年之后，改革宗在海外的归正神学运动就极大的影响了海内外，不只是中国，也包括在海外的一大批牧者。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像我们中有很多服事的，有在台湾的郭明章牧师，现在在美国的陈彪牧师，还有在我们当中服事的好多位牧师，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唐牧师的布道会上献身，委身于归正神学运动的传道人。

基本上可以这样讲，今天在海外的改革宗里的传道人基本上没有不受唐牧师的影响的，而且很多人都是在他的布道会上奉献自己去做传道人的。在国内也是一样，国内的这批改革宗教会和改革宗传道人基本上很少有是参加唐牧师的布道会来信主和奉献作传道人的，因为机会比较少，但是都是看唐牧师的盗版书立志信主的，看唐牧师的盗版书决定奉献自己的。主啊，我看了盗版书，我把我一生的奉献给你。所以感谢主！

另外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美国的长老会也在对华宣教，RPC对华是有宣教的，PCA对华也是有宣教的。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改革宗教会，实际上让我们这样讲，美国的改革宗教会经历了自由派跟基要派的发展。我们之前一直强调20世纪的美国教会的历史，普世教会主要是英美教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教会的历史。

第一个是基要派跟福音派之争。美国的长老会，改革宗教会在这个浪潮中，绝大多数的改革宗长老会已经成了自由派教会，当然其他宗派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长老会基本上在整体上成为了自由派的长老会。而韩国的长老会比较复杂，有灵恩派的韩国长老会，有自由派的韩国长老会，反正在韩国都叫长老会，所以你光听说长老会是不够的，你要问他是哪个长老会。第一大部分是自由派的长老会，还有一部分是基要派的长老会。基要派长老会成为美国基要派中的一个重要力量。

后来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发生了一场运动，叫福音派运动。就是从基要派当中出来基要派转型为福音派。因为基要派看到，基督徒要持守基要信仰，相信圣经的权威性，反抗自由派的社会福音，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基要派慢慢地变成了不问世事的一种教会，变成了与社会疏离的教会，变成了一个因为要对抗自由派，所以自由派干什么，咱们就不干什么。自由派看电影，我们不看电影，看电影是自由派的。自由派关心社会，我们不关

心，关心社会就是自由派。自由派去帮助别人，送人家粮食，搞一些公益项目，那我们就不搞，因为我们是基要派，我们反对自由派。所以基要派到了美国的二三十年代时候，变得越来越封闭，变成了圣俗两分，变成了一种除了传福音，其他任何事情都不重要，只有抢救人的灵魂重要，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因为要和自由派反着干。

随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看到整个社会的这种状况，福音派就开始起来。福音派讲既要持守信仰，也要关心社会，要看教会跟世界的关系，看教会跟文化的关系。在美国的长老会里，可以分成三拨：第一拨是自由派的长老会，第二拨是基要派的长老会，第三拨从基要派长老会中实现了福音派的转变，可以称之为福音派的基要派长老会，就是它属于福音派大家庭的这个长老会。还有一拨长老会没有经过福音派的洗礼，也没有经过福音派的更新，而是完全持守传统的基要派的信仰，我们可以称它叫基要派的改革宗。

在90年代之后，美国的基要派的改革宗对华的宣教跟中国家庭教会中的基要派的信仰结合，所以在中国形成了很强大的基要派改革宗的阵营。另外，美国属于福音派的改革宗，他们对华的宣教跟着中国整个89学潮之后一代人对中国社会的绝望，一代人对社会和个人命运的寻求，跟这些时代的命运 对时代的关切，跟这一切结合起来，这在中国形成了福音派改革宗的一个阵营。

所以今天你会发现改革宗在中国也是有很大的光谱的。有人会说华西区会是福音派改革宗的代表，但是在中国还有很多像温州的改革宗教会的周大卫牧师所在的教会系统是非常极端的基要派的改革宗。徐州的杨兵牧师，山西的王约翰牧师所在的教会系统，还有在这个系统里面属于美国RPC的系统，还有像福州的林刚长老，他们程度不一的其实都是属于基要派的改革宗。北京的门徒系统其实也有基要派的特征，但是总体上还是在福音派里的。华西区会基本上可以算是福音派改革宗的一个代表，所以被很多的基要派改革宗教会认为不够改革宗。

在过去的一些年里，我们教会也稍微有一点点这方面的纷争。我们教会有一位同工以前离开时就是认为我们还不够改革宗，然后去到周大卫牧师所在的教会系统，在成都建立了一个聚会点，聚会就看周大卫牧师在温州讲道的录影。然后有唯独绝对

只唱诗篇的改革宗。在我们教会中蛮有这样一些背景的改革宗过来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中经历到了这样一个恩典的福音，慢慢地放弃了基要改革宗立场，或者虽然自己坚持这样的立场但是不用这个来定罪教会，不用这个来定罪弟兄姐妹，我们也非常地欢迎他们在我们中间留下来。但是也有一些最后是破门而去，实际上最后也再次地离开教会，甚至反过来定罪教会。我们过去这些年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倾向的。

实际上再说更大一点的，教会在过去两年所经历到整个教会的分裂实际上也是有这样一个背景的。所谓两位牧师在异象上的差异实际上就是基要派改革宗的特征跟福音派改革宗的特征的这条道路的差别，就是秋雨所走的这十年的道路，家庭教会公开化的一个道路，与传统的家庭教会结合的一个道路，积极地寻求三化的异象。三化的异象是特别地表达福音派改革宗的立场，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之间的结合，中国的福音化，教会的国度化和文化的基督化。神带领我们继续地走在这一条路上。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在这场逼迫面前，你也会看到，我们在发出牧者的联署之后，你都会看见一点，就是来签署基本上都是福音派教会，不愿意签署的基本上都是基要派的教会。而改革宗教会分为两拨。福音派的改革宗教会就会签名，基要派的改革宗教会就不会签名。实际上灵恩派教会也愿意签名，因为灵恩派教会对中国的影响大，但是没有那么的大，因为慢慢受过灵恩派冲击的教会其实慢慢地都在走向福音派的方向。河南教会在整体上是受灵恩派影响的，但是他们也是慢慢地在转变。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中，可以说是三大派：一派是基要派教会，就是五十年代以来的基要派教会，中国家庭教会的根基就是基要派教会；一派是福音派教会，是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后，中国传统的基要派教会，我们上次讲有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就是向着福音派转型。今天家庭教会当中的大部分都慢慢转型为福音派教会。就是我们持守一个共同的福音派的信仰，就是相信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救我们，就是相信只有耶稣的十字架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们要走的道路，就是绝对相信圣经是权威的，是无误的，上帝不变的话语，持守住这三点的就是保守的福音派教会。所以我宁愿将改革宗视为是福音派大家庭中的一员。

我们并不是要显出跟其他的福音派教会一种的不同。我们以前也走过那样的路，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也走过这样的路，就是一种改革宗愤青的道路。就是学了改革宗神学之后发现所有的人都不归正，发现除了我们，其他人都不知道改革宗，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到别的教会发现唱的诗歌也不对，崇拜也不对，上面领会敬拜也不对，姐妹站在上面讲道也不对，连板凳摆得都不对，诗班站在台上唱歌也不对，总之最后发现全部都不对。然后就觉得只有我们才是最正统的，所以这种东西在过去十年的改革宗运动当中基本上导致了一个局面，就是在中国教会中改革宗过街，人人喊打，就是改革宗在每个地方都不断地带来教会的分歧。每个地方教会很怕把自己同工送出去参加了一个改革宗教会的特会，回来之后就分裂教会，回来之后就告诉牧师教会不对要进行改革，牧师说不改革，然后他就在里面当红卫兵。在过去的十年当中，这样的事真的是不少，改革宗在很多的中国教会中有很不好的名声。当然我们就有一种受苦的心说因为中国的教会都太顽梗了，人心太败坏了，所以只有我们在为主受苦。昨天封姊妹还跟大家分享了宋恩光弟兄在老家教会都被定为异端了。

一方面是有许多地方的教会对改革宗教会的一种不理解误解，甚至有一种偏激的态度。因为基要派里面是有很强的律法主义的。有一些律法是很好的，比如说不喝酒不抽烟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我请问你圣经在什么地方有明确的教导十诫的律法中基督徒绝对不应该抽烟也不应该喝酒，你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圣经明确的教导。有么？没有。所以在中国的传统家庭教会中不抽烟不喝酒是一个比十诫还要绝对的事情，那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如果还没有戒烟戒酒，教会根本就不会给你施洗的。

什么叫律法主义？就是对上帝的律法去添加一些甚至里没有的规条。好的习惯好不好？当然也好，但是变成律法就不好了，这样就变成了对人的良心的辖制，就变成了一种律法主义的自义，就变成了一种僵硬的基要主义的信仰。当你在基要派教会系统里时间长，你就缺乏那种活泼的恩典。

所以有几次有弟兄姐妹到我们教会来，我听到有个同工说：“太好了，来到改革宗教会终于知道基督也是可以喝一点点酒的”。因为圣经的教导是不要酗酒，但是如果酒对你是有诱惑

的，你最好是不要喝，但是这是在成圣的过程中对你生命的激励，这不是律法上的一种要求。

那么在基要派里面这种要求可多了，最重要的有一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还在被基要派教会批评的，因为中国基要派教会是有十诫的，比如：第一诫不准喝酒，第二诫不能抽烟，第三诫不能打官司……。不能打官司在中国传统基要派教会里面是金科铁律。大概十年前有教会遭受逼迫的时候，那时袁相忱还没有归回天家，就到北京去问袁伯，袁伯就说：“基督徒打什么官司，默然不语，知道是出于神的就默然不语，宁可让步，主要伸冤。”你自己去伸什么冤，只要打官司，就不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中国基要派所理解的十字架道路就是不可有任何话说出来，默然不语，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不参军，不当官，不打官司不告官是基要派基本的原则。当然还有一些穿什么衣服也有十诫的。

这一派是基要派教会、一派是福音派教会、还有一派是灵恩派。那就有人问改革宗呢？我基本上不把改革宗算在中国的三大派里，因为改革宗一半在福音派里，一半在基要派里。因为对于今天的中国教会来讲，对于二十世纪的教会来讲，其实最重大的是基要派，福音派。

当然自由派在中国家庭教会中直到今天没有出现，这是上帝的保守。因为政府一直在击打我们。一旦政府不逼迫我们，一旦和平年代持续十年以上，一定就会有自由派教会出现。因为上帝藉着政府的逼迫使家庭教会始终保持了一个被打压的态势，所以只有没有被打压的三自是自由派。在中国三自就是自由派，在家庭教会当中没有自由派。我不是说没有某一个人受到自由派神学的影响，但是我们在过去的最近五六年来城市家庭教会的复兴当中已经看到了一种世俗化的自由派的危险，甚至连圣经的权威性，特别是一些到美国读了神学回来的传道人就告诉你：“其实以赛亚书不是以赛亚写的，其实创世纪不是摩西写的，实际上福音书来自于更早的Q文件，其实那个什么什么的是经过后来的编撰的”。

这种自由派的影响其实已经非常大了，但是神为了爱我们，神为了救我们，神为了让中国的教会保持基要的信仰，基要信仰不等于基要派，一个保持基要信仰，又能保持强烈的福音派的认

信，又能够保持对文化和社会的强烈的关怀，这个是整个中国教会在今天面临的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局面。神为了保守中国教会，所以神就让共产党对主的教会发起新一轮的逼迫。你们觉得好不好？好，因为政府再不逼迫教会，教会就完蛋了。

想一想温州教会，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一个学校里面200个基督徒的孩子被老师一轮一轮地谈话，谈了一轮之后变成四十多个人，再谈一轮，三天之后只剩一个人坚持说我要填我是基督徒。可悲吗？如果再来一轮逼迫的话，什么局面？中国教会看似热闹，看似复兴，实际上骨子里基要的信仰，那个忠心，在这个越来越不断崛起的时代面前已经消化如蜡了。

所以我们求主藉着这场逼迫真的来熬炼他的教会，打掉一半的教会都可以。主若愿意让不能够持守十字架的基要的福音信仰的教会被主拆毁。如果我们这间教会牧师一旦被拿走了，你们就作鸟兽散，回到家庭里的小组对组长一威胁，然后20个小组就变成只有几个，那这间教会就该被上帝拆毁。

但是我相信神的心意不仅仅是为了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中拆毁一批教会，甚至要拆毁一批基督徒的信仰，让他们看见，让他们承认其实自己是不信的，其实是没有真信心的，其实是没有走十字架道路，原来自己对十字架的福音的认识是如此的肤浅，神要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但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宗的教会需要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如果你认为你是更加地明白恩典的福音，你就要向中国的教会更加显出你的恩典来，而不是成为中国教会当中的宪兵队，不是成为一个不断地去论断其他教会的人，而是成为一个用你的坚持，用你的受苦来祝福中国教会的人。如果改革宗教会在今天中国不成为一个愿意受苦来祝福中国教会的人，如果改革宗教会在今天的中国不成为一个在逼迫的面前、在患难的面前、在世俗的面前、在金钱的力量、在政治力量面前走在前面的人，不愿意站出来担当的人，不愿意出来受苦的人，那么改革宗在中国就没有前途。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认为改革宗教会是中国最明白福音真理的教会，那么你就应该对着政府说：“来！打我！打我”！我们就应该期望神的这场试炼临到那些自认为最明白真理的人，那些自认为最明白福音的人，那些自认为最明白福音的人就应当在这一轮逼迫中被主击打，来显出他们所相信的恩典的福

音到底是不是恩典的福音。阿们！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藉着这场的逼迫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不论断其他教会的人，不论断主的教会和主的仆人的的人，使我们成为不高高在上，在舒适的环境中来讨论神学问题，然后生出不断地傲慢的改革宗的愤青，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为主的教会来受苦的人。让我们知道一件事，上帝是因他的恩典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教会即使他们对恩典教义的领受和认识不是那么正确，不是那么的完全，但是恩典之所以是恩典，就显出来神学不正确的人都能够被主拯救，这就显出这是福音来。

福音不是临到神学最正确的人，福音是临到神要临到谁就临到谁的人。所以你生气吗？就是灵恩派教会比你更坚固，你生什么气呢？就是基要派教会现在被政府逼迫，显出来美好的见证，而你们都作鸟兽散，所以你们的信仰，你们的生命会反讽，会拆毁你们自己的教导。所以我们求主不要让这间教会生命来拆毁这间教会的教导，不要让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光景来拆毁这间教会的讲台。谁能够拆毁这间教会的讲台呢？我告诉你，政府没有力量拆毁这间教会的讲台，习近平没有力量拆毁这间教会的讲台，只有你们才有本事拆毁这间教会的讲台。

你们如果愿意在逼迫中持守这个信仰，退到家庭中那就退无可退了。我们有一天可能会失去这个会堂，可能无论经过怎样的抗争，都仍然没有办法保持公共的敬拜，但是当退到家里去的时候，我愿每一个基督徒知道这就退无可退了，如果你还要叫我退，你抓我吧。你要杀就杀，要刚就刚，你要把我赶出去就赶出去，你要让我掉工作就掉工作，这是退无可退了。我无法再退，家庭聚会是我必须持守的。阿们！如果你们能够这样，这间教会的讲台就永远不可能被拆毁。阿们！

结束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讲家庭教会的历史，家庭教会也被你带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是你恩典的，救恩历史的，一个你施恩的日子就要到了。主啊，藉着这世上的逼迫来临的时

候，挑战我们每个人的信仰吧，让我们坐下来计算代价并且在你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软弱吧，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刚强的，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承认主我是软弱的。但是主，让我提心吊胆地来相信你吧，我虽然软弱，我没有办法知道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会怎么反应，但是主，我还是要跟随你，但是主，我仍然要敬拜你，我哪怕里面充满了一切惧怕，早晨起来天一亮神你还是要帮助你的教会，你还是要帮助这城。主，求你就来带领这间教会，也带领在中国的改革宗教会，求你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些头脑大但身子小的人，怜悯我们这些自以为明白了真理就生出许多的傲慢和自义的人，就成为在教会当中分裂教会的人，就成为在中国教会中来论断我的弟兄的人。哦，主啊，求你击打中国的改革宗教会，求你拆毁中国的改革宗教会，让他们实在是让他们的生命降服在他们所宣告的那个恩典的教义之下。好叫你的教会迎来那更大的丰收，好叫归正信仰的确是我们所相信的信仰，经过这个逼迫之后，真的能够来祝福中国的教会，不但是以我们所教导的福音，而是以我们生命的见证来祝福更多的中国教会，来赢得更多的中国教会我们弟兄姐妹的尊敬，而不是敬而远之。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预备我们，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我们彼此地问安！

第十章

家庭教会的 传统、承继与未来



图：2018年12月，秋雨圣约归正教会失去会堂后的户外敬拜。

根据你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了解，她的属灵传统是什么？她最核心的是什么？你可以试着做个总结吗？

是基要派的传统，家庭教会就是抓住了这个属灵传统，中国家庭教会在基要派和自由派的区别中，家庭教会的传统就是基要派传统：坚持圣经，走十字架道路（弟兄姊妹回答的总结）。

（回答问题的一位）弟兄是做过家庭教会的传道人的。知道说家庭教会两个很重要的特征：第一，相信圣经，家庭教会是基于圣经，家庭教会不是在每一点上都很健康，在其他一些方面不是很健康，但是在这一点上非常地健康。健康家庭教会九标志，她是基于圣经的，她是笃信圣经的，她是高举圣经的，她是保护圣经的。

在文革的时候，我看过一个山西的姐妹的见证，那个老姐妹对她的几个孩子说：“你们丢了命没关系，但是家里这本圣经一定要保住”。你们当中有没有父母会这样对儿女说：“没关系嘛，丢了再买一本”。在那个时候，不是有钱就能买一本的。曾经的罗马帝国时期有十大逼迫，其中有一次逼迫就是让基督徒交出圣经。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这样印好的圣经，那时候只有书卷。你可能那里有那么一两卷书，而且可能都不太完整，把你的圣经交出来代表对凯撒的效忠。在文革的时候厦门有个信徒为了不交出那本圣经，为此而坐牢。为什么呢？因为据说当时她手上的这本已经是整个厦门的最后一本圣经了。

你要知道中国的家庭教会，包括以前在文革的时候是有很多抄写圣经的传统。你抄过圣经吗？一章一章抄过吗？或者五六节十节一大段地在家里抄过吗？抄过的举一下手！还是有一些弟兄姊妹抄过的，感谢主！我鼓励弟兄姐妹你可以把这个当做你灵修的一个操练的方式，不是说为了练书法。当然抄久了字也会写得好，但那个不是目的。将抄写圣经作为一种灵修的方式，磨炼你自己的一种方式，与神亲近的一种方式，也使你来体会中国家庭教会热爱圣经，渴慕上帝道的传统。

持守圣经，相信圣经，走十字架的道路是基要派的传统。还有没有？再请一两位回答。“坚信耶稣基督是主”！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个弟兄跟我说，家庭教会的信仰很简单，就几个字：

耶稣是基督。这是他最核心的信仰，就是认主为主，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起初彼得的认信，这个是福音信仰最核心的地方。

我们稍微归纳一点家庭教会的传统。有位河南家庭教会的牧师叫做张义南，他写过河南家庭教会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大家可能在上一周看到这个消息：上一周张义南牧师被行政拘留15天，应该现在还没有放出来。他列出中国家庭教会有三个属灵的传统，一个是1949年前的属灵传统，特别是以1927年—1937年十年大复兴，一直到四十年代所带出来的1949年前的基要派传统；第二个属灵传统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王明道、林献羔、袁相忱这一代的传道人坚持不加入三自，坚持家庭教会的立场而为此坐牢受苦的五六十年代家庭教会的老一代传道人，他们往上承接了1949年前的基要派传统，往下跟八十年代之后的家庭教会也是有关系的；第三个传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七八十年代在河南和安徽的那一批农村家庭教会复兴的传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这个跟王明道的传统有关系，但有的时候关系又不是很大，而且这个传统带出来的特征跟前面也有一致，比如说坚持家庭教会的道路，相信圣经，走十字架道路，这都是相同的。但还是跟王明道那一代有不同的地方，区别的在哪里呢？我们以前讲过49年前的基要派一直到五六十年代王明道这一代他们的重心都是在大城市里，主要在上海北京厦门这种些城市之中，而七八十年代的家庭教会新的属灵传统主要是从乡村出来的，八十年代的河南教会和安徽教会跟城市里的老家庭教会前辈的连接其实还不是太多。

后来的家庭教会跟前面相比有不同，有拓展的地方是什么？王明道他们那一代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一点是坚决不加入三自，坚持基要派的信仰，这个是他们最核心的东西。其实还说不上有福音的拓展，说不上有福音的运动，说不上教会往前走，而是教会在打压之下，守住最后一根线。因为这根线守不住的话就卖主了，这根线守不住整个信仰都没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王明道这一代第二个传统给家庭教会的根基是保本的根基、是最后的底线、是持守底线的信仰。

所以到了八九十年代，特别是两千年以后，像我们这一代慢慢兴起的时候，就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家庭教会上一代的使

命是为主去死，我们这一代的使命是为主去活”。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那个时候持守基要的信仰是要死的，要有必死的心才能持守这个底线，教会历史上有种说法：“从红色的殉道到白色的殉道”。

我们上一代家庭教会是红色殉道，红色殉道是要流血，是要死人的，殉道的真正的含义是要死的。后来是白色殉道，什么是白色殉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掉工作？你们当中有没有家人施压？有没有人被搬家？有没有房东要跟你解除租约？这个就是白色殉道！在日常生活当中为着主的缘故来忍受挫折，忍受一点点损失，但是绝对没有生命之忧。你们有生命之忧吗？你们现在收到追杀令了吗？没有！我都还没有收到追杀令，所以你们都是无性命之忧，所以红色殉道跟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对我们来说，殉道可以啊，殉一份工作比较难，殉一套房子比较难，殉一个具体的东西比较难。但实际上，殉道的精神在这个时代中变成了在日常生活当中为主去死，实际上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为主去活。带着为主去死的心来活，这个叫做白色殉道。

我们常常会这样讲说，在生活中因着主的缘故受到一点损失，我们就说那是殉道，这里所说的殉道不是要死人的意思，而是指你要稍稍忍受一点委屈。然而在七八十年代他们是要坐牢的，九十年代也还是有坐牢的。八十年代有一场家庭教会内的异端运动，九十年代初，公安部就搞了一个打击二十几个邪教团体的运动。所以有很多次运动式的打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异端东方闪电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后来改名字了又叫全能神。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家庭教会恰恰是在张义南说的第三个传统中出现了异端运动。第三个属灵传统是上帝亲自兴起，从乡村教会中起来，但是异端运动也是从第三个传统当中所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虽然你热爱圣经，但其实没有好好地明白圣经，因为没有人指教怎能明白呢？但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第三个属灵传统出来异端运动，有很多教会走得比较偏差，但是他们是不是到了异端的地步，实际上今天很难回过头来说。

今天对很多的异端的一些研究不是很深，因为有好多种异端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我们知道有两个直到今天还有两个比较活跃的，一个是东方闪电；还有一个在我们四川比较多的，叫二两

粮，又叫三赎基督，还叫门徒会。中共大概在过去十年到五年有一拨对门徒会即三赎基督的一轮大的打压行动。如果你今天去看国外公布的目前在监狱中的基督徒的名单，你会看到基督徒的名单中人数非常多的就是三赎基督的人，实际上是被打的异端，现在在监狱中最多的是他们，其他的都不多了。最近这五年又开始在打压另一个，就是召会，这五年在监狱中的基督徒主要是召会的。

对三赎我们确定他的确是异端，因为他已经指到基督论了，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是基督，这还得了，这已经是异端到一个怎样的地步了？所以三赎跟东方闪电是明确的异端，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所打压的很多，比如召会和呼喊派，从呼喊派里出来的三班仆人，从呼喊派出来的徐永泽所在的全范围教会，后来又从全范围教会里面出来的华南教会，这些多多少少都是有很多很偏激的教导，但是算不算异端？是不是真的异端？有共产党的构陷在里面还是他们真的是异端，但其实今天大公教会在这方面对他们的研究不是很多，可能也许他们有一些，如果不是在一个非正常情况下而是教会在正常情况他们有一些偏差是可以被校正过来的。

但是无论怎么样，第三个属灵传统有一点跟王明道他们这一代第二个属灵传统不一样，他们是往前走了，就是广传福音，建立教会。因为八十年代家庭教会的复兴主要不是依靠这一个在城市当中承接49年前的基要派的这一个属灵传统带来的，这个属灵传统在整个中国家庭教会中的比重并不太高。在新兴的教会成长复兴过程中，号称是五千万或者八千万，这里所占的比重都不是最高的，占的比重最高的，增长速度最快是第三个传统，因为它带来了随走随传、广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么在几个月当中跑遍这个地方几个县，那就可以建立上百个教会，这就是在八十年代发生的事情，在九十年代也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第三个属灵传统。

在第二个属灵传统里，实际上没有看见这个传统。王明道出来后也没有在八十年代继续建立教会了，袁相忱也就只有他牧养的那个堂点以后没有再建立新的堂点了，林献羔也只有他牧养的那个堂点，他们基本上都是守住我这个堂点，然后做为一个底线和灯塔，他们保守的这些教会基本上没有很大的福音事工和教会

建立的事工。当然也有些地方是有的，在厦门是有的，但是规模也不算太大。规模大的，像风浪一样遍满全国的吹的那就是河南教会系统、安徽教会系统、温州教会系统，那就是这三个教会系统所带来的。这个是家庭教会里另一个非常强烈的传统，那就是积极地火热地拼命地传福音，火热地拼命地建教会，这个是四十年家庭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求主能够使我们来承接这一个传统。有人在这城逼你，就跑到那城，就开始建立教会，教会就开始被建立起来。

还有一个是第二个属灵传统当中不是很明显，但是在第三个属灵传统当中非常明显，而且也影响到我所说的拼命传福音，拼命建教会的这个力量的，就是强烈的末世论。中国家庭教会是一个有强烈的，迫切的末世论传统的教会。也就是说中国家庭教会在这四十年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发展，跟中国家庭教会在末世论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立场是有关系的。这个立场就是认为耶稣快要来了，就是认为这个时代已经败坏到了一个将要过去，当然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时代是要过去的，我们所有人也都知道耶稣是要再来，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根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警醒，为了让你迫切。可是不一定你脑袋里是这么想的，你就会很迫切。温州在这方面的特征要小一点，最重要的是河南和安徽，他们有极其强烈的末世论的特征。你去唱小敏的迦南诗歌，你如果跟教会历史上其他诗歌集做个对照，你会发现有个主题其他西方的圣诗精选，或者国外华人教会用的生命圣诗，或者其他好多的歌本不太一样，迦南诗歌有个主题在其他的诗歌本中不是那么突出，虽然有，但数量不多或情感没有那么迫切。但是在小敏的迦南诗选中，可以说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整本一千多首全部弥漫了这个主题，那就是末世论，那就是主快要来了，你快要死了，世界快要毁灭了，世界如此堕落，剩下的日子不多啦。所以我喜欢唱小敏的歌，你们喜欢吗？“给我力量不至滑脚，走余剩几里路”会唱吗？我们的歌本里有的。中国家庭教会不唱小敏姊妹的诗歌，就会离开中国家庭教会这个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强烈的末世论。但是我们强调的是健康而强烈的末世论，因为我们刚才讲第三个家庭教会属灵传统里出来的这些异端，凡是中国家庭教会异端运动中出来的本土异端基本上都是末世论异端。他们太强烈到一个地步会出异端。但是太平稳到一个地步的话就失去了那样的火热。

在奋兴歌集中我们看第382首，“在这些仅存的年间”是另一首。你知道为什么家庭教会让人讨厌，因为这个国家在崛起，八十年代之后，社会上唱的是“再过二十年让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而家庭教会在唱“在这些仅存的年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反差，这就是教会跟世界的反差，所以没有一种强烈的末世论，教会跟世界唱的歌都差不多。我们来唱这首“在这些仅存的年间”：

在这些仅存的年间
你该怎么样
你是警醒，你是沉睡
还是飘泊没有定向
你是站在世界
还是在主的身旁
你是专心爱主
还是虚度时光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
智慧和胆量
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
打那美好的仗

让我这样总结一下家庭教会的运动有几个特征。一个最根本的，从政教关系来看，家庭教会是一场不从国教者的清教徒运动，家庭教会是一个在历史中能够与当初的清教徒运动一样，不从国教是她的一个特征。不加入三自就是不从国教，在一个无神论的政权下持守家庭教会的立场。在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上，教会受过许许多多的迫害，教会曾经在各种各样的政权下存在，希特勒很厉害，罗马凯撒也很厉害，但是在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中，教会很少在一个无神论的政权下存活。古代逼迫教会的君王是不是无神论者？不是，没有一个是。是暴君在逼迫教会，你可以称她为暴君，不过暴君也是要烧香拜佛的，他不是无神论者。所以在

二十世纪以前，教会在这个地上从来没有受到过无神论政权的逼迫，教会从来没有在一个明目张胆的无神论政权下存活过。那么因此在教会历史上就会有一个悬念，就是说如果信耶稣的教会放在一个无神论政权下活不活的下来呢？上帝藉着中国家庭教会的运动，这一点不但是对中国有意义，也是在两千年教会历史上仍然有意义。当然在二十世纪，在无神论政权下也活过来的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教会。特别是在今天，朝鲜的教会还活着。朝鲜有报道说有超过十万的基督徒在集中营里。

所以中国的家庭教会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她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她的量够大，她的数量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够大，所以她是非常独特地被放在一个无神论政权下，经过六十多年的时间，然后见证了主的教会可以胜过无神论政权的逼迫，可以在无神论政权之下仍然存活，而在无神论政权下你怎样才能不被消灭呢？怎样才能存活呢？所以你就必然有个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不从国教。

不从国教有两个意思，一个叫做不从马教。你首先是不从这个国家的无神论，因为它一个宗教。第二，这个无神论宗教又要控制教会中的一部分，就是官方教会。所以官方教会的实质是什么？实质是从了马教。所以我们是“不从国教”，表面上是“不从官方三自教会”，这个有点像当年的清教徒从圣公会中出来，可是跟那个时候不一样，圣公会仍然是真的教会，而且英国的国王真的是基督徒，不管他是一个好基督徒还是一个坏基督徒，他总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的三自的背后是那个无神论的马教是另外一个教，是无神论的异教。所以家庭教会的第一个特征，家庭教会第一个在教会史上给她的定位，就是一“不从国教”的清教徒的运动，而且见证了教会在无神论政权下的存在方式和在无神论政权下的福音的力量。这是我对家庭教会传承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

第二个特征是中国家庭教会是一个基要派的教会，当然基要派也在向福音派转变。从基要真理这一点来讲，福音派跟基要派是一样的。但是基要派有她自己很多的问题，基要派有她的道德主义。所以基要派在我们中一个方面是持守了基本的真理，但是基要派很容易跟中国文化里面的道德主义结合，会变成很强的律法主义，也变成一种很强的圣俗两分。这两点是基要派在进入两千年以后，基要派向福音派的转变是今天中国家庭教会的主要

的发展趋势。但是如果跟自由派做个对应，我们总的还是可以这样讲，有的时候基要派也是可以包含福音派在内的。我们可以说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是基要派的传统，是古旧福音持守基要信仰的传统，以至于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已经成为全世界最突出的，甚至是规模最大的基要派教会。

因为美国教会今天在整体上不是基要派教会，而是自由派教会，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新福音派教会。在美国仍然还在持守古旧福音的福音派，如果我们不是用已经放弃了圣经权威性的新福音派来作为一个衡量的话，美国这种持守古旧福音的教会里的基督徒也就三千万到五千万，不会超过这个数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我不知道数据是多少，但我想应该是超过三千万到五千万这个数量的。我们也讲了非洲经历到的大复兴是灵恩运动的大复兴，当然灵恩派教会也是分两类，有一派灵恩教会还是有基要派的底子，所以有一部分的灵恩教会还是可以算在基要派里的。但是有一部分灵恩派教会越来越灵恩之后，就越来越走向现代的成功神学，其实就是变成自由派了。所以非洲跟南美虽然基督徒的总量比我们多，传统也比我们深，但是他们不是基要派的大本营。所以今天很有意思，整个教会在全球的基要派教会的大本营是在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这个是家庭教会属灵传统的第二个特征。

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特征都不但是对中国，而且是对全球的教会的图景里都是有意义的。她是全球最大的基要派教会，她主要的传统就是基要派传统。而基要信仰传统的特征是什么呢？刚才大家讲到了几点，比如说一个渴慕圣经、笃信圣经、爱慕圣经、基于圣经、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还有一些也是与基要传统有关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慢慢远离，但是在这一年中我们也看到上帝在我们之中在慢慢地复兴，那就是祷告的传统，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爱祷告。中国家庭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呢？你可以说中国家庭教会是个热爱圣经的教会，你可以说中国家庭教会是个喜欢祷告的教会，是个热爱祷告的教会，是个跪下来祷告的教会，是个早晨五点钟祷告的教会。但是这个传统在今天的家庭教会中其实在慢慢地丧失，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新兴城市教会，真的是在丧失，甚至在韩国的一些教会当中保存地更好。

我没有去过韩国，有几个同工跟我说，他们去过韩国，参加好几个教会的晨祷会。六点半晨祷会就结束了，然后就去上班。不是一间教会，很多教会都是这样，而且是几百人参加的晨祷会，比较大的，像大地教会是灵恩派改革宗教会，上千人参加五点钟的晨祷，然后六点半去上班。在中国的教会中今天已经看不见这样的中国早晨五点钟，不是说每个人都没有，每个教会都没有了，我是说作为一个大的图画你看不到了。我求主来激励我们。

我们上一周也看到郑州的大里教会，河南教会是第二波里面兴起来的，政府将他们取缔了，我不知道他们今天的主日敬拜如何。政府要取缔他们，他们已经坚持了两个主日了。第一个主日是怎么坚持的呢？24小时400多弟兄姐妹昼夜都在教会里不走，通宵在教会里祷告敬拜。人家就等着他们，你们是要下班的，我们是不下班的。敬拜神是不下班的，他们是要下班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教会能够有四百个弟兄姐妹通宵到这里来祷告不走吗？有吗？有（根据举手情况确认的），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

第二周就是上个主日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上个主日七点半之前弟兄姐妹就全部在会堂里坐满了，然后下面就把门关了。警察还没上班，联合执法嘛，联合执法都来得比较晚。七点半就已经坐满了，还有几个迟到的弟兄姐妹就一起被关在外面了。他们就在外面在警察面前唱歌，他们的任务就是向警察传福音。所以我们都鼓励你们在这一段时间主日早一点来，好不好？你看街上的小贩什么时候起来？街上小贩如果比警察起得晚，他还有没有得混啊？你当小贩，你居然在城管上班时你才上班？你当什么小贩啊？小贩一定起的比城管早嘛！你被逼迫你还来的比警察晚，到底谁在逼迫谁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恒切祷告的传统是基要派家庭教会爱圣经爱祷告的传承之一。

我们又要用圣经的真理，用福音的全备的真理。我们不是完全的，我自己也走过这样的路，包括许多中国的新兴的城市教会，甚至一些改革宗教会都走过这样的路，在大概2003年到2007年之间，有很大一部分城市新兴教会都说自己不是家庭教会。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说自己不是家庭教会吗？因为说家庭教会就被打压。所以他们想告诉政府，我们不是三自，但是我们也不是家

庭，我们就是我们。好像自己很独特，我们是城市新兴教会，我们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想在政府那里获得第三种地位，不要像三自那样完全来压制我，我也不愿意加入三自，但是我也不是家庭，所以你也不要把以前的深仇大恨放在我们身上。那是他们（指家庭教会）的事，他们以前跟你们政府有怨恨，有历史上的纠葛，那是上一代的事，是传统家庭教会的事，我们是新兴教会，不愿意背负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很想让政府知道，你知道吗我们教会跟以前不一样，我们都是一些很体面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里面都是一些受教育程度很不错的基督徒，我们教会都是一些有很好的工作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家庭教会。

所以在2003年到2007年之间，很可耻的城市教会中会有这样的声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第三个势力，所谓家庭教会跟三自教会之外的第三种教会，各种各样的自我的身份的定位，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是你知道吗？政府的眼里人家是非常清楚的知道你是谁。我常常发现家庭教会在跟中国政府这样的拉锯当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教会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是政府知道。你换了一件衣服，你说家庭教会是穿那个衣服，我城市教会是穿这个衣服，你换了一个马甲出来，政府一看“家庭教会，抓”！

到了2008年和2009年，我们之前讲到的2010年洛桑会议，这个问题就再也没有问题了，中国的城市教会完全认同自己是家庭教会。中国只有两个教会，一个是三自教会，不是主的教会，是卖主的教会；一个就是真教会，就是家庭教会，没有第三条道路。只要共产党还在掌权执政，无神论政权在逼迫教会，你就没有第三条道路。这个是慢慢清晰过来的自我的认知。

还有一些改革宗教会说我们不是家庭教会，我们是改革宗。奇怪了，改革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你说你不是家庭教会？那你不是家庭教会，也不是三自，你是改革宗？这个很荒唐，自我评价太高，没有一个基本的谦卑的心和看见历史上的传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是否是基要派的改革宗教会或者是那种偏激的改革宗教会的标准：第一，是否承认自己是家庭教会；第二，是否承认自己是福音派教会。有一些改革宗教会说：“不，我们不是福音派，他们是福音派，我们是改革宗，福音派全部都是不得救的”。

我们首先承认我们是家庭教会，我们是福音派教会，然后我

们要用归正的信仰，全备的福音，我们也看到家庭教会热爱圣经的传统是很美的，是好的，而且你的神学可能觉得比别人好但是你爱圣经有别人更爱吗？中国今天的改革宗教会当中的信徒爱圣经有比中国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更爱吗？我看不见得，而且很大程度上就没有。你有比他们更爱向上帝祷告吗？没有！你比他们更渴慕天上的荣耀而轻看地上的这一切吗？有那种更强烈的火热的末世论吗？没有！所以不要自傲，不要因为我们更多地学了圣经，学了神学就更自傲。

我们当然希望用归正的信仰来归正，第一来承接家庭教会的传统；第二使家庭教会的传统在一个归正的福音中更加得以完全。比如说末世论，当我们更深地明白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会从偏激的末世论出来异端，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这是上帝带领中国教会的一个特别的气质。你去看其他国家的教会你是看不到这种气质的，美国的教会绝对没有这个气质，而且美国教会是一种相反的气质，欧洲教会就更不用说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这种气质，在这方面气质比我们更强的可能就是朝鲜的教会。那就是一种强烈的末世论，一种强烈的不热爱今生而热爱永生。受苦的教会通常都是末世论很强的教会，因为在这个地上活着确实没什么快乐。受苦的教会渴望见主的面，有钱的教会不太渴望见主的面，安稳的教会不太渴望见主的面，危机当中的教会更渴望见主的面。CS路易斯讲过一句话，他说：凡是在今生非常火热的，热烈地殷勤地去为主做工的人都是对永生怀着最强烈盼望的人，愿这个被我们所承接。

还有一个家庭教会第四个非常重要的属灵传统和运动的特质，我们可以称为平信徒的运动，中国家庭教会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平信徒的运动，什么叫做平信徒的运动？在文革的时候，牧师都已经没了，这个国家连一个牧师长老都没有了，有的话都在批斗会上。当然张义南在河南家庭教会的文章里说七十年代末河南出来的一批传道人都是开批斗会的时候信主的，因为台上传道人在被批斗，被批斗的时候问你还信不信耶稣？你为什么还要信耶稣？等于就是福音见证会，那些被批斗的人就讲信了耶稣有永生，所以我信耶稣，我曾经怎么生病，信了耶稣后病就好了，所以我信耶稣。披斗的人就喊“打”，打了之后继续问还信不信耶稣？还是要信耶稣，台下就好多人信主。河南教会七十年代早期的布道会都是从批斗会开始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会看

到，传道人都在监狱中，广传福音，建立教会这个运动主要是刚才讲的第三个属灵传统，七八年代河南安徽家庭教会的传统基本上是平信徒的运动。平信徒的运动是说这些后来成为传道人的人起初也是平信徒，他们受了上帝内在的呼召，但是外在并没有显明。

今天我们说有内召和外召。一个人蒙召成为教会的长老或传道人，他不能跑来跟教会说，其实过去十年教会都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弟兄祷告很感动，过来跟传道人：“我特别有感动，下一周我想讲道”。教会说“你要讲道”？他说“我有感动神就是要我讲道”。神要他讲道，谁敢不让他讲道呢？下周只好排他上去了。所以我们讲的是你有内在的呼召，你有感动，但是你要有外在的呼召，就是上帝的呼召要透过教会，透过外在的教会来呼召你，来印证出来，你有感动，别人也要有感动。你说我很有感动要给你们讲道，大家祷告说我们好像没有感动要听你讲道，那就没有印证嘛！你说我有印证我应该做你们的长老，我最适合做长老了。但是大家一投票，大家都觉得不应该。所以我们讲到投票，不是世俗意义上的选举，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来比人头，看哪个人得到大家更多的拥护，跟他关系好的就投他的票。而是说上帝对这个人的呼召要通过对他所在的这间教会的这群人的呼召把他显明出来。神呼召你，在我们心中要有印证，我也认为上帝呼召了你，我们才把你选出来。可是在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的复兴运动中，教会都没有了大公教会的属灵传承、教会的圣职的系统、教会对传道人的培训系统，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说中国家庭教会是上帝亲自在中国的平信徒中，在他们的内心呼召他们出来的一场平信徒的布道运动。谁有感动谁就站起来讲道，谁有感动谁明天就走乡串户，到成都每个区里面去传福音，就到街上去，大着胆子给人施洗，再过两周就大着胆子就成立教会，都是这么干的。今天也有一些极端的改革宗教会跑到这里说：“你们这里不是教会、你们这里没有按立、你们这里没有……，不能施洗、不能掰饼，根本教会都不算，应该解散。还有姐妹讲道，根本就不是教会。”当你这么说的时侯，你就把圣灵对中国家庭教会几十年的带领都否认了。各位，请问你是怎么生出来的？这些极端的改革宗教会是从哪里信主的？你是你妈生的，你妈是她的妈妈生的，然后你说我姥姥生的时侯不合法，没有生对，用的方法不对，乱生，没有拿许可证。所以我现在也是非法子女，你不是把你自己的合法性也否认

了吗？

家庭教会要往前走，可是你要继承尊重上帝在过去对中国教会的带领。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平信徒运动，没有人来按立他，没有人来印证他，他蒙神呼召他就出来了。那我怎么知道上帝呼召的是他呢？万一不是怎么办？有一件事情是印证，在某个意义上比兄弟姐妹的投票更算数，什么？火炼！政府的逼迫就是印证。这些传道人被神兴起来从来不是教会会众的投票，都是政府投票投出来的，政府说抓，这个人就被按立了。政府一看，这人不算，政府就把他放过了，政府就识别出来谁该抓谁不该抓，谁是真传道人谁是打酱油的，政府看的很清楚。弟兄姊妹没有投票，政府用他的逼迫，上帝使用火炼。也就是说你出来传道，面临的是什么呢？有工资吗？没有工资、还要掏钱、还要贴钱、最后还要坐牢，如果这样的情形都还愿意，那应该就是神呼召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谁是没有上帝呼召自己乱来的呢？肯定有。有没有胆子大的呢？有没有胆子大连神都不听的呢？肯定有。所以平信徒的运动里也一定会有乱象出来。有人是没有人的印证但有神内在的呼召；有的是有人的外在的印证但没有神内在的呼召，他就自己冒起来乱来，甚至他就自己凭着一个火热然后上来，来了上帝也使用他两三年，最后就发现他没有神的呼召，最后他亲手所做的又亲手拆毁了。其实在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上，这种事情多得很。或许十个传道里面有三个是假冒的？或者是有四个假冒的？我看最严重的时候可能一半假冒的都有。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上帝就是用这种方法兴起中国家庭教会的。所以第三个特征就是平信徒的运动。

所以我们今天一个方面已经不再继续这个平信徒的运动，因为我们要建立教会，蒙神的呼召，要规规矩矩地照着次序来，是要从原来的一个状态要往更美好的状态走。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我渴望家庭教会保留平信徒运动的一个特征，就是在你们的当中，我们今天街头布道就是平信徒的运动，说不定搞了半天虽然没几个人信主，但是里面出了好几个传道人，这个就叫平信徒运动。

人人皆祭司，对不对？我们也盼望说，也一直讲说教会当中很多的事工，除了基本的事工，其他很多事工都不是教会的长

老会做决定然后推动大家，然后天天来找人找不到，天天祷告一定非要找个人，都不是，都是从平信徒当中发起的运动。反堕胎事工是从平信徒当中发起来的，良心犯家属是从平信徒中发起来的，上访者福音团契是从平信徒当中发起来的，街头布道是从平信徒当中发起来的，都是从平信徒当中发起来的运动。

所以盼望神在你们的中兴起你们，向这个城市传福音，向这个时代传福音，在教会中带领小组，在教会当中教导弟兄姐妹是要在教会中得到印证的，但是上街向你的邻舍，向你的朋友，明天中秋你们可能很多人都要跟你们的家人在一起，希望明天有一场平信徒的福音运动。阿们。明天跟家人聚会的时候，你就传福音，这个没有圣灵阻止。阿们！

结束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家庭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她所有的美好恩典和得胜都是你所赐下的，都是你的得胜而不是人的得胜。但是在人的失败当中，在你对教会的管教当中，你仍然是使你的教会经历了得胜，我们就把今天的家庭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需要有更深的和更全备的来明白福音的焦点和整本圣经的教导，甚至更加完备地来理解教会与国家，教会与社会，教会与文化的整个一个更整全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求这你能够让中国的家庭教会仍然保持平信徒运动的那个特征，仍然保持那个迫切的，为了永生的益处的，那个强烈的末世论的盼望，让家庭教会保持那个不从国教的良心的持守，那个良心的不服从。主啊，求你让家庭教会仍然保守那个敬虔的爱主的基要的真理，那个在你面前热切祷告的，和热爱圣经的传统。求你把这一切都经过更新之后，经过全备福音的更新之后，仍然把这些美好的传统赐给今天和明天的中国教会。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乃希腊字母首末二字），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启示录1:8